# 

00000017两球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70333796

亚非欧大陆，占地球陆地面积57%，占地球人口86%，分别是美洲大陆的两倍和六倍。这才是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基本盘，谁能够主导这块大陆，谁就能主导世界。

# 一带一路 | 海权与陆权，帝国发展之路

http://cul.sohu.com/20170204/n479861408.shtml

作者=高柏

　　来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面对新的外部环境，中国在战略思维、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方面出现重大转变。

　　战略思维转变的标志是陆权战略的提出。它主张中国向西开放，通过发展以铁路为代表的陆上交通基础设施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在全球层面实现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战略对冲，并通过建设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强与未来大国的合作关系，逐步确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国力相称的地位。这个地缘经济战略与传统的地缘政治战略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用军事力量占领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而是通过经济合作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进行绑定，建立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从而保证中国西边的贸易、能源和资源战略通道，间接地实现地缘政治的目标。

　　政策设计转变的标志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简称“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欧亚大陆和北非，海上丝绸之路涵盖大部分亚太地区。铁路建设是这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已经运营的穿越欧亚大陆的中欧铁路，酝酿中的莫斯科－北京高铁和中吉乌铁路，也包括酝酿中的连接中国内陆与印度洋沿岸的中巴铁路和涵盖中印孟缅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泛亚铁路。这个战略的实质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开辟新的经济发展中心和交通要道，改变地缘政治中各国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战略目标的界定，从而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制度建设转变的标志是中国推动建立的一系列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多边金融机构，包括初始资本金均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以及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中国一改近年来在“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通过购买美国债务的形式向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的做法，开始直接通过自己主导设立的金融机构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不仅如此，中国还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上正式启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议程，在上海召开的亚信峰会上推动地区安全磋商机制的建立。这些举措显示中国对自身的大国角色开始有明确的自觉，并以一个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姿态塑造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格局。

　　西方有人担心，目前中国与美国面对的结构条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国和英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人类可能会重复100年前的悲剧。相互的经济依赖非但不会减少战争的危险，它一旦破裂带来的绝望反而更容易引起战争。由于真正决定战争与否的因素是一国的“贸易预期”，一旦失去必须依赖的能源、资源和市场，各国很容易走向战争。当年德国参加一战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1896年以来其他大国对它实行的经济围堵。美国保守派战略家有人主张，必要时对中国实行远距离海上封锁和全面海上禁运，而美国一旦对中国贸易通道进行封锁将必然引起冲突甚至战争。

　　中国也有人担心，保持欧亚大陆力量均衡是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向西开放会引起美国进一步围堵；同时中亚是俄国战略利益所在，中国进入中亚会引起俄国与美国联合制华，使中国腹背受敌；近现代史上还没有陆权成功挑战海权的先例，因此中国发展陆权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发展陆权？历史上其他国家发展陆权的尝试可以为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先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德国修巴格达铁路发展陆权的历史，然后讨论中国目前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与它们的异同。本文认为，控制通往经济和能源资源中心的交通要道是地缘政治的重要目标，历史上的陆上强国俄国和德国面对来自海权大国强大的战略压力时采取在地缘政治中进行军事对抗的立场。受马汉的海权理论和海外扩张野心的影响，它们都实行海陆并举的战略。然而，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压断它们走向与日本和英国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都不是对陆权的追求，而是对海权的追求。尽管它们都想发展陆权，通过建设铁路改变地理条件对国家行为的束缚，扩大战略后方，对冲海权的战略优势，以改善本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却都由于海陆并举战略造成的资源分散和顾此失彼而没有完满实现其战略目标。目前中国的陆权战略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的陆权战略最大的不同是回应来自海权大国的战略压力时的目的和手段：后者的目的是一家独霸重要的陆上战略通道，把铁路作为地缘政治中军事对抗的手段；而前者的目的是通过建设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化解矛盾与冲突，维系陆上战略通道的畅通，把铁路作为地缘经济中合作的手段。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均与俄国和德国有较大的不同，中国更有可能以陆权对冲海权并发展自身。

　　俄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这条铁路的经济意义被经常提起，但是由于贝加尔湖以东人烟稀少，经济的理由一直没有能够说服沙皇和俄国政府内部的反对者。最终影响修建这条铁路的决定性因素是地缘政治，俄国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一开始就受军事目标的驱动。

　　来自海权国家的威胁是俄国在19世纪末发展陆权的直接驱动力。当时英国与俄国就包括海参崴（俄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内的普利茅叶地区的归属问题激烈地争执，俄国十分担心英国会进攻其太平洋沿岸。而英国也担心俄国在中亚的扩张最后要染指印度，两国有几次几乎在阿富汗这一俄国与英国殖民地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开战。在俄国看来，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权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更容易进攻俄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把英国原来经苏伊士运河去日本的时间由52天缩短到37天后，使英国对沙俄远东利益的威胁变得更为明显。



　　西伯利亚大铁路

　　俄国对海权国家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也深感不安。从1885年开始，当年与清朝签署北京条约的尼克拉·伊格纳铁夫的兄弟、伊尔库茨克省的督军阿列克斯·伊格纳铁夫数次警告俄国政府，清政府正在东北重新组织兵力，铺设电报线，装备蒸汽动力的河运船，英国的工程师正在帮助设计一条从中国东北的南部到离海参崴只有90公里的铁路，很多中国人开始移民贝加尔湖地区。与此同时，中国与英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发展迅速。如果巴拿马运河打通，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也会进一步发展。他担心，在这些海权国家的帮助下，中国很有可能会夺回1858年和1860年失去的领土。

　　俄国从他国和本国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铁路在控制疆域和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人指出，英国在印度修建的铁路网是它能够有效控制这块殖民地的前提条件；如果加拿大没有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人烟稀少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很有可能要独立出去；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地广人稀。要想有效地维持这块版图，俄国必须依靠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欧洲部分快速运兵。在俄国-土耳其的战争中和与英国在阿富汗博弈时用铁路运兵的效率对俄国的帮助，以及克里米亚战争中由于没有铁路运兵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的失败与耻辱，也成为俄国最后下决心修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重要原因。



　　俄土战争

　　然而，俄国以西伯利亚大铁路为基础的陆权战略却受到其海权战略的严重制约。与以防守为主要着眼点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同，俄国的海权战略是进攻性的。受特殊的地理条件限制，俄国虽然想大力发展海军，却不得不在波罗的海、黑海和日本海三个方面面对不同的强敌德国、英国和日本。到底是以欧洲为主，还是以亚太为主，一直在俄国内部争论不休，占上风的主导意见经常变化。由于工业落后，经济欠发达，俄国的财政能力其实根本无法支撑其争霸的野心。然而，即使面临着预算的严重束缚，俄国仍然追求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发展海权，并实行海陆并举的战略。

　　俄国在战略资源分配方面的顾此失彼使得海权和陆权都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尽管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的七年里，俄国海军军费增长了66％，而陆军只增长了12％，前者仍然不及后者的三分之一。俄国海军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一蹶不振。也正因为如此，俄国不再是对英国的威胁，这成为英国与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手打击德国的基础。

　　军费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资金之间的竞争使得后者的进度和规模受到影响。日俄战争时，俄国需要从西伯利亚和欧洲部分向远东调派援兵。尽管西伯利亚大铁路对日俄战争的作用至关重要，在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时，外贝加尔段铁路以及中东铁路的运输能力每天不超过四对列车，南满铁路的运输能力每天不超过三对列车。可是，将一个军的兵力调赴前线聚集并展开就需要90-92列火车。当时的俄国根本无法立即将足够的兵力和给养运至远东。在日俄战争前夕，俄国在远东的陆军兵力总共不过12万左右；而日本陆军仅在中国和朝鲜的驻军便有20万人左右。运兵的能力和速度与战争的胜负直接相连。

　　通过中长铁路从中国东北打通入海口通常被认为是引发日俄战争的重要原因。然而，修建这条铁路虽然引起日本对俄国战略意图的警惕，却并不是导致日俄走向战争的直接原因。其直接的原因是俄国的海权战略：俄国于1897年强行租借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逼迫日本退还给中国的旅顺港。即使在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各国军队陆续撤离北京的1901年底，日本政府内倾向于对俄妥协的伊藤博文仍然访问了俄国，提出日俄之间的妥协条件，即俄国彻底向日本让出朝鲜；日本则容忍俄国占领关东州并修筑通往旅顺口的中东铁路支线，但要俄国从满洲撤军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是俄国并未接受伊藤博文的提议，而是用反建议把日本人最核心的要求顶了回去。这加速了英、日两国关于英日同盟的谈判。



　　日俄战争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麦金德认为它将对国家实力对比产生深刻影响，随着这条铁路把俄国变成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大国，英国的海权将受到巨大的威胁。在麦金德看来，俄国哥萨克在16世纪中叶跨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是与麦哲伦航海同等重要的历史事件。虽然英国的海权实力能在1900年的布尔战争（Boer War）中用军舰把25万士兵送到6000英里之外的南非作战，但是俄国的陆权实力也可以在日俄战争中用铁路把超过25万的士兵运到中国东北。英国当时关注的焦点是它在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殖民地利益。俄国进入中亚并南下不仅对伊朗和土耳其形成巨大的威胁，也同时挑战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当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后，东欧、俄国南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作为世界岛中枢的意义进一步凸显，掌握世界岛中枢者得天下。

　　虽然麦金德的理论引起人们对陆权的关注，但是它也误导了后世对俄国陆权战略的评价，因为人们总是用麦氏的标准来评价俄国的陆权战略。在他们看来，虽然西伯利亚大铁路帮助俄国控制了世界岛，却没有帮助俄国控制全世界，因此它是失败的。然而，俄国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初衷并不是要控制全世界，而是要加强运兵的能力，防止英国从远东和中亚入侵，并帮助它继续扩大陆上版图。



　　麦金德理论中的“核心地段”

　　从长期来看，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的结果是，迄今为止没有他国入侵远东和西伯利亚或肢解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西伯利亚大铁路在内战中成为苏俄红军打败白匪的重要工具。这条铁路支持的工业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能打败德国的基础，更保障了在德国全面进攻苏联时从东部运兵支援以及把迁往西伯利亚的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运往欧洲前线。在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期，这条铁路一直被用来布置移动的车载陆基核导弹以保持对美国的核威慑。按俄国人自己的初衷评判，这个陆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成功的。

****巴格达铁路****

　　德国最初设想修建巴格达铁路时也曾注重经济因素。19世纪80年代德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导致对金属、矿藏以及食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而奥斯曼帝国拥有现代工业亟需的铅、锌、铜、铬、褐煤以及石油。但是，真正使威廉二世决定上马这条铁路的却是地缘政治。他即位后一改俾斯麦重视欧洲势力均衡的地区安全政策，提出具有进攻性的“世界政策”，追求与德国日益上升的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巴格达铁路是德国作为后起的帝国参与解决由于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带来的“东方问题”，争夺新的势力范围的重要步骤。

　　然而要正确地评估巴格达铁路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德国的整体战略视野内，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德国以巴格达铁路为基础的陆权战略与其海权战略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德国的世界政策追求的也是海陆并举战略。如果说巴格达铁路代表的是其陆权战略，战列舰队的建设则代表德国的海权战略。



　　巴格达铁路

　　当时的海军元帅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提出著名的“风险理论”，即只要德国舰队大到使英国海军即使能战胜它，造成的损失也使得英国无法再与另外两大对手法国和俄国作战，英国就不会冒险与德国开战并会对德国在国际政治和殖民地问题上让步。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德国采取了一个激进的海军扩张计划。

　　当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日增，特别是欧洲列强从1896年开始在经济上围堵德国之后，德国开始通过建设巴格达铁路发展陆权。它看中的是这条经过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对德国与英国和俄国争夺欧亚大陆时的军事意义。一旦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奥匈帝国可以在东边帮助德国减轻俄国的压力，而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既能威胁俄国薄弱的腹地高加索地区，又能威胁大英帝国的咽喉要道——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要想使奥斯曼帝国发挥这一作用，前提条件是有一条通往近东的铁路干线来强化它对其边缘地带的控制。[21]德国企图通过经过现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区域的铁路来打通去波斯湾的通道从而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同时绕道进入红海地区，帮助德国运兵到苏伊士运河附近，以己之强攻敌之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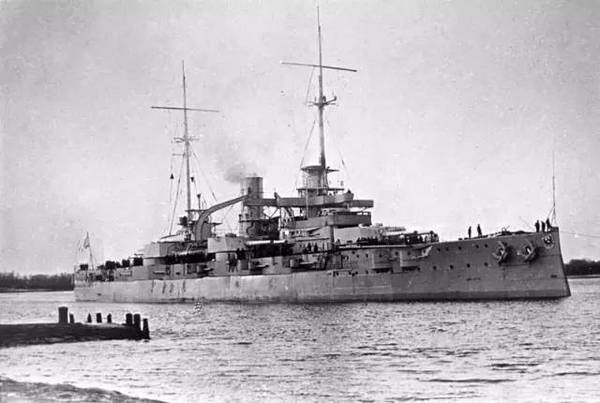
　　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的陆权战略对地区国际秩序有直接影响。与俄国在本国境内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同，巴格达铁路必须经过当时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它需要建立国际联盟。在德国陆权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世界是其施策重点。为打通去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德国积极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联盟。1914年8月双方发表泛伊斯兰圣战的联合公告。这份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以及鞑靼语在伊斯兰世界广泛宣传的公告号召穆斯林们发动反对协约国的圣战。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公告中运用大量的泛伊斯兰口号动员北非、中东俄国和印度的穆斯林社会。

　　然而，德国海陆并举战略的后果之一是导致其陆权战略无法获得足够的经费。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比预想的慢很多。与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同，德国无力为其建设全部融资，又不愿意让他国参与进来。由于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在铁路路线方面的分歧以及最初通车的路段无法盈利，这条铁路曾经被整整停建了三年。德国的工程师们在打通土耳其境内的金牛座山隧道时又遇到技术难题，同时德国在外交方面也遇到困扰。这些因素导致巴格达铁路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有900多公里未能完工。即使是到1915年底，它还有480公里未完工。

　　最终，德国的陆海双重战略均以失败告终。

　　巴格达铁路是促成德国的强敌英国和俄国摈弃前嫌，联手打击德国的原因之一。这条铁路代表德国在东南欧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它既使英国感到威胁，也引起俄国的恐惧，并使得俄国更容易接受英国联手遏制德国的建议。换言之，德国的陆权战略改变了原来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并导致了对德国不利的后果。

　　有人认为建巴格达铁路是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种观点至多只是部分正确。虽然德国修巴格达铁路有军事意义，但是德国与英国之间非常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才是当时英国人眼中最大的威胁。巴格达铁路即使是引起战争的导火索，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决不是唯一，更不是首要的原因。如果德国没有建设强大的战列舰队，直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不至于恐慌到全面摊牌。事实上，在德国大力发展海军之前，英国一直视陆权大国德国为抗衡法国和俄国的天然盟友。甚至在1898至1901年期间，英国仍然三次试图与德国结盟。然而，威廉二世深受马汉的海权理论影响和对英国海权的羡慕，固执地认为德国的世界政策离不开一只强大的海军，对英国结盟的建议无动于衷。德国发展强大海军的国策把它推向与英国正面冲突的不归之路，逼着英国转而与宿敌法国和俄国联手。



　　德国无畏舰

　　同样的道理，修建巴格达铁路本身也不构成俄国与德国摊牌的全部理由。如果威廉二世即位后，德国与俄国在1890年续签俾斯麦时代两国之间缔结的相互保障条约，俄国不会对德国有如此大的战略猜疑，以至于在1894年迅速地与宿敌法国和解，为日后联合打击德国留下伏笔。德国的全面出击、四面树敌对其走向战争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修巴格达铁路。

　　德国虽然花费巨资追求海权，发展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海上实力与英国相比仍然严重落后。尽管德国在与英国的日德兰海战中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但它的军舰在剩下的战争期间却基本上被英国封锁在海港里无所作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德国的海权战略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德国发展海权根据的是风险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英国不会选择走自掘坟墓的路。然而英国却并没有按常理出牌。它选择了与德国开战，并打败了德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尽管其霸权地位也一落千丈，无可挽回地被美国取代。

　　同时，从财政的角度看，德国的海陆并举严重地分散了资源。如果德国把资源集中在发展陆权，而不是海权，巴格达铁路的建设就不会因为资金短缺被冻结三年。如果德国赢得这三年的时间，它可能完全改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有史家认为，哪怕巴格达铁路能在1916年底，而不是实际上的1918年8月完工，德国仍然可以发动一场对苏伊士运河的致命攻击。这将会严重地威胁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迫使它在战争中进行政治妥协。如果历史沿着这条轨迹发展，德国将成为一个在近东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强权国家。

　　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使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瓜分了德国对巴格达铁路的所有权利。伊拉克1932年独立后从英国手里买回其境内的路段。从君士坦丁堡到巴格达的路段在1940年才全线完工并通车。

　　虽然德国建立陆权的努力失败了，但是德国对陆权重要性的认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在德国两次大战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地缘政治战略得到充分的体现。纳粹德国的重要人物鲁道夫·赫斯（Rodulf Hess）的老师、生存空间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地缘政治的代表人物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认为麦金德是地缘政治理论的翘楚。同时德国对中东地区战略地位的认识和与伊斯兰世界结盟反对海权国家的战略在二战中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希特勒一直把现代土耳其的开国之父凯末尔奉为楷模。

　　即使在二战中，导致德国失败的也不是其陆权战略，而是其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打法。

****新丝绸之路****

　　中国目前追求的陆权战略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相比有相似之处，但是更有本质上的不同。

　　相似处包括中国目前面临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相似的来自海权国家的战略压力；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海军，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法与美国的海权全面抗衡；虽然中国国力的绝对上升伴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但是二者之间不仅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而且在军事实力上仍然相距甚远；与当时俄国和德国一样，中国也在试图通过修铁路来发展陆权，增加应对海权挑战的实力。

　　当时的俄国完全在本国境内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而德国只通过当时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建巴格达铁路。与它们相比，中国在打通欧亚大陆桥时要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所有的路线均要经过更多的国家。同时，中国对向西开放不可回避的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发展出像德国那样清晰有力的政策，其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其国内的宗教族群关系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然而，中国的陆权战略与俄国德国当年的陆权战略之间本质上的不同使得中国的陆权战略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

　　其最大的不同在于，俄国与德国的陆权战略的基础是地缘政治，俄国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德国修巴格达铁路的主要目的都是军事对抗，而中国陆权战略的基础却是地缘经济，中国推动与邻国互联互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经济合作。地缘政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倾向用零和的角度看问题。而地缘经济则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交集，倾向用合作和利益捆绑来减少和控制冲突。中国之所以采用地缘经济战略是因为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仅已经完成从内陆国家思维向海洋国家思维的转变，摆脱了当年使俄国和德国步入陷阱的零和思维，甚至还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让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其贸易政策的西方传统的海洋国家美国。这一地缘经济战略更符合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

　　一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是开放还是保守可以分为海洋型思维和内陆型思维。海洋型思维是海洋国家常见的思维方式，以开放与合作为特征。海洋国家既包括岛国，也包括位于海岸线，有直接海洋通道的国家。受惠于温和的气候和适量的降雨，海洋国家很容易与世界上其他被地理条件屏蔽的国家接触。这些国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并通过移民带来族群、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他们更易于参加国际分工，与他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也经常带来政治方面更多的自由。而内陆型思维则是在内陆国家常见的思维方式，以封闭和保守为特征。内陆国家通常有严酷的气候条件并远离海洋。由于山脉、沙漠和高原的阻碍，内陆国家通常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接触较少。在历史上，这些国家的经济更呈现自给自足的形态。它们的政治体制，由于相对缺少新思想的影响，也倾向于更加封闭和专制。

　　建立这种地理条件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固然会启发我们的思路，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固定的，经常有更为复杂的结合。虽然俄国、德国和中国都有海岸线，但当年的俄国、德国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却都属于内陆型思维。虽然日本是岛国，但是在德川时代也曾闭关锁国。

　　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不愿意参与国际分工，把对外经济联系视为威胁。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就是在经济方面从内陆型思维转向海洋型思维。中国开始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迅速地从单纯的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部贸易和企业内部贸易发展。

　　与此同时，一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是否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又可以分为地缘政治型思维和地缘经济型思维。尽管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通常强调战后美国主导的以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的开放性，却忽视了美国虽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在冷战期间为了与前苏联争霸，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非对称合作的策略，即允许盟国向美国市场大举出口他们的产品，同时对美国的产品关闭他们的本国市场。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经济禁运。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经常用经济制裁作为地缘政治的手段。

　　而中国在开展对外合作，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则很少受地缘政治的束缚。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显示中国通过鼓励自由贸易来与他国利益捆绑，建立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不让地缘政治因素来影响对外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的10+1、中日韩、10+6等地域经济合作项目均不问政治体制，只要是地域内国家都可以参加。正像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主张的那样，这个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虽然由中国推动，但是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2015年5月，中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对接就是一个用地缘经济思维取代地缘政治思维的最新范例。

　　反观美国，在推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时把中国这一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排除在外，奥巴马在向国会成员游说时一直强调地缘政治的理由。最近，美国还强力反对其盟国加入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英、法、德、意、澳、韩等盟友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这个组织清楚地表明，美国坚持用地缘政治观点来对待地域经济合作的做法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则显示出号召力。

　　中国比较彻底的地缘经济思维是在后冷战时代深度参与全球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全球生产时代，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它们主导的企业内部贸易不断蚕食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民族国家的利益边界与以前相比变得模糊，出现了更多的利益交叉。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国看待对外经济合作的观点变得日益开放，相信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经济合作来化解。在后冷战时代，用地缘政治手段干涉地域经济合作变得很不合理。不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只要参与地域经济合作，市场都会进一步扩大。这种经济合作带来的互补超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

　　即使在技术的层面，中国目前推行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当年的俄国和德国相比，也有更有利的地方。与当年的铁路技术相比，如今的高铁技术大大地改变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计划中的北京-莫斯科高铁只是第一步。如果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的高铁路线全面贯通，三至四天之内可以乘高铁从北京到达伦敦，欧亚大陆的经济地域一体化将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它将有变为现实的强烈可能。

　　目前的国际环境与100年前相比也更有利于中国追求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涉及在西方国家普遍奉行帝国主义的时代守成大国英国封杀后起的德国，而德国决定铤而走险。二战后，美国对此深刻反思，并主导建立了以多边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虽然美国正在试图对冲中国的崛起，但是它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未要与中国发生正面的对抗。与所有国家一样，美国不只有一种声音。美国的确有人主张与中国对抗，但关键是这些主张能否变成国家持续的政策范式。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自己如何应对美国的挑战。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过去两年强化与俄罗斯合作的举措已经对美国的重返亚太和地缘政治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产生有效的对冲效果。美国已经在与中国谈判中美投资保护协定，美国的智库甚至已经有人主张中美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同时，与当年俄国与日本、德国和英国之间相比，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发展出来的多层面的沟通协调机制均有助于减少战略误判。

　　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中国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一直依靠的是美国海权主导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现在中国发展陆权是准备万一这个体制出于地缘政治的想法不再容纳中国时的对冲措施。中国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不是为了与美国主导下的环太平洋经济整合对抗，而是向美国显示把中国排除在这个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之外的代价，从而促使美国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里早日接纳中国。当美国欢迎中国参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时，中国也会大力推动欧亚大陆对美国开放，向美国开放中国与俄国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后的地域经济合作。这与历史上俄国与德国拒绝日本和英国提出妥协和结盟的建议，一味地对抗有重大区别。

　　中国的地理位置与俄国和德国的不同也增加了中国地缘经济战略成功的可能性。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较多的不冻港，又有广泛的陆上战略纵深。中国可以在海权和陆权的战略方向上进行转移，而俄国和德国则不具备进行这种转移的地理条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似，中国推动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个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海权战略。中国正在利用自身地理条件的优势，在追求地缘经济战略中的海陆并举。如今能够参加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的国家很不相同。前者的参与者是中国、俄国、欧盟、印度、伊朗，土耳其，再加上中亚国家、部分中东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而能参与后者的国家主要是像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东南亚这些海洋国家。上述两组国家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很少有交集。中国如果能打通多条欧亚大陆桥，建设新丝绸之路，就会形成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战略对冲。

****中国的陆权理论突围****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多大程度上面临着与德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似的局面？中国从俄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里可以获得哪些启示？

　　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相似，中国作为后起大国已经进入与既存海权大国美国的利益发生碰撞的阶段，也已经面临着来自海权大国的战略压力，中国也在试图发挥自己的陆上优势，通过铁路这一新的重大交通技术来改变地理条件对地缘政治的限制，加强自身与海权大国博弈的实力。

　　即使后起大国不发展陆权，也难得与海权大国相安无事。如果当年俄国和德国不追求陆权，不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巴格达铁路，英国也仍然有可能通过染指中亚威胁俄国的西伯利亚和通过中国东北威胁俄国的远东地区，它也会尽量把德国海军势力封锁在北海的范围之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方均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无法避免。同样的道理，在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周边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如果中国对外部挑战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必然要激起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从而使局面彻底失控。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并不能永远导致和平，绥靖政策反而容易导致战争。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此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中国如果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发生激烈利益冲撞的可能性只能更高。

　　但是，中国以地缘经济中的合作为目标的陆权战略与当年俄国和德国以地缘政治中的军事对抗为目标的陆权战略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陆权战略体现的是现实自由主义。

　　中国目前采用的现实自由主义部分接受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性质的基本假设，即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但是与现实主义单纯强调冲突和对抗不同，现实自由主义认为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利益的交集，冲突和交集何者占上风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动。现实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都重视合作，但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寻求合作的手段。自由主义单纯强调合作的好处，遭遇他国制衡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向对方输送好处。而现实自由主义则转而强调不合作的坏处，对冲的目的是通过向对方显示不合作的代价与利益损失来诱使对方合作，同时也为自己准备在对方不合作时的反制手段。

　　中国的现实自由主义基于对国际政治中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合作需要实力做后盾有清楚的认识。正是因为保持欧亚大陆力量均衡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中国只有积极发展陆权才能有效地对冲美国海权的压力。中国发展陆权并不以挑战美国海权为战略目标，而是显示美国在战略上挤压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如果美国不想把中国逼上与俄国结盟共同对抗美国的道路，建立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选项。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经逼着中国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政策的后果已经导致对美国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

　　当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段在目前条件下都无法应对外部严峻的挑战时，中国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改变地理条件对地缘政治环境的约束，利用自身独特的战略地理优势，以地缘经济为手段来稀释、转移来自美国海权的战略压力。这既维护世界和平和自由贸易，又可以实现自身发展并获得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与中国实力相应的地位。

　　中国要引以为戒的是，不能像当年俄国和德国那样用单纯的地缘政治的零和思维去看待国际关系，盲目地进行军事对抗。当年俄国和德国追求陆权时从一开始就以地缘政治中的对抗为目标，以军事实力为手段。像文中揭示的那样，如果俄国和德国不是一味地追求海权，或者在追求海权的过程中懂得妥协，它们可能不会那么快就与日本和英国彻底决裂，走向战争。中国以地缘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为基础的陆权战略在本质上是一个对冲战略，其目的从来就不是要冲突，或者是对抗，而是向对方显示不合作的代价，把对方从冲突引回合作。

　　俄国和德国追求海陆并举的战略对其陆权战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两国的传统优势都在陆地，但却为了与既存海权大国争霸而积极地发展海军。由于双方之间巨大的差距，它们虽然竭尽全力，却仍然没有能够与海权大国的绝对优势抗衡。

　　尤其对中国有启示意义的是，德国以“风险理论”为依据发展海权。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守成的海上霸权会基于理性的判断行动。但它的根本缺陷是没有认识到即使与新兴大国的对抗会加速其衰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霸权国家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就像当年英国一样，美国在进行军事决策时也有可能理性让位于感情冲动，意识形态，或者国内政治压力。国内反对陆权战略的人主张发展海权才是中国唯一的发展方向，而俄国和德国的历史却表明，走激进发展海权的道路很有可能导致与守成海权大国的正面对抗甚至战争。中国近年来积极发展海权已经引起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大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小国的恐惧，并开始结成对抗中国的联盟。西方关于海权的定义是拥有必要时排他性地控制全世界最重要海洋通道的军事实力，支撑海权的不仅仅是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是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和与多国的军事联盟。

　　中国应该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捍卫自己的领海主权和海上权益。无论是发展西方讨论甚多的“区域进入阻止能力”，还是填海造岛，都属于防御，而不是进攻的范畴。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国际政治永远是各国之间的战略互动，最终影响他国对中国发展海权做出反应的是他国怎样看中国的海权建设，而不是中国自己如何看。如果中国想避免与既存海权大国美国的正面对抗，就应该避免追求西方理解的排他性地控制重要海洋通道意义上的海权，掌握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节奏和时机，同时大力加强与相关各国之间的沟通，并懂得何时进行妥协。目前对中国而言的一大风险是像当年德国一样一厢情愿地假设美国不会与中国在海上对抗，并天真地认为造出两艘航母就等于有了海权，在既没有海外军事基地网络，也没有海上联盟支持的条件下把自己引向与美国领导的多国联盟之间的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海上战争。美国重返亚太到目前为止虽然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成果，但是已经激活冷战时亚太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网并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海上联盟。可以说，对美国而言，海战的组织准备已经基本就绪。在这种时候还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不会与中国开战，很有可能重复文章中描述的当年德国犯下的错误。

　　目前中美双方战略判断之间的落差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华府已经做出判断，就对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言，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之举比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内战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在中国却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从重要性角度看，美国在南海的三项利益，即和平与稳定、商船自由航行权和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都不属于其核心国家利益。在美国看来，这一轮南海冲突已经是美国对华政策范式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但是，从中国国内看，这只不过是中美周期性矛盾起伏的一个浪花而已。历史将证明两国是否将为这一认知的鸿沟付出巨大的代价。

　　大国之间走向对抗和战争的决策过程通常都很曲折，因为在巨大的代价面前各国体制都有较强的反战惰性。然而，同样的道理，当大国真正地开始认真思考对抗，整个体制开始向战争动员的方向使劲，大众传媒开始认为只有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时，再想逆转也同样不容易。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未来十年中对中国智慧的最大考验是能否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又避免刺激既存海上霸权美国的国家机器全面转向与中国的对抗和战争。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得不偿失将是为了战术上的一时占上风而刺激美国的整个体制转向正式的对抗甚至是战争。

　　与有些人担心的完全相反，中国向西开放并没有引起美俄联手制华。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的基本原则是追求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捆绑，建立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俄国正在认识到中国推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其自身利益的契合处。两国政府刚刚签订的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协议如果能真正落实，将会极大地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产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欧亚大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美国也没有因为中国向西开放就加强围堵。强化美日安保条约，强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本来就是“重返亚太”战略的应有之意，中国向西开放并没有对此有任何影响。如果我们把2015年5月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视为是加强围堵的话，其直接原因恰恰是中国的填海造岛这一建设海权的举动。这并不是说中国应该放弃填海造岛和发展海上军事实力，而是要掌握节奏、时机和进退，决不应该因小失大。当然，美国也在试图阻碍中国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建设，劝阻众盟友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其结果却显示，即使美国想强化对中国地缘经济战略的围堵，成功的可能性也已经越来越小，因为其他国家很容易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

　　本文认为，保障通往经济和能源资源中心的战略通道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目标。重大交通技术，尤其是像铁路这种跨国应用的技术，直接影响国际体系中各国之间的互动能力——各国交通技术能力与对国际体系规范的共同理解的结合。交通技术可以直接影响人类的实践和规范实践的制度安排，而国际体系的互动能力界定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互动的程度和类型。虽然许多技术能改变人类的生活，但是只有极少数的技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地理是静止的，只有非常少的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与地理的互动，能改变民族国家互动方式的技术体系更是凤毛麟角。这种技术不仅改变国家之间互动的新规则，更是规定时代的基本特征。中国推动的以铁路为代表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带来一个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新时代。

===============================

看图说话



#### [寻找确定](https://xueqiu.com/2805191307"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恩，这个想法很好，但这么做的人都不得善终。比如：亚历山大、汉武帝、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东条英机、苏联，等等。因为这个大陆的竞争生态注定不会一家独大，只有寡头垄断。*

2016-06-22 11:41

#### [一体同悲无缘大慈](https://xueqiu.com/n/%E4%B8%80%E4%BD%93%E5%90%8C%E6%82%B2%E6%97%A0%E7%BC%98%E5%A4%A7%E6%85%88"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美国呢？

2016-06-22 11:57

#### [寻找确定](https://xueqiu.com/2805191307"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美国打了韩战，打了越战，打了伊拉克，打了阿富汗，结果不咋地。美国是海洋霸权，不然早挂了。*

2016-06-22 13:16

*美国选择收缩，但临走不忘添点堵[一坨屎]，时不时也四处搞点乱，想着四两拨千斤[抠鼻]，越来越像大号的英国了，海权国家就这鸟样[摊手]*

2016-07-19 12:18

*农耕干游牧靠的就是垒碉堡，压缩游牧活动空间然后拼生产力，俗称种田平推，别看几次改朝换代游牧闹得慌，那是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匈奴，突厥，鲜卑，羌氐，乌桓今何在？宋软么软，还是拖死了辽，耗死了金。  
陆权干海权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嘛，同样是消化产能，与其多盖些没人住的楼还不如多造几个岛，还能多拉动点旅游和海产GDP呢[赚大了]*

*Q:除了筑城堡,也搞良马的*

*亚非欧一体化，说白了就是这么几个问题  
1、意识形态  
2、谁来主导  
3、谁会反对*

*Q:*家门口都核试了，还扯主导这些。

*A:大流氓哪家门口没被堵过核弹，门口有核弹就不崛起了？砸这么多钱搞中段反导和激光武器又不是好玩，被个拿把气枪的小瘪三都能吓住，那还是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希腊-罗马，西方文明的源头，要想理解西方文明，这是绕不开的。  
真是满满的既视感  
========================================*

***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2006级历史教育硕士    孙金凤******摘 　要:****在公元前5 世纪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实力雄厚的雅典却意外败北。导致雅典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达。雅典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财政来源的不稳定性造成战时财力不足;内部党争和缺乏有智慧的集中;战略和战术的错误;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盟邦的暴动及波斯对斯巴达的支持。总之 ,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 ,内部因素是主要的。****关键词:****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失败 ,内因 外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 ～前 404 年）是希腊城邦由极盛走向全面危机的转折点，“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给希腊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生命的丧失”,“所有的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战争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战争最后以斯巴达的胜利，雅典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雅典的失败与它本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有密切关系。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一、经济原因:*** *战争爆发前，雅典经济实力雄厚，经济资源丰富，这些是伯里克利有信心取得战争胜利的经济保障。然而，雅典的经济有它的局限性。****1.雅典以工商业为主，对外依赖性强***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气候温和，境内多山，适于农耕的地方不多。气候温和的山地盛产橄榄和葡萄，有丰富的陶土资源，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耕地较少 ,粮食往往供应不足 ,需要大量的输入谷物。另外 ,雅典有优良的港湾 ,利于发展海外贸易。雅典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手工业产品行销海外 ,开辟海外市场;另一方面 ,又要从海外运进工业原料和谷物。海外贸易在雅典占重要地位。同希腊半岛的许多城邦一样 ,对外贸易要比国内贸易重要得多。雅典主要是工商业经济 ,工业产品要在海外市场销售 ,原料和粮食靠进口。雅典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在战争时期 ,海外贸易受到影响 ,势必影响到雅典的经济 ,尤其是在战争的后期 ,斯巴达控制了赫勒斯滂地区 ,雅典的主要贸易地区和运粮通道被斯巴达控制 ,雅典经济收入减少 ,粮食缺乏。而这恰恰是影响战争进行的主要因素之一。****2.国库收入缺乏稳定的来源，战争中财力不足*** *战前，雅典的经济势力可谓是雄厚的，也是伯里克利为之自豪的，赢得战争胜利的保证力量。战后，军费开支浩大，雅典感到财力不足，以致于在战争初期压缩划桨手，以节省开支。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初期雅典采取防守战略，田地被破坏，饥民增多；公职人员津贴提高，这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为了应付战争的巨大开支，雅典人开始对输出和输入雅典的一切货物征收 5%的关税。但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雅典财力困乏，严重地影响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取胜。  
  总之，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及国库收入来源不稳定，造成战争进行过程中财力不足是雅典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政治原因：***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民主政治趋于极盛，但在繁荣的民主政治的背后潜伏着危机。****1.党争不断*** *党争是党派之争。古代希腊的党派是指围绕某些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自然形成的一些松散的公民集团。就雅典的党争而言，其党派的构成、斗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因时而异，但不管哪种形式，党争都是雅典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在雅典国家形成与巩固过程中 ,曾发生一系列变革 ,如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泰米斯托克利改革、厄菲阿尔特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 ,虽然改革是雅典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但它们同时亦毫不例外地属于党争的范畴(只要阅读每次改革的经济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公元前 5 世纪中叶 ,雅典党争最为激烈 ,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首的民主党经过一多年的斗争战胜了以西门为首的贵族党 ,使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在雅典不断巩固、发展。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由于民主党力量过于强大 ,贵族党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 ,党争处于低潮。伯里克利死后 ,他的民主党随即一分为二:民主党中以尼西阿斯为首的保守派与贵族党合并组成主和派 ,亦称寡头党 ;以克里昂为首的民主党激进派则构成新的民主团体 ,即所谓主战派或急进民主党。党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主要体现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公元前 421 年“尼西阿斯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主和派取得暂时的优势 ,亚西比德的迅速崛起使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西西里远征的成行说明主战派在激烈的党争中再次获胜 ,而公元前 411 年的寡头政变 ,则标志着寡头派又占了上风。以伯里克利去世为界 ,我们可将雅典党争分为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 ,党争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对雅典的影响也不相同。伯里克利逝世前 ,雅典党争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 ,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逐步确立并臻于完善 ,奴隶制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而后一阶段的党争 ,使民主派与寡头派轮流执政 ,政府更迭频繁 ,难以制定长期可行的政策。另外 ,党争还伴随着削弱雅典力量的流血事件。总之 ,后期的党争扮演着不断削弱和损害民主政治 ,使雅典国力越来越弱的角色。这一点 ,在远征西西里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验证。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给雅典带来极大影响。而从远征西西里这一计划的提出、成行到惨败无不由于党争的影响。  
首先 ,雅典在未解除“近忧”斯巴达前劳师袭远 ,这是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们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是每十天重订一次的。一旦斯巴达发现雅典军队分散了 ,他们很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既进攻阿提卡又援助西西里。况且 ,一旦雅典并不了解西西里 ,只听信厄基斯泰人(西西里岛上一民族)的片面之词和他们自己调查团的伪报告, 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远征时 ,也出于党派利益的考虑 ,未听从尼西阿斯的良言相劝 ,反而在亚西比德的鼓动下 ,充满了远征的热情 ,迅速地组成远征军出发了。  
其次 ,公民大会在党争的影响下任命将帅失当 ,即任命亚西比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卡斯为全权的将军，这种失当具体表现有三:  
  
  
其一 ,尼西阿斯属于主和派 ,他极力反对远征 ,选他为将军必然导致其在远征时和进攻叙拉古时均采取消极态度。尼西阿斯率军初到叙拉古时 ,他没有立即发动进攻而在卡塔那度冬。结果 ,吉利普斯偷偷地引进伯罗奔尼撒的军 队首先向雅典人进攻。雅典人在厄庇波利溃败后 ,本应取消继续围攻叙拉古的计划 ,而进退维谷的尼西阿斯宁愿死在敌人手中，也不愿意接受雅典人不公正的判决。所以 ,他没有采纳另一将军德谟斯提尼的建议 ,最终使雅典远征军陷入绝境。  
  
  
其二 ,亚西比德属于主战派 ,他积极主张远征 ,因为“他对于赛马的热忱和他的奢侈生活已经超过了他的财产所能供给的 ……”,而一旦远征成功“会使他个人同时得到财富和荣誉 ……”。任命怀有如此野心的人为将军 ,无异于将雅典城邦引上毁灭之路。  
  
  
其三 ,任命尼西阿斯与其政敌亚西比德同为远征将军 ,政见不一必然导致军事行动上的不一致。远征军到达西西里的利吉姆后 ,才发觉受骗 ,厄基斯泰人根本没有允诺的那些金钱。这时 ,尼西阿斯要把全军开往目的地栖来那斯 ,而亚西比德却要去拉拢西塞尔人叛离叙拉古 ,后来另一将军拉马卡斯支持了亚西比德 ,亚西比德率领自己的船舰前往麦散那结盟 ,结果遭到麦散那拒绝 ,亚西比德只好无功而返。还有 ,公民大会受党争的影响 ,对亚西比德涉嫌渎神罪处理也不当。远征军出发前 ,雅典城内赫尔墨斯石像的面貌被毁。这一事件受到国家的重视 ,因为这不仅被认为是远征的不祥之兆 ,而且被认为怀有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 ,亚西比德被控告参与此事。亚西比德当场否认对他提出的控告 ,请求在他远征前对他进行审判 ,以便查出事情的真相。但是“他的敌人恐怕马上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会得到军队的好感;同时 ,因为他获得亚哥斯人和一些门丁尼亚人参加远征而甚得民心 ,他们恐怕人民对他宽恕 ,所以 ,他们尽力把案件推迟 ,阻止马上审判。同时他们还使一些人起来发言 ,说亚西比德应当马上出发 ,不应该阻止军队的启程 ……他们的计划是想对他提出一些更为严重的控告 ,到那时候再派人去 ,把他召回来受审。果然 ,远征军到达卡塔那不久 ,雅典即派人召回亚西比德答辩国家对他提出的控告。实际上 ,亚西比德不可能参与毁坏赫尔墨斯石像 ,因为他决不希望在他远征前出现任何不祥的征兆。而在党争的作用下 ,公民大会做出了以上不公正的处理 ———召回远征途中的亚西比德受审。修昔底德认为 ,如果亚西比德不被召回的话 ,雅典远征西西里可能不会失败。这种不当处理使亚西比德中途叛变逃往斯巴达 ,向敌人泄露了雅典的军事机密。斯巴达按照熟知雅典内情的亚西比德的谋划 ,一面派兵驰援西西里 ,一面出兵长期占领雅典近郊的狄西里亚 ,给雅典以致命打击。党争还败坏了雅典的社会风气 ,使诡辩之风盛行 ,导致了雅典的政局不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巴达。在所有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国家或城邦中 ,斯巴达是少数未卷入激烈党争的国家之一。不仅倾向斯巴达政体的寡头们对她的稳定羡慕不已 ,就连反对这种政体的人们对此也是十分妒忌。修昔底德对党争给雅典带来的危害痛心疾首“他们(指雅典人) 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 ,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 ,但是他们还支持了八年 ……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 ,毁灭了他们自己 ,他们最后才被迫 投降 ……”。正是党争引起了雅典政局混乱 ,为斯巴达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2.民主政体的弊端是导致雅典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 *伯里克利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作为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在多数人手里”。雅典的重大事件都由公民大会决定，每个公民在大会上都有发言权。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伯里克利时更加广泛。在希腊人的思想中，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平等，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抽签和轮流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民主政治代表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然而，雅典民主政治也有着极大的缺陷，这在战争中暴露无遗。  
首先，雅典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民主，它的庞大的公职津贴开支不仅依靠对国内奴隶、外邦人的削剥，而且依赖各同盟国家的贡款。为了强迫各盟邦缴纳贡款，雅典与许多盟邦关系紧张，在战争中经常有盟邦因此背叛雅典而投靠斯巴达；  
其次，公民直接广泛参与政治做过了头，重视民主而忽视了集中，这样大大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水平。对公民治国能力的盲目崇拜，以及平民权力的无限膨胀，使国家失去了有效的制衡机制。由于公民大会的判断“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的影响的。”因此少数别有用心的政客便利用群众情绪操纵公民大会通过错误的决议。  
最后，政治生活中的抽签和轮流执政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雅典，除十将军外，所有公职人员都经过抽签选举产生，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民主，则还实行轮流执政。这便忽略了选举公职人员时需要考虑个人能力的问题，很难将最杰出的人物推向领导岗位，结果难以制定出最好的政策。党争不已和民主政体的这种弊端成为雅典失败的又一原因。    
为什么雅典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代倍受称颂 ,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却因其弊端百出而遭到谴责呢 ?我赞同郝际陶教授的观点 ,这是伯里克利“巧用民主 ,适势独裁”的结果 ,而在他以后的任何一位领袖都做不到这一点。公元前431 年 ,斯巴达军队攻入阿提卡 ,伯里克利采取“固守城垣”的策略。不久 ,雅典人就指责他身为将军却不率领他们出战在这种情况下 ,伯里克利既不召开公民例会 ,也不召开紧急会议。不研究新情况 ,遵循旧章 ,听命于伯里克利一人之见。公元前 430 年 ,斯巴达人再次攻入阿提卡 ,此次伯里克利召集了紧急会议。他在会上申明其政策的原委 ,引导民众、鼓舞士气。由此可见 ,伯里克利召不召开公民大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这要看对他制定的政策是否有利。伯里克利这种做法显然不合民主制的规则 ,但他恰恰用这种独裁方式左右着国家的大事。正是伯里克利使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而避免了它的缺点。而在伯里克利以后的领袖 ,为了争夺权力与财富 ,为了个人利益与野心 ,他们不惜放弃原则 ,放弃领导 ,把城邦的领导权交给民众 ,以哗众取宠 ,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他们的领导下 ,难以控制国家大局。不但使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明显 ,而且制定出错误政策 ,最终导致雅典民主政体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三、军事原因*** *战前，斯巴达自负是陆上强国，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而雅典自负是海上强国，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雅典人按照伯里克利制定的战略，只是防守。这是一种消极的作战方式，不利于雅典的获胜。西西里之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这次战役后，雅典的海军力量削弱，战争的形势开始不利于雅典，为斯巴达战胜雅典提供了可能性。西西里战役雅典失败是由于多次延误战机。雅典远征军远征叙拉古时有明显的失误。当时雅典在西西里的主要对手叙拉古认为雅典不会进攻西西里，因此，在雅典军队到达时，叙拉古并没有充分的准备。雅典军队士气正旺，如立即进攻的话，是有可能战胜叙拉古的。但雅典远征军的将军们由于意见不一，失掉战机。这影响了雅典兵士的士气，而且使叙拉古有充足的时间作准备，修城墙，谴使求援。在斯巴达的援军到达叙拉古后，叙拉古并没有马上封锁港口，在攻城无望的情况下，安全的撤退军队是完全可能的。但雅典因故推迟撤军，断送了撤军的良机，最后港口被封锁。雅典海军被包围。由于多次延误战机，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阿哥斯波培米海战也是如此，雅典人由于战术的不变和海里内部将军之间的不和导致雅典海军失败。斯巴达实行以逸待劳方针，最终拖垮雅典。在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打击下。这次战役雅典 170 艘船舰全部被俘，雅典海军丧失殆尽。从整个伯罗奔罗尼撒战争来看，雅典败局已定，因为“他们一旦在海上打了败仗，他们一切很可能都完蛋了。”  
总之，海军明显占优势的雅典由于多次延误战机和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最终败于斯巴达。****四、外交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争夺希腊世界霸权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的角逐。战前，雅典控制着 300多个盟邦，可谓势力强大。但同盟内部雅典与盟邦的矛盾尖锐。公元前 454-453 年，雅典人为安全起见，把同盟的宝库由提洛岛移到雅典，同盟各国继续向金库捐款，盟金的用途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后来，为了筹备战争资金，雅典把盟国的贡金增加了近两倍。雅典的这项措施及实施的特权都引起盟邦的不满，于是出现了盟邦暴动。修氏认为这些盟国暴动的原因是“没有交纳法定数量的船舰，有时完全拒绝交纳船舰”、雅典人对“同盟国进行严重的压榨，因此他们丧失了人心”，他们的兵役超过他们应有的份额，由此不难看出，雅典对同盟国政治的奴役和经济压榨迫使盟国纷纷起来暴动。为了迫使盟国就范，雅典对叛离的盟国采取了高压政策。结果，更多的盟国暴动，迫使雅典两面作战，这大大削弱了雅典的力量。雅典因失道而寡助，同盟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远征西西里失败后，整个希腊马上起来反抗雅典。首先是优卑亚人、列斯堡人，其次是忠于雅典而著称的开俄斯人和特里亚人。失去了同盟国的支持就相当于切断了雅典的命脉。雅典同盟开始解体，雅典势单力孤，得不到支持和援助。再也无力与伯罗奔尼撒同盟抗衡。这也成为雅典失败的一个原因。****五、国际原因*** *波斯对斯巴达的支持，也促进了雅典的失败。远征西西里失败后，雅典海军的损失非常惨重，雅典同盟也开始瓦解。但斯巴达认为要想最后摧毁，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这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斯巴达求助于波斯。波斯人为了实行重新控制小亚的希腊城邦，进而染指希腊本土的目标，也乐于向斯巴达慷慨解囊。公元前 412 年夏到公元前 411 年冬，双方接连签3个条约。根据条约，波斯获得了对小亚希腊人的统治权。这样，斯巴达就利用出卖小亚希腊城邦的独立而从波斯手中换来强大的舰队。波斯为了让希腊的两大势力互相对抗，给斯巴达经济援助，正是以波斯的金钱和舰队作后盾，斯巴达的舰队发展壮大和雅典相抗衡，从而取得胜利。****此外，雅典奴隶逃亡也对战争产生了影响。*** *除上述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的内因外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奴隶逃亡对战争的影响。常年的战争致使各国兵源匮乏 ,公民兵已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于是征收奴隶入伍或雇佣外国士兵成为当时的趋向。这样 ,战争的灾难又转嫁到奴隶的头上 ,这引起了奴隶们猛烈的反抗。他们利用战争的机会大批逃亡 ,这严重削弱了雅典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远征西西里期间 ,雅典船舰上的奴隶大批逃亡 ,是造成雅典军队覆灭的因素之一;斯巴达在狄西里亚设防 ,雅典两万奴隶逃亡 , 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失败是由于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财政来源的不稳定性造成战时财力不足；内部的党争和民主政体的弊端；战略和战术的错误；同盟内部的矛盾导致盟邦的暴动；波斯对斯巴达的支持及雅典奴隶大逃亡等。这几方面成为雅典失败的主要原因。****参考文献：******[1]修昔底德, 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史海青.试论雅典党争.固原师专学报.1994（4）.******[3]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世界古代史译文集.1985.******[4]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世界历史.1994（1）.******[5] 赵芳·试析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绥化师专学报 2002 年12 月******[6]徐跃勤。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失败原因新论。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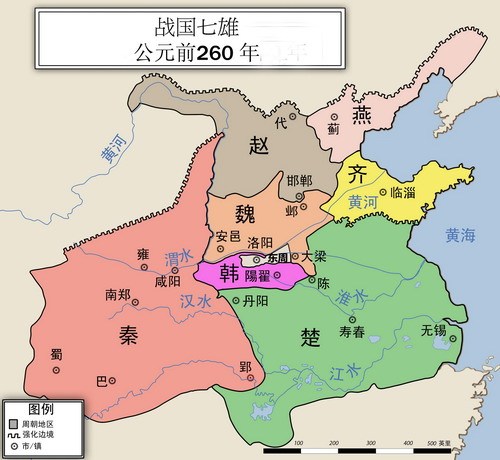
*《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 The Coming War on China》  
[https://v.qq.com/x/page/c0356f1uc05.html](https://v.qq.com/x/page/c0356f1uc05.html" \o "https://v.qq.com/x/page/c0356f1uc05.html"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Q:美国在某种方面来说真的已经和中国开战了吗？  
  
A:是的，在地上和天上。奥巴马给我们的核武器分配了上百亿美元，他还给太空武器分配了上百亿的未来预算，我们得给这么多钱找个敌人，中国是完美的敌人。  
  
比基尼岛氢弹试验后，一种由于设计大胆前卫而产生爆炸性效应的泳衣被命名为“比基尼”。在西方世界它意味着青春和健康，而在这个名字来源的地方它意味着死亡。  
  
  
转：和一个美国人谈论他的家乡，我问他，美国好像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国土面积吧，他笑笑说，其实是世界第一。他在地图上指给我看，从夏威夷、关岛、冲绳到中国南海，甚至印度洋都有他们的军事基地。然后他神情尴尬，好像说了一些不该说的。*

*东西二帝    
  
  赧王中二十七年（癸酉，公元前二八八年）  
   冬，十月，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欲约与共伐赵。苏代自燕来，齐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愿王受之而勿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伐赵孰与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释帝以收天下之望，发兵以伐桀宋，宋举则楚、赵、梁、卫皆惧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谓以卑为尊也。”齐王从之，称帝二日而复归之。十二月，吕礼自齐入秦，秦王亦去帝复称王。  
  
东西二帝 ，或曰 “齐秦互帝”，前288年十月，秦昭襄王自称西帝，派魏冉建议齐湣王自为东帝，约请共同进攻赵国。齐王问苏秦，苏秦请齐王先予接受，但暂不称帝。秦王称帝后，天下各国如果不反对，齐王再称帝。秦王称帝若被天下指责，齐王不称帝，就可以收买人心。他认为进攻赵国不如攻打桀宋（宋康王的宋国）有利。齐王同意，称帝两天就放弃。十二月，吕礼从齐国到秦国，秦昭襄王也去帝号，仍称秦王。*

*与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的齐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落？*

*[http://mt.sohu.com/20160523/n450907788.shtml](http://mt.sohu.com/20160523/n450907788.shtml" \o "http://mt.sohu.com/20160523/n450907788.shtml"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2016-04-27 20:59*

　　自商鞅变法后，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顶尖强国。除了秦国之外，魏国，赵国，齐国等都也曾经变法图强，成为战国七雄中的第一序列。在战国初期，魏国自公元前413年至公元前408年五年的时间里，连续攻秦，尽得秦河西之地，逼迫秦国退守洛水，夹河对峙。而在战国中后期，赵国则一直与强大的秦国相抗衡。当然，我们今天要说的齐国，也有过辉煌的时刻。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因为处在今天的山东地区，盛产鱼盐，所以在经济上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自齐威王开始，齐国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在约公元前353年，齐国大败魏军于桂陵，公元前341年，齐又大败魏军于马陵。由此，齐国逐渐走向强大，并在公元前314年一度占领燕国。

　　与此同时，尽管秦国可以欺负楚国，打的魏国没脾气，但是却不敢招惹当时的齐国。甚至为了拉拢齐国，秦昭襄王还要拉着齐国一起并称东西二帝。秦王晋升为西帝，齐国则为东帝。不过，自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之后，虽然齐国最终复国，但是却走上了一蹶不振的道路，再也难以重现战国中期的强盛。那么，齐国是如何衰落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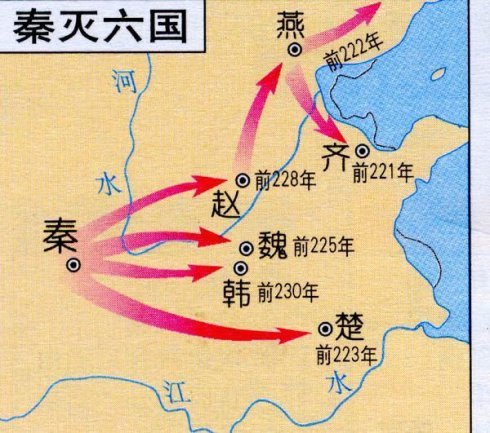


　　首先，在笔者看来，对于靠近秦国的三晋，一直敌视着秦国。如果要在齐国和秦国之间做选择的话，一定是偏向齐国的。不过，可惜的是，齐国并没有好好利用魏赵韩三个国家对秦国的仇视，也即没有拉拢三晋来打击秦国的力量。尤其是在田氏齐国后，没有给予山东六国联盟充分的重视，在战略眼光上差了秦国太多。以致于在秦始皇陆续消灭韩国、魏国、赵国、燕国、楚国等国家时，齐国竟然选择了袖手旁观。不得不说的是，战略选择上的数次重大失误，导致了齐国的强大只能是暂时的。

　　其次，对于备受秦国欺辱的楚国，齐国没有好好利用也就算了，竟然还和楚国之间搞窝里斗，这不摆明了便宜了秦国了吗？倘若齐楚之间可以一致对抗秦国，即便没有三晋的力量支持，也足够秦国喝一壶的。



　　再者，尽管齐宣王犯了不少错误，让齐国逐渐远离战国霸主的位置。不过，当时的齐国人才依然还在，国内政治也比较稳定。但是，等到齐湣王即位成为国君后，国内人才纷纷出走，忠言良策再难传到国君的耳中。尤其是在国际问题上，一是和自己的盟友楚国结怨，二是没有意识到秦国的野心和威胁。还有一个问题，齐湣王将当时富裕的宋国给吞并了。这一次吞并，给了其他几个国家联合攻击齐国找到了绝佳的借口。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齐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落，而秦国则能够走向强盛，这和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秦国占据着今天的甘肃、陕西以及四川等地区，握有山川之险，易守难攻，拥有可以伸缩的战略空间。而处在平原地区的齐国，没有山川之险可以防守，身后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在乐毅伐齐时充分暴露。所以，简而言之，齐国的衰落，是内政外交乃至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文/情怀历史

　　（漫谈东周列国志：一百十九）

****微信公众号：情怀历史ID:qinghuailishi****

## 一带一路不是“送温暖” | 王文

​https://mp.weixin.qq.com/s/v7xF-MNLP08fN-8WfmN0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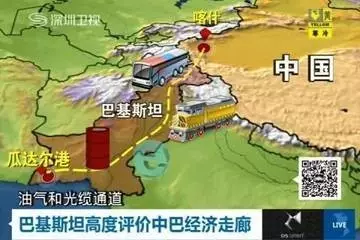
2015年笔者在波兰某重要智库调研。刚落座，对方就调侃，“您是本周我们接待的第四批中国代表团了，相信也是来谈一带一路的。我们已知晓，但就想问一个问题：中国到底能给波兰什么实际利益？”此后的谈话中，对方还反复问及中国带来的务实利益。当时笔者回应：“如果波兰不给中国一些利益，恐怕一带一路难以推进”，让对方真正知道互利互惠的重要性，也让波兰智库学者知道如何多以更长远的角度看待两国合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ID：guanchacn） 作者：王文**

“一带一路”三年多来到底取得怎样的进展，已成为国内外舆论极度关注的焦点议题。大量媒体报道与学术研究习惯用宏大词汇与不同数据概括，却往往忽视那些有血有肉“一带一路”故事背后的多面性。笔者与所在机构同事曾去过40多个国家宣讲、对话与参会，写了一些理论阐述与综合文章，这次想用十段简短的亲历故事透析“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复杂与不易。

**亲历故事一：**

在某区域大国的双边《共建备忘录》谈判桌旁，笔者作为中方三位文本谈判代表之一，一度如坐针毡。文本中原则性的问题，谈得相当快，但僵局陷在具体重大项目的囊括上。对方急切借“一带一路”重大契机发展本国经济，把国内许多重大项目都往《共建备忘录》里塞，甚至还说，“中国在巴基斯坦怎么做的，也可在我国那么做”。但那些项目大大超出了原本预设的双方项目初稿。中方谈判人员不得不就每个新增项目临时打电话回京，寻求相关机构帮助。结果发现，至少相当一部分新增项目是不宜于加入“一带一路”共建协议的。



这次谈判提醒我们，不仅要为“一带一路”目前得到全球多数国家的支持而喜悦，也要防范一些国家的过高期待以及项目合作中的“大包大揽”。

前三年，“一带一路”为了更快地推进与国外的合作，与40多个国家签署相关合作备忘录，赢得了10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公开支持，做大做强“一带一路”的全球影响力，进而推进中国下一轮开放势头，这是无可厚非的。下一步中国需要防范“贪多嚼不烂”，虽还要努力做大项目、签大协议、寻求大国支持，但也要从小处着手，完善小细节，严防小纰漏，注重小条款。毕竟，“一带一路”已经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接下来要进入“精耕细作”期。

**亲历故事二：**

在肯尼亚，笔者调研该国100年来第一条铁路：从最大港口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这条铁路完全由中国企业承建。所接触到的当地官员、民众都对中国感激不尽，也对中国系统的运营前景充满信心，给了中国企业未来多年的运营权，希望中国能够“传帮带”肯尼亚人的铁路运营经验，以便实现肯尼亚经济的可持续性自主发展。但令人诧异的是，日本某公司在铁路沿线投资了公路及相关基础设施，意在对“蒙内铁路”展开营运竞争。

IMG_257

这个项目警示我们，在经历千辛万苦而取得“一带一路”许多重大项目突破性进展之后，更要继续戒骄戒躁。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在还债，即两三百年前，欧美企业就已走向世界，已有无数的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布局。中国企业以物美价廉、合作共赢等方法与西方企业在全球市场分蛋糕、做蛋糕，体现了不断提升的中国式软实力，但同样引起了西方企业的警觉、竞争甚至是市场的反扑。

走到一个新的国家，拿下一些大项目，如同“打天下”，但“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中国崛起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之路同样不容易，而“一带一路”的推进进程则必将是不平坦之路的集中折射。对此，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中国国内舆论、学者、政府都需要持有长期的平常心。

**亲历故事三：**

义乌是“一带一路”贸易领域的重要支点城市。这些年义乌对外贸易连续多年以两位数增长，2015年更是实现了进出口总额增长41.5%，这在全球贸易多年平均增长仅3%左右的大背景下，无疑是巨大的亮点。当地官员与商户告诉笔者，义乌批发的小商品物美价廉，不同于欧美奢侈品牌，很对“一带一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胃口。

两年前，“义新欧”班列开通，目前已来回数百趟，在义乌小商品城专门开设了“进口馆”，足不出户就能一手购买到数十个国家的商品，义乌实实在在受益于“一带一路”。

IMG_258

这个案例典型反映了“一带一路”的务实性。不可否认，在义乌数次调研，笔者也看到了一些中小企业在信息化时代转型升级不力、陷入窘境甚至破产的现象，但那不是普遍现象。

诸多地方企业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主，主流想法都是想图变，希望在未来能借“一带一路”，审时度势，实现企业的“凤凰涅磐”，此时，各级政府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优惠政策，创造条件，帮助诸多中小企业顺利转型升级，是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责任。

**亲历故事四：**

2015年笔者在波兰某重要智库调研。刚落座，对方就调侃，“您是本周我们接待的第四批中国代表团了，相信也是来谈一带一路的。我们已知晓，但就想问一个问题：中国到底能给波兰什么实际利益？”此后的谈话中，对方还反复问及中国带来的务实利益。当时笔者回应：“如果波兰不给中国一些利益，恐怕一带一路难以推进”，让对方真正知道互利互惠的重要性，也让波兰智库学者知道如何多以更长远的角度看待两国合作。

这段回忆至今如鲠在喉。当下，“一带一路”研究与对外交往多是强调给对方带来利益，生怕对方不愿合作，这代表着中国走向世界进程的诚意与善意。但必须注意，类似的善意、诚意有时也会助长一些区域大国的傲慢，甚至是偏见，误以为中国主动送上门的合作意愿，意味着中国有求于他们。事实往往相反，中国走出去是相互需求的结果，不是谁求谁，更多时候，中国是合作的“甲方”。



“一带一路”追求合作不是中国无偿让利，而是共赢。对方要赢，但中国也要赢。全球面临着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贸易增长萎靡不振、各国基础设施落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发展经验有助于世界的未来，越来越多国家主动寻求对华合作。因此，对外合作，也需要自信。这应是未来“一带一路”进程的重要规则。

**亲历故事五：**

在某拉美大国调研，与一位国企老总交谈。问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他没有指涉美国、日本或欧洲公司，而是谈到同行业的某些中国公司，还列述了一些项目竞标过程中国公司竞相压价的难堪与尴尬，末了感叹“全是中国一带一路品牌在埋单”。他的另一句话更加令我瞪目，“中国企业不怕与任何发达国家在海外竞争，但很害怕与国内企业在竞争。”他暗示，国内企业有时会出现竞相压价、不守规则的现象。

这类竞争状况当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市场化表现，但也折射了“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一些企业蜂拥而出，以“占领市场份额”为唯一战略目标的盲目扩张性。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强化企业“走出去”进程的行业管理与规则制订，提升中国企业的品牌，打造“百年老店”式的企业，目前看来越来越变成了“一带一路”当务之急。

**亲历故事六：**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笔者曾给来自中欧各国上百位企业家、商会负责人与政府官员宣讲“一带一路”。课后，副州长感叹道，没想到近两小时的课程，下面竟如此鸦雀无声地听讲，他们太渴求知道“一带一路”的真实故事与实际情况了。一些企业家的问题显得非常基础，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中到底有哪些内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到底会持续多久？等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中国的思想供给还远远未跟上。



*奥地利萨尔茨堡*

类似感叹许多出国调研的学者都曾遇到过，致使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压力倍增。笔者在数十个国家宣讲“一带一路”，遇到更多的问题不是听众的刁难，而是一些“一带一路”的基础知识。这些年，国内已有数百万篇的一带一路新闻报道，但外语传播的有效性、广泛性仍不够，如何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更多深入人心的传播中国信息，借助电影、文学等脍炙人口的方式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传播好中国故事，涉及到话语体系、传播机制、运营人才等对外传播方面更深化的供给侧改革，可谓任重道远。

**亲历故事七：**

在阿斯塔纳，几位哈萨克斯坦学者当面感叹道：一带一路令中哈两国走近，但许多哈萨克斯坦人在社会心理上仍觉得与欧洲国家更近。的确，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与西方的心理距离也是更近的。事实上，恐怕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北京飞到新疆自治区省会乌鲁木齐需四个小时，而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飞到乌鲁木齐却仅需一个小时。笔者曾问过一个研究生班的学生，有谁能说出“中亚五国”的首都？结果没有任何一位同学能立刻背出。

IMG_261

这种反差是对中国社会心理的重大告诫。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国外通常指的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却忽视了多数邻国尤其是中亚国家的存在。“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社会的心理中是一个巨大的盲区，是中国人的全球观失衡的重要表现。目前，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签证采取免签、落地签的方式，这是调适民族心理的重要基础。中国舆论不妨多建议普通民众，多加强与邻国的互动，多到“一带一路”国家走走看看，完善中国人心理的地缘观。这也是一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领域的重大工作。

**亲历故事八：**

这些年，笔者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个别城市商场、景点能直接花人民币，有的商家甚至还用人民币标价。在春节期间，曼谷与北京的航班数量竟超过了“中国航班最忙碌”的京沪线。“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在东南亚有极大的优势，使得资金融通领域也水涨船高。不只是在东南亚国家，笔者在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的一些著名景点，发现几乎所有当地人都会用“你好”、“谢谢”与中国人打招呼，而人民币在一些小摊点上，也呈现出了非常强劲的适用性。

IMG_262

这种交易仅仅是开始。中国虽已与23个国家实现了货币的直接交易，但仅有8个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资金融通”为目标的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内容“五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发挥着人体血液般的作用，保证一带一路的经济运行稳定，促进区域可持续投融资机制的构建，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的爆发。

不过，相比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目前看来，资金融通在“一带一路”的“五通”中刚刚开始发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利贸易和投资，让金融合作成为“一带一路”新引擎，这应是可预见的期待。

**亲历故事九：**

2016年夏天，孟买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会议，全球治理是讨论重点，提及基础设施建设时，一些印度学者都推崇中国的贡献。

在与印度民众对话时，也很容易感受到对方近年来快速升腾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自信心以及对中国的羡慕。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笔者，“很想去中国。中国比印度富，但印度未来也会越来越好。”另一位贫民窟里的印度教徒说，莫迪总理让我们看到的希望，我们也有梦想，就像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那样。

不过，一旦谈起“一带一路”，他们就显得有些拘谨。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多数印度智库都有各自的想法，使得“一带一路”南亚段的进程变得复杂。

IMG_263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剧照*

这种纠结是一些区域大国的典型体现，包括德国、土耳其等区域大国也有部分学者存在类似纠结。一方面他们希望与中国合作，搭中国的经济增长便车，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向中国取经，与此同时，他们也焦虑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怕中国过于压制本国在本区域的影响力。事实上，“一带一路”不是零和博弈，共赢价值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如何深入全球人心，在区域大国尤其显得迫切。

**亲历故事十：**

2016年4月18日，笔者所在机构与美国著名智库CSIS共同举办了“中美一带一路智库对话”，据说这是在华盛顿第一次举行的一带一路主题中美对话，上百位官员、学者与相关人士听取了对话会的新闻发布。一位官员说，为何会有这次对话，因为美国开始严肃地思考“一带一路”。

一年多来，笔者还曾两次去美国国务院宣讲一带一路，都有数位执行层面的中层官员问询“一带一路”的逻辑。他们不是完全排斥“一带一路”，而是想急切了解“一带一路”的真实情况。

IMG_264

这些反馈在近期中美交往中得到了更多应证。从近年来数十份美国公开智库报告上看出，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在“一带一路”的看法有松动。2017年4月初“习特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美国加入一带一路。这是第一次中国主动向美国伸出“一带一路”橄榄枝，获得了美国的积极回应。可以预见，中美在“一带一路”展开重大合作的可能性更是越来越大，而这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全球新进程。

以上十个故事并非是最典型的，却是笔者亲历的。当然，亲历远不只这些，而这篇文章用故事的方式讲述，是希望引起更多的社会共鸣与学术思考。“一带一路”是显学，也是新学，它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实践到实践，是“需要脚底板走出的学问”，需要调研出来的研究结论。

诚如笔者此前曾说，“一带一路”的框架性、战略意义式的研究已终结，下一步关键是要推进案例式的研究。“一带一路”不能只有干巴的数据、生硬的道理，更要有活生生的、丰满的一个个故事。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不只是对外交、外宣、智库、学术、媒体等机构层面有重大意义，对文学、电影、哲学、旅游等个人层面同样意义重大。

本文首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在非洲的最高战略是输出语言和文化**  
尽一切手段让汉语普通话成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官方语言。为什么呢？  
在未来几十年里，非洲大陆人口将会达到20-30亿，东南亚人口会有十亿，中国十五亿，周边国家比如中亚、东北亚、蒙古未来大概3-5亿。未来几十年有潜力让中国借助全球化输入语言文化的人口加上中国大陆总和50亿左右。把握住这部分人口未来的文化走向，就有更大希望支撑未来中国登顶蓝星的人口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再加上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势语言会越来越强势，弱势语言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国际通用语这个问题上，是第一通吃的游戏规则。未来有竞争力的语言、只有汉语、英语、西班牙语、印地语、阿拉伯语、俄语。语言要想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存活下去，  
1， 有一个强大文明的主体语言国家（文明的高度够高）  
2， 人口足够多（禁得起历史考验，大起大伏的兴衰）  
3， 分布要足够广（文明主体一旦衰落了还有外围补充）  
符合三个条件的只有英语，符合1,2条件的只有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俄语的未来取决于主体文明能否崛起。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等小语种注定要消亡，就算暂时不消亡也只能成为单一民族的地区语言，影响力是局部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不可逆的，人类终究会融合在一起。人类融合也许需要几百年，也许会发生三次四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但是只要人类不灭亡，互相联通融合是一个曲折前进但是不可逆的进程。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意识创造的产物，国家、民族、孤立的文化、局部的语言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消亡。哪个文明成为世界语言，哪个文明就有更大的机会作为人类的主体文明存留下来。  
  
中国要成为人类主体文明，有一个很大的劣势。英语、印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背后都有一个宗教。除了印地语，剩下几个背后都是一神教。一神教包裹在现代文明的面纱下的本质，仍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神教有强烈的冲动，要么你归顺（传教），要么灭掉你（异教徒）。复兴并重新诠释儒家思想刻不容缓，孔子学院是一个好的开始，做比不做强。儒家思想、印度教、一神教都是农业文明创立的，重新诠释儒家思想应该站在大工业文明的高度，应该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理念应该能够不断进化而不是墨守成规的，理想应该是走出蓝色地球奔向星辰大海。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一个匹配高维文明的新儒家思想。  
  
以上这些思考并不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功利目的，而是为了全人类的最大利益。  
  
未来的世界国家，应该是以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融合的形式建立的---汤因比。  
  
这种融合进程要想不被毁灭人类的战争终止，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力量，这个媒介有足够的广度、深度和胸怀，能够兼收并蓄。这个力量必须脱离所谓的“民主国家”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必须有意识地从哲学角度去思考全人类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历史和文明的沉淀，必须有漫长的文明整合史，必须有意识地遏制自己动用武力的冲动。而西方文明是不合格的，如果以西方文明为主体去构建世界国家，结果很可能是非常暗淡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可能还没有走出蓝色星球就自我毁灭了。  
  
**中国在非洲第二位的战略是输出工业化**  
一个工业化的非洲从底部挤压初级工业制成品市场。一个工业自动化的中国从中部挤压工业品市场。这决定了在未来几十年，初级、中级工业制成品价格刨除自然资源成本之后的利润率必然长期偏低。中国的基础设施成本是很有竞争力的，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土地成本低，水资源、电资源成本不会太高。即便非洲教育水平低，劳动生产率偏低，政府管理能力差，但是在有限的工业园区可以交给中国来打理。  
印度工业化要想成功，要么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比非洲更低，要么管理能力、组织能力更强，生产率更高。只有这样印度工业才能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否则就必须更依赖于市场保护，通过内需完成工业化。印度保护自己的初级工业品市场，打开别国的市场就需要另外付出其他筹码。  
中国的未来不可能继续依赖低端的服装鞋帽玩具或者纯粹的三来一补，就算想做环境也受不了，向中高端发展是唯一的活路。那么这些产业转移给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非洲，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他们的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这些国家要工业化，就没有动力出口自然资源，印度想发展工业就必须更多地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  
  
大国与大国的关系本质是竞争。合作、协调、遏制与冲突都是手段，根本还是竞争这个主题。中国的未来发展空间需要太平洋和印度洋，必然要跟印度洋的印度象产生矛盾。这个矛盾随着中印的崛起越发突出。以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方法，通过长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经济手段削弱印度发展潜力，耐心塑造印度分裂的态势，符合中国的利益。一个分裂的印度，会极大的拓展中国的地缘空间，极大的减少中国崛起的牵制力量。

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 中国角色与作用

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6862.html

作者：胡鞍钢    单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发布：2017-02-21

全球市场促进全球竞争，全球竞争助推全球创新，全球创新驱动全球发展，全球发展为了世界人民。当全球化的大潮遭遇“逆全球化”的险滩，更需要中国扛起“新全球化”的大旗。

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介绍三次全球化演进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的“逆全球化”即贸易占GDP比重下降的经济表现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政治表现及其现实原因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的不利冲击，进而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相关国际协定，重点提出了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上更平衡、安全上更稳定、经济上更开放更包容、文明上更非排他、生态上更可持续的“新全球化”体系，最后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和“逆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将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国和”，搭好台唱好“主角”，积极倡导“共赢主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形成“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推动“逆全球化”迈向“新全球化”，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创、共建、共享发展红利、机会红利、方案红利等开放红利。

 一、引言：全球化的大历史演进

 全球市场促进全球竞争，全球竞争助推全球创新，全球创新驱动全球发展，全球发展为了世界人民。[[①]](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 \o ")贸易创造市场，而市场刺激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市场规模往往决定了一国工业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各国的规模化生产、创新性发展、大范围贸易、持续性增长，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形成了全球化发展的源源不断动力。全球化是指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通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形成世界范围的分工、交换（贸易）、流动（资金、人员）的“时空压缩”现象。

纵观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曾先后出现了三次全球化，推动了各国经济贸易投资的一体化，推动了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并超过此前的任何时期，每次约持续40年左右的时间（见表1）：

第一次全球化是1870年至1913年，世界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1%，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1.30%，36个国家的铁路长度从1870年的19.1万公里上升至1913年的近100万公里，极大地促进要素国内与国际之间流动，先行工业化的国家走向海外，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贸易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870年的5%上升至1913年的8.7%。这一时期殖民主义达到顶峰，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世界性的全球化，之后又爆发资本主义大危机，接着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50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8%，世界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仍未能超过1913年，只有7%。而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870年的2.5%下降至1913年的1.8%，是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②]](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2" \o ")

第二次全球化是1950至1990年，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集团以军备竞赛为背景，展开了两大市场内部的跨国分工与合作，并在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相继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全球化机构，这一时期世界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1%，世界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6%，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950年的7%上升至1990年的15.5%。而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先下降、后上升，从1950年的1.7%下降至1973年的0.6%，仍是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到1990年上升至1.8%。[[③]](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3" \o ")

第三次全球化是1990年以来，其中上半段截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上承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中国、印度等超级人口国家参与到全球化之中，跨国公司成为驱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全球生产体系和贸易市场，世界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9%，仍高于世界GDP增长率（3.5%），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15.5%上升至2008年的25.8%，进口额占GDP比重从15.8%上升至26.2%，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出口额从621亿美元上升至14307亿美元，增长了23倍，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1.8%上升至2008年的8.9%，是这一时期占世界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

下半段则下启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全球经济复苏乏力，2008-2015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是195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国际贸易低迷，世界出口额增长率为0.28%，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从25.8%下降至2015年的22.6%，进口额占GDP比重从26.2%下降至22.7%。这是1950年以来之后第一次“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贸易投资高度一体化的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先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货物贸易持续增长，从2008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6万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4.30万亿美元，而后逆转，2015年下降至3.96万亿美元，货物出口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31.4%下降至2015年的20.9%，下降了10.5个百分点，这一比例也低于世界平均比重，中国也成为“逆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当中国能在世界全球化逆流之中挺身而出，主动倡导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新全球化”，高举“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三面大旗，支持国际社会（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以及G20集团、金砖五国等主张，如2016年杭州会议所通过的《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投资指导原则》等，是有可能使此次全球化至少延续到2030年，也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创造全球化条件。

****表1  三次全球化的比较（1870—2030）****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次全球化**** | ****第二次全球化**** | ****第三次全球化（上）**** | ****第三次全球化（下）**** |
| 时间 | 1870-1913年 | 1950-1990年 | 1990-2008年 | 2008-2030年 |
| 主导国家 | 英国等西欧国家 | 美国等北方国家 | 美国等北方国家、中国 | 中国、美国、欧盟、南方新兴国家 |
| 工业革命 | 第二次工业革命 | 第三次工业革命（上） | 第三次工业革命（下） | 第四次工业革命 |
| 基本特征 | 帝国主义时代、全球资源掠夺、殖民主义时代 | 冷战时代、霸权主义时代，南北大趋异 | 后冷战时代、霸权主义时代，中印等国兴起、南北趋异趋缓 | 共赢主义时代，南方国家兴起时代、南北大趋同 |
| 国际组织 |  |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GATT）、G7（1976） |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G8（1998） |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G20（2008） |
| 企业形式 | 公司制度逐步形成并完善 | 公司海外业务拓展 | 跨国公司大量出现 | 全球企业兴起，互联网公司蓬勃发展 |
| 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 | 从1870年的5%上升至1913年的8.7% | 从1950年的7.0%上升至1990的15.5% | 从1990年的15.5%上升至2008年的25.8% | 从2008年的25.8%下降至2015年的22.6% |
| 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 | 从1870年的0.7%上升至1913年的1.4% | 从1950年的1.9%上升至1990年的17.3% | 从1990年的17.3%上升至2008年的31.4% | 从2008年的31.4%下降至2015年的20.9% |
| 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 从1870年的2.5%下降至1913年的1.8% | 从1950年的1.7%下降至1973年的0.6%，1990年上升至1.8% | 从1990年的1.8%上升至2008年8.9% | 从2008年的8.9%上升至2015年的13.8% |
| 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 |  | 从1970年的0.5%上升至1990年的0.91% | 从1990年的0.91%上升至2007年的5.23%，2008年下降至3.76% | 从2008年的3.76%下降至2015年的2.87% |
|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 |  | 从1983年的0.3%上升至1990年的0.9% | 从1990年的0.9%上升至1994年的6.0%，到2008年下降至2.1% | 从2008年的2.1%下降至2015年的1.2% |
| 世界国际  移徙人数 | 欧洲向海外移民1750万人，中国、印度向东南亚移民 | 从1960年的7188万人上升至1990年的1.05亿人 | 从1990年的1.05亿人上升至2010年的2.21亿人 | 从2010年的68万人上升至2015年的98万人 |
| 中国国际  移徙人数 |  | 从1960年的25万人上升至1990年的32万人 | 从1990年的32万人上升至2010年的68万人 | 从2010年的68万人上升至2015年的98万人 |

注：国际移徙人数是指在一国出生并在其他国家居住的人口数量，也包括难民。

资料来源：1870—1950年的进出口额、GDP数据来自Angus Madison，1996，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OECD，Paris；1960年之后的进出口额、外国直接投资额、GDP、国际移徙人数等数据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如何分析世情？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形势？习近平指出，“世界经济仍然在深度调整，复苏动力不足，增长分化加剧。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但同时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④]](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4" \o ")这就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当前“逆全球化”的具体表现、深层次原因和后果是什么？什么是“新全球化”？如何推动实现？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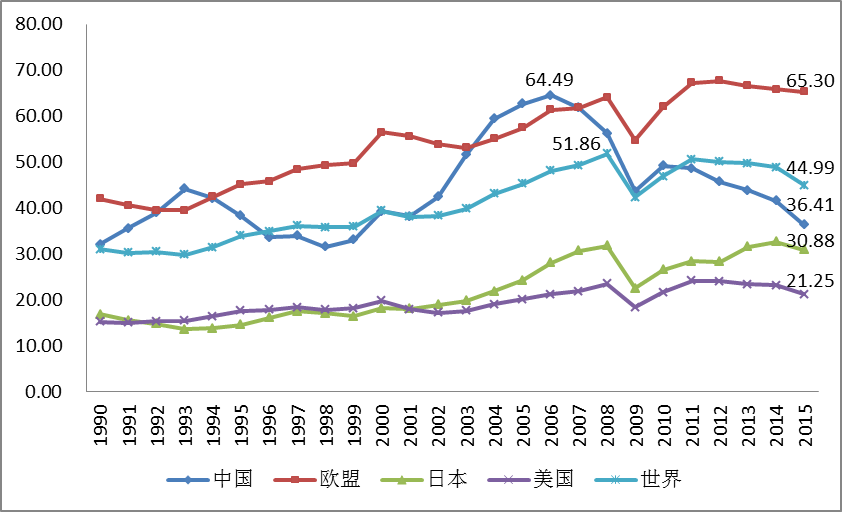
  二、“逆全球化”的表现、原因及后果

## （一）“逆全球化”的经济政治表现

衡量全球化最重要也是最客观的指标，是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并于2008年达到顶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31%上升至2008年的51.86%，其中美国从15.23%上升至23.49%，欧盟从42.03%上升至64.10%，日本从16.85%上升至31.84%，中国也从32.16上升至56.23%（最高点为2006年的64.49%），在1990-2006年间翻了一番，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见图1）。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全球化逆转的“分水岭”，随后出现了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逆全球化”。由图1可知，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1.86%下降至2015年的44.99%，下降了6.87个百分点，相当于倒退回本世纪初的水平。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下降了2.24、-1.2和0.96个百分点。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相比国内生产总值（GDP）2.5%的增长率，2016年全球贸易额增长率仅为1.7%，是近15年来全球贸易增长率首次显著低于GDP增长率。

****图1  世界及主要经济体商品贸易占GDP比重（1990-201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TG.VAL.TOTL.GD.ZS。

面对经济复苏乏力、跨国贸易投资低迷的新形势，加之南方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等北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的思潮。长期以来北方国家民众对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倾向所取代，抗议反对资本全球扩张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曾经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纷纷走上向内的道路，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2016年6月，英国脱欧，暴露出欧盟发展多重困境，形成了“看空”欧洲前景甚至疑欧、反欧的政治势力和社会风向；2016年9月，部分国家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应标准产生不满情绪，表明以美国为主导的两大跨洋区域贸易安排正在产生内部裂痕和“硬伤”；2016年11月，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出反对全球化、要求重新谈判WTO等保护主义言论，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可能使“逆全球化”进一步恶化，殃及世界各国，也会殃及中国。

## （三）“逆全球化”的现实原因

究其根本，产生“逆全球化”的深层次原因有三：第一，全球贫富悬殊拉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也包括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自由贸易果实通常被大企业和精英阶层享有，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人群等弱势群体获得利益少，从而出现反分配不公和反财富鸿沟；第二，各国失业问题凸显。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全球失业率从2015年的7.6%提高至2016年的8.6%[[⑤]](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5" \o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7年全球失业人口将新增340万人，超过2亿人[[⑥]](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6" \o ")。由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布局，全球生产和外包体系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广大南方国家，导致欧美日北方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失业工人增加，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群体，尤其反对货物、人员、服务、资本“四大自由”中的人员自由流动；第三，国家民族主义回潮。全球化作为一种国家主权的让渡，从经济角度去国家化，会引起本国政府的不满。特别是在债务危机、移民融合失败、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难题面前，北方国家更倾向于转向熟悉的“民族国家”，甚至是种族认同、宗教认同，使得政治整体趋向保守、经济整体趋于内向；第四，北方国家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发源地，并波及到世界，美国和西方非但没有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作用，反而带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殃及南方国家，中国成了最大的众矢之的，全球治理面临“领导力赤字”。

## （四）“逆全球化”的不利冲击

对中国而言，“逆全球化”使得中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转而成为最大受害者。由图1可知，中国商品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6.23%下降至2015年的36.41%，下降了19.82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将进一步下降至33.4%，相当于1999年的比重（33.1%），意味着倒退了17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未能实现进出口贸易增长预期目标，连续两年负增长且超过1998年情形。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24.3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下降0.9%，其中下降2%，进口小幅增长0.6%，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十二五”时期，我国外贸实际增速仅为5.9%，未达到年均增长10%左右的预期目标，2015年货物进出口贸易为3.96万亿美元，比4.8万亿美元预期目标低了17.5%，[[⑦]](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7" \o ")同时外需直接下降，直接影响了“十二五”的经济增长率下行，为7.8%，是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最低的。

对各国特别是北方国家而言，“逆全球化”特别是“反全球化”，意味着“双输”或“多输”，是短视的、得不偿失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逆全球化”不等于“反全球化”，前者更多是客观的经济现象，后者则是人为的政治行为，“逆全球化”引发“反全球化”，“反全球化”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部分北方国家把“逆全球化”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借口，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本国的国际贸易失衡、工人失业、难民问题都归因于全球化，人为切断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等交流与合作的纽带。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⑧]](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8" \o ")“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逆全球化”不仅破坏了世界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也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和世界潮流，还将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已有成果。

# 三、“新全球化”：打造传统全球化升级版

## （一）全球化基础和“新全球化”必要性

危中有机，转危为机。“逆全球化”是当前及未来时期全球性最大的发展挑战之一，无论是对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来说，都深受其害，除非使其转变为“新全球化”。

从历史视角看，全球化仍然是21世纪世界大势所趋，不会再出现类似于一百年前因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大萧条导致第一次全球化的中断。首先，当今世界既不是殖民主义时代，也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和平遇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其次，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也无法同日而语，以对世界贸易增长的冲击为例，直到1938年，全球出口总额相对1929年还减少了31.3%[[⑨]](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9" \o ")；再有，与一百年前相比南方国家正在迅速兴起，经济贸易实力（指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经济贸易的力量。全球化的方向是明朗的，但道路还是曲折的，不可能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复杂性、脆弱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将客观存在。

从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基础和动力机制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投资和贸易体系，这是全球化得以实现的有效载体；三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特别是经济日益服务化、虚拟化的北方国家与从事制造生产和资源供给的南方国家之间的流动和互补，这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四是南方国家崛起成为全球化的新主导力量，从国家生命周期看，发达国家因发达而成熟，也会因发达而老化，更像日落的晚霞，而发展中国家因年轻而不足，却是朝气蓬勃，如同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但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下行期，不可避免地激化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也暴露出北方国家主导下传统全球化的诸多弊端。“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⑩]](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0" \o ")打造传统全球化的升级版，推动实现“新全球化”，可谓是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二）“新全球化”的五大目标

何谓“新全球化”？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新全球化”基于四大原则：第一，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二，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第三，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第四，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11]](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1" \o ")“新全球化”立足五大目标：一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2]](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2" \o ")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3]](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3" \o ")

本文以上述五大目标为纲，结合相关国际协议特别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纲举目张，初步搭建了“新全球化”的主体框架和指标体系：国际秩序上，从不平衡到平衡，作为实践“新全球化”的主要途径；安全格局上，从不稳定到稳定，作为打造“新全球化”的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上，更加开放和更加包容，作为遵循“新全球化”的基本原则；文明成果上，从排他到非排他，作为系牢“新全球化”的坚固纽带；生态体系上，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作为着眼“新全球化”的持久未来（见表2）。

****表2  “新全球化”主要特征和指标一览表****

|  |  |  |  |
| --- | --- | --- | --- |
| ****方面**** | ****与传统全球化的不同之处**** | ****主要指标**** | ****来源**** |
| 国际秩序 | 从不平衡到平衡 | 南北国家贸易实力占比 |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1月1日）目标10“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
| 南北国家经济实力占比 |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1月1日）目标10“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
|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建设 | 《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2016年9月） |
|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 | 《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关于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2016年9月） |
| 国际组织南方国家参与度、  国际协议南方国家签署度 | 二十国集团中南方国家占11席、金砖国家均为南方国家；国际组织中南方国家数量众多 |
| 官方发展援助 |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15年7月15日）提出发达国家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包括将国民总收入的0.15％-0.2％用于最不发达国家 |
| 安全格局 | 从不稳定到稳定 | 难民人数 |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4年4月22日）；世界银行组织成立全球危机反应平台，支持中低收入国家难民及其接受地。 |
| 核武器不扩散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3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材料的实质保护公约》（1980年3月3日） |
| 犯罪率（杀人犯罪率）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年《人类发展报告》 |
| 裁军和限制军备水平 | 如《反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2003年）、《禁雷公约》（1997年）、《化学武器公约》（1993年）、《宣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1990年） |
| 恐怖主义事件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年12月17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997年12月15日）、《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年12月9日）、《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5年4月13日） |
| 经济发展 | 从不开放到开放 | 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  跨境电商、贸易融资） | 《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工商界（B20）2016政策建议案》提议建立电子全球贸易平台（eWTP) |
| 投资自由化（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 | 《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2016年9月） |
| 贸易服务便利化 |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2016年底前批准） |
| 从不包容到包容 | 基尼系数 | 《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 |
| 失业率 | 《二十国集团创业行动计划》（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促进高质量学徒制倡议》（2016年9月） |
| 女性就业率 |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1月）目标5、《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2016年9月） |
| 贫困发生率 |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1月）目标1、《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2016年9月） |
| 互联网普及率 | 《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年9月） |
| 人类发展指数（HDI）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年《人类发展报告》 |
| 文明成果 | 从排他到非排他 | 种族、宗教多样性 |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10日）第2条 |
| 语言（母语）多样性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11年11月2日）第5条 |
| 文化遗产多样性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11年11月2日）第7条 |
| 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多样性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11年11月2日）第8条 |
| 生态体系 | 从不可持续到  可持续 |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等）排放量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3月21日）、《巴黎协定》（2015年12月）、《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 |
|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 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3月）、《关于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1988年9月） |
| 提高能效、可持续能源项目、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 《二十国集团能源合作原则》（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能效引领计划》（2016年9月） |
| 节约用水 | 根据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第十八章，从1993年开始，确定每年3月22日为“世界水日” |
| 生物多样性 | 如《生产多样性公约》（1992年6月5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1951 年） |
| 绿色贸易  （环境产品减免关税） | 世界贸易组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中） |
| 绿色金融  （绿色投资、绿色债券） | 《二十国集团绿色金融综合报告》（2016年9月） |

作者根据世界组织及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资料整理。

### 1****．国际秩序：从不平衡到平衡****

二战后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主要由北方国家主导，以美国为首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并将美国标准、欧盟标准和“国际标准”推向世界。然而南方国家崛起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表3可知，南方国家正在不断追赶北方国家，其中中国作出巨大贡献。从贸易实力来看，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均从1990年的“二八开”上升为2015年的“四六开”，南方国家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3.92%上升至42.1%，进口比重从21.51%上升至38.93%，商品贸易比重从22.71%上升至40.51%，服务贸易比重从18.48%上升至34.52%；从经济实力来看，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南方国家GDP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超过北方国家，未来还将进一步拉开差距。总而言之，当今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加快演变，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必将推动国际秩序从过去不平衡的“北方治理”向平衡的“南北共治”转变。

****表3  南北方国家及中国贸易实力、经济实力占世界总量比重（1990-2015）****

****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0 | 2000 | 2005 | 2010 | 2015 |
|  | 商品出口实力 | | | | |
| 北方国家  南方国家  中国 | 76.08  23.92  1.78 | 70.84  29.16  3.83 | 65.18  34.82  7.20 | 59.05  40.95  10.24 | 57.90  42.10  13.72 |
|  | 商品进口实力 | | | | |
| 北方国家  南方国家  中国 | 78.49  21.51  1.50 | 75.01  24.99  3.36 | 70.64  29.36  6.09 | 63.12  36.88  9.01 | 61.07  38.93  10.07 |
|  | 商品贸易实力 | | | | |
| 北方国家 | 77.29 | 72.96 | 67.94 | 61.09 | 59.49 |
| 南方国家 | 22.71 | 27.04 | 32.06 | 38.91 | 40.51 |
| 中国 | 1.63 | 3.59 | 6.64 | 9.63 | 11.89 |
|  | 服务贸易实力 | | | | |
| 北方国家 | 81.52 | 75.36 | 74.51 | 69.38 | 65.48 |
| 南方国家 | 18.48 | 24.64 | 25.49 | 30.62 | 34.52 |
| 中国 | 0.57 | 3.70 | 3.11 | 3.37 | 7.78 |
|  | 经济实力（PPP，2011年国际美元） | | | | |
| 北方国家 | 61.11 | 59.90 | 55.54 | 48.82 | 44.94 |
| 南方国家 | 38.89 | 40.05 | 44.46 | 51.18 | 55.06 |
| 中国 | 3.69 | 7.43 | 9.83 | 13.99 | 17.26 |

注：以OECD国家作为北方国家，其余为南方国家，数据系作者估算。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 ****2．安全格局：从不稳定到稳定****

当前世界仍不安宁，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因素错综交织，安全冲突和动荡、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不容忽视。自诩为“全球警察”的美国，已经成为二战后发动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2—2015年阿富汗年平均难民数达到259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0，成为世界第一大难民来源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03—2010年伊拉克年平均难民数达到126万人。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因此战争发起方需要反思，究竟是输入全球化？还是输入灾难？

“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14]](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4" \o ")安全发展是开放条件下追求发展过程的积极安全观，是应对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的共同理念。各国应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维护系统性安全，构筑好政治安全这一根本保障，国土、经济和生态安全这一发展基础以及社会、文化、科技和信息安全这一重要载体，处理好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裁军和限制军备等议题。

### ****3．经济发展：更开放，更包容****

“新全球化”应更倡导包容性和互利共赢，经济上根据《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等，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便利化，降低关税总体水平，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重新振兴世界贸易；政治上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增强发展包容性，着力降低基尼系数、失业率、贫困发生率，提高女性就业率、互联网普及率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不仅使广大南方国家受益，同时使北方国家也继续受益，不仅使精英群体收获应有回报，也使普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惠及更广泛的国家和人民。

### ****4．文明成果：从排他到非排他****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文明本无优劣之分、高低之别、好坏之说，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智慧、贡献和积淀。对待本国文明，要充分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承好、创新好、传播好本国的优秀文明果实；对待别国文明，要充分尊重差异性，平等对待不同处，将造成冲突和张力的文化差异扼杀在源头上，各种文明既不自我优越，也不盲目自卑，更不排挤他国，而应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共同文明实现创造性、创新性发展。

### ****5．生态体系：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

“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15]](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5" \o ")环境保护是一项全球性系统工程，是全世界人民最普惠的福祉。在“新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应该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二十国集团能源合作原则》、《二十国集团能效引领计划》等文件，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引导生产方式与碳排放脱钩，推动节能减排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创新绿色贸易、绿色金融，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 四、中国贡献、中国机会与中国方案

狭路相逢勇者胜，沧海横流显本色。“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世界经济需要“稳定器”，世界贸易需要“加速器”，世界创新需要“发动机”，全球治理需要“担当者”。当前西方世界扛不动自由贸易大旗的现实困境，正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天时”，欧洲为两次世界大战打得不可开交之后，邀请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今虽谈不上谁邀请，但客观上确实到了中国考虑如何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战略机遇期。此外，

周边大国崛起（指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成为中国的“地利”机遇，特色大国伙伴关系网络成为中国的“国和”机遇。

在“天时”“地利”“国和”的背景下，中国应当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受害者，积极转变为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全面参与全球治理[[16]](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6" \o ")，形成“五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本轮“新全球化”，就好比上世纪初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同的是，“门户开放”仅仅是小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均沾”，而“新全球化”则是包括广大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内的全体国家的“利益共享”。中国将坚持“稳重求进”的经济发展总基调，挺身而出、顺势而为，成为抵住“逆全球化”、重塑“新全球化”的倡导者、实践者、先行者，积极扮演好“主角”这一角色，发挥好“推动”这一作用，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红利、机会红利、方案红利等开放红利。

## （一）中国发展，就是世界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始终是世界经济的最大“发动机”和全球贸易的最大“压舱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约为6.7%，按照购买力平价约占世界的17.3%，如果剔除中国，IMF预估的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3.1%将调低至1.9%（低于全球经济衰退临界值2.5%），说明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经济早已陷入衰退；2015年中国占全球贸易份额超过13%，已经成为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发展，就是世界发展。日益开放、全面开放的中国，将会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越来越大的“中国贡献”，包括对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对外投资、减少贫困、创造就业的最大贡献，还包括作出更多科学发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文明多样性的重大贡献，推动实现更平衡、更发达、更包容、更多元、更可持续的“新全球化”。

## （二）中国机会，就是世界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未来时期，中国仍会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中国作为大块头，更多的不是搭别人的“便车”，而是和各国一起推车、开车，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顺风车”，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机会，就是世界机会。未来5年，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系列“真金白银”的开放红利包括：每年进口额将达到1.6—1.8万亿美元，将成为140—15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每年对外投资额将达到1500—2000亿美元；每年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将完成营业额1800—2000亿美元；每年出境旅游将达到1.4—1.7亿人次，出境旅游消费将达到1100—1300亿美元；每年出国留学人员将达到60—80万人，外国来华留学生将达到40—50万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5%以上。

## （三）中国方案，就是世界方案

“环球同此凉热”，即使全球化后退，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没有后退，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关键规则的重要决策者、引领者，更要顺应“新全球化”大势，倡导“共赢主义”。

中国方案，就是世界方案。中国作为主导者，共建“一带一路”，成立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打造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积极建设全球自贸区网络……充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国际公共产品托起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希望；中国作为倡导者，积极落实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各项成果，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动《巴黎协定》生效并作出减排承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中国方案”与“世界方案”：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17]](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7" \o ")中国以开放大国姿态赢得世界的认可和积极响应。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顺应当今世界潮流与历史大势，自觉高举“新全球化”的大旗，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便利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以发展赢繁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8]](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18" \o ")中国将着眼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共商、共创、共建、共享开放红利，既惠及中国人民，也惠及世界人民。

[[①]](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 \o ") 胡鞍钢、王蔚：《中国发展与世界共赢》，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

[[②]](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2" \o ")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改革出版社，162-164页，1997年1月版。

[[③]](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3" \o ")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④]](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4" \o ")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2016年11月20日，新华社利马电。

[[⑤]](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5" \o ") 美国中央情报局数据库。

[[⑥]](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6" \o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 Trends 2017.

[[⑦]](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7" \o ") “十二五”时期提出的发展目标是：进出口平稳增长，总额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15年达到约4.8万亿美元。贸易平衡状况继续改善。《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年4月。

[[⑧]](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8" \o ")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2016年9月4日，新华社杭州电。

[[⑨]](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9" \o ")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改革出版社，164页，1997年1月版。

[[⑩]](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0" \o ")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2017年1月17日，新华社达沃斯电。

[[11]](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1" \o ")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2016年9月3日，新华社杭州电。

[[12]](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2" \o ") 习近平在秘鲁国会的演讲：《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2016年11月21日，新华社利马电。

[[13]](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3" \o ")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新华社日内瓦电。

[[14]](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4" \o ")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6日，新华社杭州电。

[[15]](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5" \o ")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新华社纽约电。

[[16]](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6" \o ")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2016年9月27日，新华社北京电。

[[17]](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7" \o ")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

[[18]](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Rar$DIa0.288/%E5%9B%BD%E6%83%85%E6%8A%A5%E5%91%8A-%E4%BB%8E%E2%80%9C%E9%80%86%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5%88%B0%E2%80%9C%E6%96%B0%E5%85%A8%E7%90%83%E5%8C%96%E2%80%9D%EF%BC%9A%E4%B8%AD%E5%9B%BD%E8%A7%92%E8%89%B2%E4%B8%8E%E4%BD%9C%E7%94%A8-0121%E7%8E%8B%E8%94%9A%E6%94%B9.docx" \l "_ftnref18" \o ") 在习近平的讲话中，专门重申了这句话。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

### **刘典、张岩：中俄德关系与当今世界大势演变**

[刘典](http://www.guancha.cn/LiuDian" \t "http://www.guancha.cn/LiuDian/_blank)

[刘典](http://www.guancha.cn/LiuDian" \t "http://www.guancha.cn/LiuDian/_blank)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岩](http://www.guancha.cn/zhangyan2" \t "http://www.guancha.cn/LiuDian/_blank)

[张岩](http://www.guancha.cn/zhangyan2" \t "http://www.guancha.cn/LiuDian/_blank)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http://www.guancha.cn/LiuDian/2017_07_05_416549_s.shtml>*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典 张岩】****

7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在访问期间与普京举行两人的第21次会晤。随后将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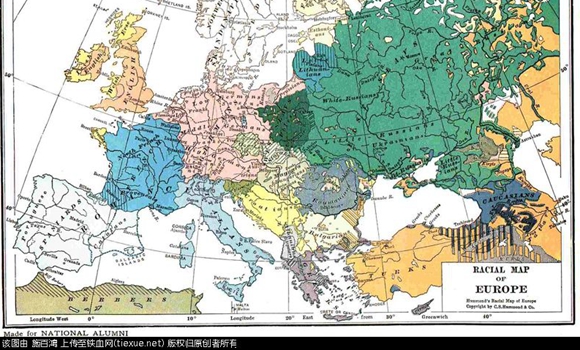
习近平主席在赴汉堡出席G20峰会前访问俄罗斯、德国，体现了中国对中俄德关系的重视，通过积极落实杭州峰会成果以及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举措，向二十国集团成员传递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

当然，我们也可从一连串事件的背后看出当今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从全球格局来看，大西洋两岸关系越走越远，德国与中国都在试图整合亚欧大陆经济版图。中国和德国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分别居于太平洋西海岸和大西洋东海岸的经济圈核心，俄国作为纽带衔接亚欧大陆两端。中、俄、德三国所构成的地理轴线，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高度吻合，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将成为当代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变量，对未来世界秩序产生影响。

****一、世界大历史中的德国与俄罗斯****

对于德国和俄罗斯来讲，相互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存在。尽管双方之间经历过三次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这在双方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只能算作短暂的插曲。即使是在惨烈的二战之后，德俄双方（联邦德国与苏联）依旧能够快速回复到相对和睦的水平。如果以北约阵营的整体为参照，德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令人惊诧的跨阵营合作典范。

作为传统上的大陆国家，德国和俄罗斯（普鲁士与莫斯科公国）在之前的三百年时间中始终渴望进入繁荣的大西洋商业圈、甚至变成海洋国家。因此这两个国家一次次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试图通过武力手段成为当时象征着繁荣的“大西洋地区海洋国家”行列。从俄瑞战争、七年战争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和东西方冷战，都是德俄两国对这一国策的践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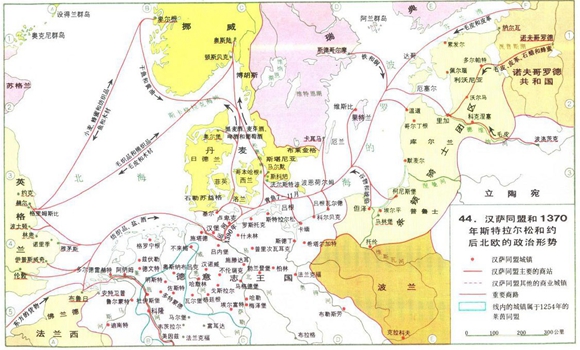
莫斯科公国的扩张（图片来源：见水印）

德俄关系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汉萨同盟时代，大批德意志人由于贸易需求而进入诺夫哥罗德地区，成为俄罗斯人最早接触的西欧人并促进了以吕贝克-诺夫哥罗德为两个终点的波罗的海商圈形成。

在普鲁士和俄罗斯两国相继崛起之后，双方在战略上对于中东欧、特别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态度与兴趣使两国形成了长期的国策默契，并最终成功分割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一时期德意志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商贸合作转变为军事上的合作关系。

此后德俄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从反法同盟到《再保险条约》失效的百年时间中，普鲁士以及日后的德意志帝国与俄罗斯帝国除了在少数特殊情况下（例如奥斯特里茨会战后）始终站在同一战线或者相互保持友善的中立。

这段“黄金时期”的形成与英美法等海洋国家的对大陆国家的封堵有着直接的联系。德国的快速统一富强与俄罗斯对于海洋的渴望引起了海洋国家的警惕，试图切断这两个大陆国家通向海洋、从海外获取资源的路径。最为典型的是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联军远赴万里之外干涉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领土问题，最终使俄罗斯的黑海之路破产，其影响甚至遗留至今日。在面对共同的强大海外敌人时，德俄自然地选择站在一起，直到海洋国家们开始拉拢其中的一方充当战争替死鬼。



20世纪最初的50年中，两国关系由于一系列战争与意识形态冲突而降低至冰点，但是这种强烈敌对关系在其中的一方丧失对抗能力后很快发生了转变。作为西方阵营中最为接近前线的国家，联邦德国很快便与苏联政府建立起直接而稳定的联系机制，并成为了美国和苏联之间、或者说自由阵营与民主阵营之间沟通的渠道与中介，在诸如中程导弹问题与《赫尔辛基协议》等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双边关系在围绕军事问题展开的同时开始向柔性外交发展。

作为德俄两国之间这种特殊关系的体现，统一之后的德国不仅成为了俄罗斯第五大外资来源地（次于塞浦路斯、荷兰、巴哈马与百慕大），同时德语也成为了俄罗斯影响力第二大的外语（仅次于英语）。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俄国的影响力边界从东德快速后撤至白俄罗斯，使中东欧呈现出一种强权真空状态，引起了欧盟、特别是德国的强烈兴趣。

在新一轮的中东欧争夺中，德国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放弃了传统的普鲁士军国主义道路，转而使用更加柔性、隐蔽的经济手段。90年代欧元正式投入使用和2003年的申根区东扩促使中东欧形成了以德国为中心的产业循环体系、将德国的影响力范围从冷战时代的富尔达走廊一口气向东囊括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和奥匈六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随着德国和俄罗斯在冷战后逐渐形成稳定的影响力版图，德国在覆盖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后对于白俄罗斯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兴趣，俄罗斯也没有试图重新将这两个宿敌地区纳入自身势力范围。两国再一次拥有了进行合作的政治环境基础，但是却未能做出实质性的进展，这其中的原因与域外国家有着深厚联系。

****二、世界秩序的“心脏地带”****

德俄关系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部因素不希望德俄之间关系好转、或者说不希望中东欧地区保持平稳。在继承关系上，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麦金德时代开始的英美国家对于“世界岛”被某一强权或某一联盟所统治的恐惧。英美地缘政治学家们认为德俄之间的合作将会成为新一次对于既有世界秩序的挑战。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德俄两国不再需要依靠冒险的战争手段，而可以依靠强大的、互补的产业能力从根本上打垮以金融能力为立足点和操纵世界手段的美英海洋国家。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德俄关系密切化和中东欧地区的平稳意味着德俄两国影响力的扩张，这一变化对于战后已经形成的国际秩序产生了冲击。

美国对于中东欧局势的崛起反应最为激烈。随着德国逐渐整合波兰、波罗的海诸国，欧洲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意味着西方阵营的中心将会由美国重新转回欧洲，或者至少需要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将会削弱美国在西方阵营与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与权威。

事实上，在德国初步整顿中东欧各国之后欧洲便形成了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力量。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表示反对并拒绝跟随美国参战，成为后冷战时代欧美政治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因此美国绝不希望德国能够完全整合中东欧各国、也不希望俄罗斯成功复苏并与美国竞争，在德俄之间制造事端便成为了一举两得的选择。中东欧各国之中，无论是亲欧洲的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或者亲俄的白俄罗斯都已经明确表明立场，德俄两国的潜在危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爆发点。美英等国最终选择了乌克兰这个庞大、复杂并位于世界岛核心地带的国家作为“导火索”。



乌克兰危机（图片来源：华尔街见闻）

2005年，乌克兰政治危机正式爆发，亲美的尤先科、亲欧洲的季莫申科与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三方之间产生了激烈对抗，堪称乌克兰政坛三国演义。

局势从一开始的尤先科与季莫申科联手攻讦亚努科维奇，转变为亚努科维奇与尤先科夹击季莫申科。淘汰掉季莫申科后最终演变为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逐鹿乌克兰，点燃了乌克兰内战的导火索。

说一句题外话，很有意思的是，尤先科、季莫申科与亚努科维奇三人的背景精准地反应了美、欧、俄三方在乌克兰的基本盘。尤先科出身于金融系统、与英美金融行业有密切联系；季莫申科原本为天然气寡头、和乌克兰天然气出口的主要对象——欧洲或者说德国关系匪浅；出生于乌克兰俄语区顿巴斯的亚努科维奇很自然地和俄罗斯人走在了一起。

乌克兰内战以及随之产生的克里米亚问题在近十年中成为了德俄关系中的症结所在。但是究其原因，是在美英等域外国家作用下产生的人为矛盾，而非德俄两国国策问题上的对立。一旦寻找到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新的发展契机，两国关系有很大可能迅速转好。

****三、当代地缘博弈中的形势变化****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层面，选择近三十年和近三百年两个维度审视德国与俄国所在的中东欧地区，会发现当代的地缘政治博弈的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

随着近三十年来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经济被深度整合到全球价值链之中，日常经济活动都越来越依靠货币与会计作为管理基础，导致各国都在经历资产证券化的浪潮。这也将意味着国家发展的进程与全球货币的流动密切相关，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冲突影响减弱，影响国与国之间亲疏远近的关键性因素变为对流动性的争夺。

资产快速证券化意味着经济活动的金融化。对于金融化了的经济来说，流动性是一个重要概念。流动性强调了货币或资产的流动属性，它意味着未经货币化或者缺少流动性的资金、资产对于经济活动来说没有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流动性的来源以及流动性的多寡，对于一个国家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

在过去，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扮演着全球流动性总源头的角色。2015年12月17日，美元正式进入了新一轮的加息周期，随着大量美元资产回流美国，全球流动性供应日趋紧张。部分经济体如巴西，因为深度捆绑在美元体系中短时间难以找到经济运行所需流动性供给来源，从而陷入了百年难遇的经济衰退中。

面对经济“寒潮”，各大经济体为了争夺流动性使出浑身解数。5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预算蓝图，提出高达3.6万亿美元的削减支出方案；6月1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加息25个基点，同时宣布将在今年开启实施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

以美国为代表，各国纷纷使用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手段，来为本国流动性的基本面争取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一方面各大央行背离的货币政策趋势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美欧等国以税收政策为抓手的全球“税务战”日趋白热化。

随着英国“脱欧”进程加速，作为美国金融市场与欧陆金融市场枢纽的伦敦往昔盛况不再，其背后意味着美元体系与欧洲市场的脱节，美元不再作为欧洲流动性的基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收缩，以及特朗普上台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不断挑战过去欧美国家达成的共识，美欧融洽的盟友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一切迫使作为欧洲核心的德国重新开始思考未来的世界秩序与自我定位。



G7峰会上的默克尔和特朗普（图片来源：路透社）

5月29日，刚刚结束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回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28日在慕尼黑一场活动上谈及德国和美国关系时表示，双方“能够完全信任对方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去了”。默克尔更呼吁欧洲人“必须真正掌握自身命运”。

而俄国，作为过去美国主导下的西方经济体系不断制裁的对象，随着美国开始重归“孤立主义”，中东欧两大国间原本人为制造的关系“鸿沟”有了逐步消融的契机。

****四、中国如何参与欧洲“重组”****

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范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越来越多的掌声。

对于德国、俄国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两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连续7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6年双边贸易额达695.3亿美元，2017年前５个月，中俄贸易额达到3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2016年中德贸易额达1512.9亿美元，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近三分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近年来逐步改变依靠维持巨额外汇储备向全球经济提供流动性供给的方式，开始通过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直接输出流动性。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经济“走出去”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在经济交流的进程中，中、德、俄三国经济水乳交融，形成了优质的产业互补循环，促进彼此之间的进一步发展。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俄国一直积极响应。2015年，两国达成“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共识，近年来，在两国元首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稳定、持续、高水平发展。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俄国期间，两国元首还将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批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7-2020年实施纲要》。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访德（图片来源：新华网）

多年来中德关系也在不断深化合作。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访德，双方宣布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三年多来，中德关系蓬勃发展，高级别财金对话、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相继启动，目前，双方已建立中德政府磋商等70多对双边磋商与合作机制。

默克尔和德方多次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双向投资到智能制造，从“一带一路”建设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德利益契合点多、合作互补性强。而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之间的对接，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应用方面，两国互惠合作必将释放出更大潜力。

****五、重新构想“世界岛”经济走廊****

从英国地理学家罗德·麦金德提出的“世界岛”，到5月刚去世美国“麒麟才子”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大棋局”，都将大部分中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视为世界秩序构建的关键地带。

布热津斯基极力盛赞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前所未有的新型霸权。但事实上，他所重视的中东欧等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长期以来都属于经济欠发达的“洼地”，而他所盛赞的霸权形式，依然是美国在军事扩张的结果。

但是在当代，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越发无力维持过去超然的政治、军事实力，来对全世界范围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从这一维度来讲，在国际关系中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也并非影响不再，只是全球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发展“缺位”，在一个全球“低增长”的时代，对于每个国家而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未来如何实现进一步发展。而在2016年在中国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论坛主题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也许就是这一时代难题的最优答案。

同样，对于地处“世界岛”腹地的德、俄两国，即便影响两国关系的“美元因子”退却，并不必然会使两国在政治层面能够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因素依然在发挥效用。

相较而言，德国传统的合作对象，例如德国和英法等国之间产业发展领域高度同质化，德国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欧美各工业领域赢得了核心地位，与英美等国主要通过金融合作保持平衡。如今平衡的纽带不再，或者说正是由于高度同质化，在长期的“存量竞争”中，过去的盟友分道扬镳。

而德国与中、俄两国并不存在这一问题，三国之间的合作更多是“增量共赢”，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下，中国可以作为纽带来实现某种程度的“求同存异”，因为三国在产业链、价值链层面可以实现高度的优势互补。



2016年杭州G20峰会（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7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G20峰会以“塑造联动世界”为主题，与2016年杭州G20峰会主题一脉相承。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及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气候问题等议题上，中、德、俄三国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凸显在立场和利益的共同性。

在当代政治经济格局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岛”的两端经济活动不断交融，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畅想也为中东欧等全球经济版图中“洼地”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中国提出的六大经济走廊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贯穿整个欧亚大陆，而中、俄、德三国连成的地理通道，构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方向。

在这一层面，规划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不仅仅是建立在“运输线”概念上的合作，中、俄、德三国在国际合作方面孕育着巨大的想象空间，三国携手共建穿越“世界岛”腹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范式，构筑“世界岛”经济走廊，这不仅对三国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先进的技术合作将带动广大欠发达内陆国家，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重构世界经贸格局的发展，化“洼地”为通途。而这一切，将为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注入新的增长理念。

## 白云先生：当史无前例的危机到来时

 (2017-01-07 21:06:33)

|  |  |
| --- | --- |
|  |  |

一、当前世界的焦点以及未来走向

战争与冲突，在冷战结束前，一直都是世界的主题。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平和发展，才成了世界的两大主题。以至于让很多人产生了幻觉，认为和平和发展一直都会的世界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下一个大历史格局，它的主题不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幻灭与重建。幻灭，是比战争更深层的淘汰法则，因为它触及了灵魂，战争只不过是触及了肉体。

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到了仅仅依靠战争，都无法挽救的地步。因为人类文明的一切，都是依托匮乏机制所建立起来的。匮乏，推动着人类去竞争，竞争推动着人类去进步，进步，推动着人类去追求一个理想世界。而在这所有的过程中产生的痛苦感受，则交给各种谎言来慰藉。人们把这些谎言，叫做信仰。

我们先回顾下工业文明的历史，看看我们是如何在匮乏机制的支配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地步的。

大航海运动，催生了第一批的全球性的海权帝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从那之后，海权强国，如何制衡陆权强国，就一直都是海权强国经略全球的生死存亡之道。这一点，在英国和美国身上，表现的尤其显著。

海权国家对陆权国家的制衡，是英国所主导的七次反法同盟。一旦法国确立的对欧洲大陆的统治，并进一步东进，连接欧亚大陆的亚洲部分。那么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就会彻底丧失霸权。全球的权力与财富，也都会转移到大陆。

法国的陆权帝国梦，被英国所领导的反法同盟挫败之后，反法同盟的既得利益者，德国随后崛起。世界政治的焦点，便从反法同盟，转向了反德同盟。两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就是反德同盟。

德国被摁下去之后，世界政治的焦点，转向了冷战。冷战的美苏争霸，本质是反苏同盟。苏联按照彼得大帝曾经定下的扩张战略，是要彻底打通北冰洋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建立一个比蒙古帝国更要辽阔的欧亚大帝国。

相对整个世界岛欧亚大陆来说，偏安一隅的美国，则相当于一个岛国。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苏联取代了法德的地位。这依然还是海权国家对陆权强国的制衡。反苏同盟，随着中国的加入，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苏联应声倒地。

德国是反法同盟的既得利益者，美苏是反德同盟的既得利益者，中国是反苏同盟的既得利益者。

很自然的，接下来，世界的焦点转向了反中同盟，还是反霸权同盟的问题。同时，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海权强国制衡陆权强国的历史是不是结束了，陆权强国压倒海权强国的新历史，是不是即将开始？

而这个历史一旦开启，它就是不可逆的。就好比说，如果拿破仑真的打通了欧亚大陆，那么英国这种海权国家在法国眼里，不过就是个豆芽菜，英国永远都不可能再翻身。所以说海权时代到陆权时代的转向，一旦完成，它就是不可逆的。

海权强国，要制衡陆权强国，只能采取均势策略。英国对法德如此，美国对苏联和中国也是如此。反中同盟，就是基于均势策略，缔结一个反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反霸同盟，则是基于正义策略，缔结一个反对美国的反霸军事同盟。

美国这边忙着张罗它的反中同盟，中国另一边则忙着张罗自己的反霸同盟。正所谓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未来，这个天平向哪边倾斜，对于很多利益攸关国来说，取决于是反中同盟的收益大，还是反霸同盟的收益大。国际政治，在利益面前，一切都是虚妄的。

美国的反中同盟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避免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躲在后面让其他小国充当反中同盟的均势主导者，那么它会很失望的发现，没有国家愿意当这个愣头青，因为没有国家，能承受得起和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代价。这种买卖，就没法做。

而对于中国的反霸同盟来说，俄罗斯和伊斯兰，都可以冲在前面反对美国。所以相比反中同盟而言，反霸同盟，才会成为未来的主旋律。因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反霸同盟，在美国疲弱的时候，背后还有中国拿钱砸，对他们来说不但代价小，而且收益大。

美法的航母，在地中海窥伺叙利亚战局那么久也没敢动。这样的疲弱反应只会鼓励反霸同盟的进一步壮大。可以说，反中同盟，实际上已经流产了。无论是日本，俄罗斯，印度，越南，还是印尼，他们都无法承担和中国发生正面战争的代价。再说了，美国人也拿不出来什么钱给它们。代价太高，收益太小，怎么看都是赔本买卖。

美国能做的，可能就就是在中国连通欧洲的中间地带，捣捣乱，截断中国和欧洲的陆路连接，在世界巴尔干地区做文章。世界巴尔干地区，并非是指巴尔干半岛，而是指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方两端的广袤的中间地带。中东，是这块地区的核心。

而这一地区，也正是反霸同盟的焦点地区。所以未来的冲突和战争，大部分都会集中在这里。在我们的正面西太平洋地区，未来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反倒不是很大，因为美国自己都不想正面和中国在中国家门口打全面战争，其他国家更没有敢上的。所以这个地方很难打起来，即便是中国梧桐湾湾，也很难引爆中美大战。

经过上面的回顾和分析，我们会发现。海权强国，西班牙，英国，日本，美国，一个比一个大。陆权强国，法国，德国，苏联，中国，也一个比一个更大。在地球上，美国是海权强国的极致，中国则是陆权强国的极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碰撞。

法国强大之后，生产过剩，为了得到更多的市场，它只好在全世界和英国争夺殖民地。德国强大之后，生产进一步过剩，它迫切的需要更多的市场，但是殖民地已经被英法瓜分完了，所以它只能通过战争，来给世界重新划地盘。

德国战败，也耗光了英法。美苏接管地球统治权，对殖民经济体系，进行了改造。全球经济，从殖民体系，转向了分工体系。苏联弄了一个经互会，美国则弄了一个世贸组织。因为经互会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它们不存在生产过剩的现象，对经济危机，天然具有免疫力。

在美国阵营这边，随着日德产能的恢复，生产再一次过剩。美国阉割了日德随后又扶植了东南亚，随着东南亚加入分工体系，生产再一次过剩。为了应对危机，美国直接废掉了东南亚。再接着，中国加入世贸，这一次，全球产能史无前例的过剩。

新兴强国，产能过剩，需要更多的市场，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呢，只能通过战争去抢。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内在逻辑。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是中美史无前例大碰撞，二是史无前例的产能过剩。

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的一切的问题，都史无前例的碰撞，和史无前例的过剩的衍生问题。这些衍生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基本图景，便是我们所能直观感受到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整体危机。

两次世界大战，粉碎了殖民体系。中国的崛起，史无前例的产能过剩，目前看分工体系，也名存实亡了。经互会前脚刚走，世贸组织后脚跟上，苏联人废除了经互会，马上美国人也要废除世贸组织。也就是是说分工体系，已经不再适合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

继殖民体系，和分工体系之后，全球第三种政经合作体系，应该是什么呢？目前看还没有人给出明确的回答。能看到的，只是世贸组织被事实粉碎后，所飞起的反全球化的一地鸡毛。

分工的前提是什么，是一个国家生产不了所有的商品，所以必须得分工。既然现在中国有能力生产所有的商品，那么分工的合理性，就不复存在。所以世贸组织的瓦解，也是必然的。

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背后所反映的是什么，它反应的是，世界上根本不需要很多工业国，否则就是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上的不经济。这些低效率的工业国，商品竞争不过中国，就只能设置贸易壁垒。贸易战一打，大家都只会变得更加贫穷。

有中国一个工业国家就足够了。如果需要两个的话，那就再加上一个德国。其他国家，都应该成为农业国和资源国，或者成为中国的初级产品加工基地，包括美国在内。这样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工业生产分工体系的时代行将结束，下一个时代，是多层合作体系的时代。在合作体系时代，有的国家专门负责工业，有的国家专门负责农业，有的国家专门负责资源，有的国家专门负责旅游。最终，世界逐步的变成一个国家。

殖民体系是近代史，分工体系是当代史，合作体系则是未来史。

在中国所主导的合作体系框架中，美国是一个很完美的农业国和资源国，这样的国家搞工业，是浪费天赋，搞金融则是损害道德。

世界经济从工业生产分工，到分层全面合作的升级，它背后根本的动力是什么呢，这个推动力，便是匮乏文明，向充裕文明的根本性转向。正是这个大变局带来了大动荡和大危机。所谓的危机，不过就是换挡前的车身摇晃。危机过后便将迎来柳暗花明的新世界。

这次大变局，和从殖民体系到分工体系的升级还不一样。从殖民体系升级到分工体系，通过战争就可以完成。但是从分工体系，升级到分层合作体系，则无法仅仅通过战争来完成。因为它需要触及灵魂，而战争只能触及肉体和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类文明的一切，从告别采集文明，踏上生产文明之后的一切，都是基于匮乏机制所建立的。当我们要再走进充裕文明时，那么我们在匮乏文明时期，所积累的全部积淀，都变成了需要被否定的对象。这是多么痛苦的自我否定，所以说，这样的自我否定，触及灵魂。

二、当匮乏文明向充裕文明转向时，我们如何走出经济危机？

特朗普正是这样不愿意被触及灵魂的人，他能做的，也不过是痛苦而又无谓的挣扎。美国再工业化，是雪上加霜，是给世界经济添乱。TPP，再造另一个世界工厂，也是捣乱和雪上加霜。这些做法，只会让一个产能已经超级过剩的世界，变的更加过剩。

更多的过剩，就只会带来更多的危机。更多的危机，则会带来更多的战争。

中国这边，很多人也不愿意被触及灵魂。他们还在像老古董那样，絮絮叨叨的宣扬一些跟美国人学来的陈词滥调。张口闭口的就谈市场，谈效率，谈自由谈商业情操和伦理。认为这样可以走出危机。这都是一种迷信，说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危机的关键字：过剩。

在过剩的时代谈效率，是可笑的。在泡沫的时代谈市场，是下流的。在危机的时候谈增长，是无药可救的。因为这样做，都只会导致过剩的加剧。市场经济不是经济危机的药方，而恰恰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明白的话，只能说，要么是故意的不想明白，要么就是笨。

如果市场经济真是经济危机的药方，那市场经济的灯塔，美国就不会如此频繁的发生经济危机了。在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模式中，货币循环是它的灵魂。经济学家们，通常会认为，存在一种完美的常温超导体一样的永续货币循环回路。

只要调整价格，供需就能均衡。怎么才能调整资产价格呢，进一步认为，只要调整货币供应，价格就可以均衡。怎么才能确定投放多少货币呢，关键看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速。市场原教旨主义，货币主义，是政治经济学里的两大邪教和毒瘤。相信这种理论，跟相信鬼神，完全没什么区别。

货币循环，根本不是常温超导回路。就像每一个导体，都会出现电阻一样，在货币循环中，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它也都会出现币阻。那么货币就需要对每一个参与者做功，损耗在无尽的吃喝拉撒，无尽的储蓄，无尽债务，和无尽的坏账中。

为什么西方的经济学家们，那么憎恨储蓄，因为储蓄，就意味着币阻的最大构成部分。只要存在币阻，那么货币的超导回路就不可能成立。流出去的货币流回来的时候，就会变少。为什么说，一部经济史，就是通胀史呢。刨除增长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因素就是，货币要对经济主体做功，就跟用电器一样，只要一直存在电阻和做功，那么央行就得像个发电厂一样，源源不断的创造出来新的货币增量。

货币超导循环的回路不存在，那么鬼神一样的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便不攻自破。供需均衡不存在，有效市场不存在，均衡价格不存在，货币投放量，也更不对应经济增长。既然都是鬼神一样的超现实思想，那么对于解决经济危机来说，也是有害无益的。

既然用市场经济学这种神棍式的方法，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那么用现实中的方法，可以解决当前全球这次史无前例的过剩，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危机吗？我们来分析下具有可操作性的几种方案。

战争方案。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德国生产过剩，迫切需要更多的市场，而全球市场又恰恰垄断在英国的手里，新兴强国和旧霸主之间，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所以才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当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第一位，全球贸易份额占比15%。用贸易手段扩张市场份额，比战争手段更高效。

通胀方案。市场份额扩张不了，那么过剩的产能就会造成大规模的库存。库存就意味着债务恶化。要去库存，如果低价抛售的话，就会引发通缩螺旋，导致资产价格崩盘。怎么办呢，只能通过加杠杆去库存的办法，制造金融泡沫，以通胀的方式，来解决企业和政府债务问题。比如去年的房价暴涨，就是这样的做法。战争是对外转嫁危机，买单的是外国人，通胀则是对内转嫁危机，买单的是本国居民。

产业方案。这大致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思想。这个产业的产能过剩，可能其他的产业，我们的产能并不过剩，甚至是不足。比如大飞机，我们的产能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再比如芯片产业，我们的产能也做不到自给自足，也是严重的产能不足。这是一个很好的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增长点的方案。

分配方案。当前全球经济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饱和。而同时，我们国家很多人生活水平还很低。一边是我们的产能严重过剩，一边是很多人生活水平很低。如果把这些需要改善生活的人，购买力提高了，那么国内需求就会提高，需求增加了，就能拉动经济增长。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那些后富起来的人，富裕起来。怎么才能实现呢，通过调整分配制度来实现。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公平和分配的问题。

主要的思路，便是这样的几个大方向。这些思路，都可以从短期内，局部的缓解或者解决经济危机。如果要长期的，全面的解决经济危机，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就需要一个全局方案。

这个全局方案，便是对全球政治经济，进行顶层设计。在分层合作体系的框架下思考和解决经济危机，而不是在分工体系下解决经济危机。这才是走出危机的最根本的道理。

因为在单层分工体系的框架下，当前世界的经济危机，就是没有解答和出路。

三、归根到底，还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

所谓的经济，其实就两件事，生产和交换。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老王家有个院子，里面长满了葡萄。老李家也有个院子，里面长满了葫芦。老王家的葡萄自己吃不完，老李家的葫芦，自己也吃不完，于是老王就用自己家的葡萄交换老李家的葫芦。

这样以来，老王家不用销毁过剩的葡萄，老李家也不用销毁过剩的葫芦，老王家多吃了很多葫芦，老李家多吃了很多葡萄，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意味着财富增加了。

交换的前提是什么，是有多余的商品。在传统的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生产都是靠天吃饭。所以，很难出现严重的过剩。因为商品的生产周期很长。农业如此，手工业也是如此。

而工业生产，则改变了这一切。工业生产的本质，是改变物质的结构，来获取商品。而且，机器复制的生产方式，完全摆脱了自然生产周期的束缚。只要有足够的能源，足够的原材料，足够的劳动力，那么机器就可以一直开着，一直进行生产。

这就导致了过剩。自从机器化大生产以来，过剩就像幽灵一样的缠着资本主义这头巨兽。

每一个资本家，都为了自己的产品不过剩，自己能赢得竞争不破产，都绞尽脑汁的进行技术创新和效率变革。这就导致，生产效率越来越高，过剩越来越严重，竞争失败者，也越来越多。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这种资本主义式的技术永续革新和效率永续提高，我们进行一个思想实验，把它推到极致，那就是最后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优胜者，它发明了一台万能机器，这台万能机器，在技术迭代和效率革命上，永远都处于绝对优势。这一天，资本主义就寿终正寝了。

虽然现在还没到那一步，但是工业的效率，现在已经进化到了世界上不再需要两个工业国的地步。中国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那为什么还需要更多的工业国呢？

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强化，再被自己摧毁的内在属性。是谁制造了经济危机，是谁制造了过剩，没有其他原因，是资本主义自己造就了这一切。

如果把万能机器时代，叫做充裕文明的理想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则已经走到了充裕文明社会的大门口。全球多层合作体系，是走向这扇门的路，而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则是算机社会主义。

因为经互会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所以人们一直认为，是计划经济天然的劣势所导致。因为美国笑到了最后，所以美国所代表的市场经济，就是天然的具有优势。这么以来，政治正确的经济学，就被像鬼神一样的发明了出来。

如果市场经济天然正确，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缺陷？为什么一直无法摆脱经济危机？为什么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过剩的问题？

计划经济的初衷，它并非是一种政治体制，而恰恰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而发明出来的一种方案。既然市场经济，总是过剩，那么是不是通过计划来生产，就不会过剩了呢。马克思他们的想法，出发点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它生不逢时，因为在过去，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工业互联网，更没有万物互联等等科技。所以，计算能力达不到要求，数据到处都是孤岛，也根本做不到实时计算和全网数据共享和联动。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科技的手段，来使经济生产不出现过剩。这跟市场没关系，跟计划也没关系，跟体制更没关系，它只跟数据和网络，以及和计算能力有关系。

没有过剩，没有贫穷，恰到好处的计算一切，生产一切，满足一切需求，机器为人类劳动，产品平均分配，这便是计算机社会主义。

在计算机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所有信念，都会崩塌，我们对于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会失效。我们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为什么看不见，因为无知，因为计算能力的黑洞。而所谓的自由竞争精神，不过就是基于无知的盲目勇敢。当最优选择可以结算出来时，它是一个确然的事，选择变成了唯一的之后，那么自由就是多余的，就成了从或然到或然的灾难。

人们真的是热爱自由吗，其实并不是。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才认为随便怎么做都行，并自我标榜这是自由。让人们接受这些新观念，它非常的触及灵魂。

我们离计算机社会主义时代还远吗，想起来可能觉得远，实际上已经很近了。

四、新文明的曙光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治愈全球空前危机的同时，还会带来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世界，又会带来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即将在中国诞生。中国，即是守护人类文明，不至于被旧世界毁灭的最后堡垒，也是为人类带来新文明的第一道输光。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竞争。如果对手所有的考题都能事先拿到标准答案和最优解，那么竞争还存在吗？显然不复存在。我们所谓的竞争，只是在匮乏文明时代所特有的现象。

资源的匮乏，数据的匮乏，计算能力的匮乏。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最优解，所以两眼一抹黑的分头行事，各选各的路，蒙对的，成功，蒙错的，淘汰。这就是无知的代价。竞争，就是试错的同义词。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淘汰。那些走错路的人，选错答案的人，它们生产了错误的商品，卖不掉就会过剩，过剩就会遭到淘汰。而在充裕文明时代，如果数据是充裕的，计算能力也是充裕的，首先企业不会走错路，自然就不会被淘汰。可见，在充裕文明时代，经济危机将会变成一件奢侈品。

全球化的本质上什么，效率。之所以要进行全球分工，是因为匮乏，所以才需要优势互补。如果新能源可以像阳光空气一样充裕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物质的结构，随心所欲的决定生产的规模。在充裕文明时期，效率这个词会失去意义。

文明的本质是什么，生存和繁衍后代。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会出现拜物教和拜金钱教，也是因为匮乏。因为匮乏，导致对生存的焦虑，压垮了生存自身原本的任务。为了囤积商品和货币，宁愿放弃生存的快乐，和繁衍后代的天伦之乐，这是一种病态的文明。而在新文明时代，我们将治愈这种病。在充裕文明时代，崇拜商品和崇拜货币，就如同现在有人会崇拜空气一样荒唐滑稽。

如果说，中国是未来新世界的曙光，那么美国就是旧世界的暮光。因为美国就是一个为经济危机而生的国家。如果这次让它侥幸躲过一劫，那么下一次还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危机。

迎接新文明的，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基因里，就不具备文明这种东西。没有匮乏，就没有美国。失去匮乏，就失去一切。就像中国是为充裕文明而生一样，美国便是为匮乏文明而生。

其次，从数据，互联网，计算能力的长远竞赛看，美国具有先天的劣势。它已经掉队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过去的几千年，支撑人类的动力，就是匮乏。人类更依赖匮乏，还是更依赖充裕呢？人类诅咒匮乏，却又依赖匮乏，因为过去的几千年，人类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匮乏之上的。

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着，从匮乏文明，到充裕文明的根本性转向。这是史无前例的危机，危机过后，则是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一个充裕的社会意味着，人类在非物质上面的一切，都将要被格式化。这是发生在文明深层根源之处的摧毁力，它所带来的幻灭，远超战争所带来的肉体死亡。

因为，我们抹掉了匮乏，也就会抹掉离开匮乏便一无是处的那部分人类。而对于属于新文明的那部分人来说，这只是他们走向新千年文明的出发点，旧的一切都结束了，新的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2011年 “张维为对话福山”中英全文

http://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1\_11\_01\_61959.shtml

2011-11-01 12:00:10

观察者按：2011年6月27日下午，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先生应观察者网暨春秋综合研究院邀请，在文汇讲堂发表主题演讲，并与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展开对话。福山这个名字伴随“历史终结论”在1990年代流行全世界。人类历史终于自由民主政体的说法一度成为流行的神话。然而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1990年代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己对此提出质疑。二十多年过去了，西方世界意识到中国崛起正在成为事实，而中国并非一个西方式民主政体国家。这样的事实在东西两方面都引起反应：西方迫切需要做出回应和修补，中国方面则有越来越多的思考者认识到是时候尝试建构新的政治言说，比如张维为教授就试图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并提出中国模式论。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与世界究竟应该如何互相学习和交融？两位教授为此展开精彩交锋。观察者网站整理出演讲与对话全部内容以飨读者。



****福山****

****主题演讲****

****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政治秩序的起源》，内容是关于世界各地政治秩序的发展情况。我采用了比较观察的方法来写这本书。我认为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来理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政治制度。我尤其用了一个特殊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非常有意义，因为他的政治和政权是相当独特的。在西方，我们一般有一种典型的观察方法，我们把它叫做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察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总是把欧洲的看成是规范的，而非欧洲的都是不规范的。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观察方法实际上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可以说中国比西方早1700到1800年就建立起一个相当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架构。

那么我想我要用一种历史分析来向大家展示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发展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之后我要说明我对于中国模式的看法。我前面已经说了，我到这里来实际上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训导，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有错的话，可以随时指出来。

我想首先从世界上政治秩序发展的三大结构要素谈起。第一个要素是国家，这个国家是科层制的，或者说是一个等级架构的结构，它集中了权力，同时将权力使用于某一块区域加以统治。国家实际上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那么一个现代国家是指什么呢？我所谓的现代主要是用了马克思·韦伯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并不依赖于朋友或者家庭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任人唯亲，而是用一种非血缘性的关系来组织和治理。把所有的被统治者看成都是同质的公民，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拉开距离的。以前的所有统治方式主要是依赖血缘关系或者是其他相近的关系统治，现代国家不是这样的。

第二个要素我们把它叫做法治，法治并不仅仅单纯是有法律，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法律不等于法治。法治意味着法律必须要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共识，它的权威要高于当时的行政权力。不管是总理、总统还是国王陛下，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随心所欲就不是法治，法治意味着最高权力机构也必须遵守法律。

第三个要素有关政治问责制，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感到有一种责任，对这个社会的公民拥有责任，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统治者把政治当作是为自己发财或者为家庭发财的工具。这当然不是问责制的政府，问责制政府中的统治者具有很宽泛的义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是，问责制实际总是跟民主制和自由选举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或者西方世界都是这样理解的，当然我想政治问责制应该还要宽泛一些，比选举还要宽泛。

我想在欧洲最早出现的问责制就是英国17世纪出现的制度——统治者对当时的议会负责，实际上他们选出来的或者参与选举的人当时代表的人占总人口的10%都不到。我想对于中国而言，你们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时间里统治者是要靠一个道义性的共识来进行统治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府并不是通过选举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而是通过一个道义上的合法性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这些统治者必须要接受有关的教育，赋于自己道义责任进行统治，这是中国意义上的问责制，所以叫做道义问责制。

首先是国家集中权力，然后是逐步的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大家知道“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我们最后就是要过渡到对于权力的限制，然后是对于人民要承担义务，即问责。我想第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现代政权实际上是中国人缔造的。当时这个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政权的动机，实际上跟欧洲要建立现代国家的动机是一致的——他们面临着军事竞争的压力。我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政治势力相互交战了大约700年，这种军事竞争导致最后产生了一种有现代意义的政权形式——为了征税，招募官员来负责征税，招募方式整个是按照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标准。如果你要按照亲人关系来组织，可能就无法来打赢一场战争。

我们知道秦代的时候中国实现了统一，那个时候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看起来已经是相当现代了。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现代的文官服务体系，那是有一个非常理性的架构。由官僚体系来统治一大片领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是中国做到的。但是对于这一点，世界范围人们普遍没有充分认识或者给予充分评价。这是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大约2300年前发生的事情。当然，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另外两种政治体制要素，这两种要素实际上主要是从宗教当中派生出来的，因为一般来说宗教承担着一个道义合法性来源的功能，也就是说在古代西方，神父与统治者是分开的，古代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都是这样的。我想在所有这样的社会当中，你可以看到对于那些行政统治者，实际上都有一个法律（宗教）上的限制。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缺少一个外在于行政统治体系的宗教权力。这妨碍了中国现代问责制的产生，在西方却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欧洲中世纪一开始就出现了法治，因为当时有天主教的存在。甚至在现代欧洲政权出现之前，宗教力量就可以限制欧洲的国王、君主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政治势力。

所以，我想这个制度起源于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偶然现象，也就是说所有的欧洲中世纪封建国家都拥有这样一个体制，包括国家政权和很大一个国会或者议会的体制。国王要增加税负的话，必须要获得其他权力体系的同意。这个体系可以对国王权力形成足够的挑战，在英格兰，他们在内战中砍掉了一个国王的脑袋，然后又在1688年驱逐了国王詹姆士二世并以荷兰执政奥兰治代替，这就形成了议会问责制。英国就是如此发生了1688年到1689年的光荣革命。我们知道民主在西方就是产生于这样一种因果发展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但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慢慢的就有规律地发展，也就是说国家政权逐渐强大，然后对人民负责。然后国家又出现了商业化、资本的崛起等等直到工业化的发展，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格局，当然有另外的一些类型，但是总的来说我可以看到在欧洲是这样的发展，但在中国是按照另外一条线发展的。中国实际上是从两千多年前一直发展到现在，但是走了比较独特的道路。当然中国目前的统治集团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结构实际上与秦代建立的体系类似，也就是说有一个高质量的、中央化的、非亲属化的官僚体系，按照个人优异的素质来进行选拔。这就是有关历史的回顾。

第二，我讲一下中国模式包含着什么，它的优势和弱势是什么？现在我们同时能看到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主制，包括他们的权力制衡体系。我们从各个角度看一下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的这个体系目前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中央化的官僚体系的威权政权，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历史遗产，也就是说政府内部有一个比较高的制度化水平。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官僚体系在对一个庞大的社会进行统治，然后在这样一个政府当中，问责制主要是往上的，也就是说对共产党负责，而不是说往下。当然，这在过去就是对于朝廷负责，现在是换了负责对象。

因为更上层的权力体系可以来惩罚你，所以你必须要负责，但对被统治的人民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还可以有一种程序上的问责制，也就是说通过一种民主的直接选举制度，比如美国的乔治?布什总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我们选了民主党的奥巴马，这就是通过民主选举贯彻问责制。在中国，问责主要是道义上的而不是程序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道义问责制是指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到对人民怀有责任。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上一些成功推进现代化的维权政权，如果有成功的话，主要集中在东亚，比如说在南韩，还有陈水扁统治下的台湾，还有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还有非民主时代的日本，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些地方为什么成功，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的儒家体系，这里面拥有道义的问责制，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威权政权，显然又不同于程序性的问责制。

中国模式的第二点就是经济方面的特点，我想在这个方面的话，中国实际上跟其他一些东亚快速发展的社会又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主要是依赖于一个范围更宽的出口推动，而且是大规模的依赖于政府来推动这个工业化。这一点稍微不同于比如说日本曾经采用的产业政策或者韩国采用的产业政策。在中国这里并没有很清晰的，比如说集中于半导体或者造船、钢铁这样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主要是致力于建造基础设施，然后提供金融信贷，还有管理它的汇率制度，然后使得出口具有竞争性，所以它并不是具体地选定哪些竞争者进行出口。所以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以一种推动发展的方式加入市场经济。

我想中国模式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相对来说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尤其是跟欧洲和北欧比是薄弱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里主要是促进就业，但在平衡富人救济贫民方面做的比较少，尽管共产党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不平等状态的系数，实际上在以往一两代当中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非常快。中国方面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在上海这样的地区和中国的内部可以看到差异是很大的。跟北欧国家相比，实际上在他们那里有比较大的福利，可以支持穷困家庭。丹麦和挪威也是这样，相对来说中国模式在社会保障方面比较薄弱。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样两种体制，或者说不同体制各自的优点和弱点。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模式，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自由民主模式，由英、美、法、意以及其他民主国家代表，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度用的也是这个自由民主制。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决策，如果你比较一下中印的话，我想对比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很能建设基础设施，比如非常庞大的机场、高铁——从上海到北京已经开通了高铁，还有桥梁和大坝等等，因为中国政府是中央化的，可以很快实施这样的项目。在印度，虽然印度处在雨带，所以人均对水电的需求或者说平均用电量没有中国多，但基础设施也没有中国这样好，为什么？因为印度有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当中国在这里建立三峡大坝的时候，我们知道实际上还存在很多批评和反对，但这个大坝还是建起来了，政府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推进。但在印度，塔塔公司想在西部边疆建一个汽车厂，但是碰到很多抗议，包括工会、农民组织的反对，最后只好放弃，因为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太强大了。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经济决策方面威权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制度的威权特性使得它拥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我想在美国我们也有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和问责制，但是美国的决策表现没有印度那么糟糕，但实际上我们也面临着政治制度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财政赤字，我想每一个专家都知道，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由于最近的金融危机，我们的政府差点因此瘫痪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我们整个的制衡体系使得政府难以运作。

另外，我们的利益集团是非常强大的，他们能够阻止某些决策，虽然这些决策从整个社会长远利益来看是合理的，但是最后只好向一小部分利益集团低头，所以美国很难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在以后几年当中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此判断美国的民主制在长远上能不能成功。

中国有很多的优势，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优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的历史，但毫无疑问我知道，在以往一代当中，中国人民实际上还是有比较自由的意识形态。政府实际也进行了很多创新，是对的就做是不对的就改。另一方面可以说美国政府实际在经济政策方面教条气很弄。虽然我们说美国非常务实，而且也愿意进行尝试，但实际上我可以说并不是那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中国确实还拥有不少优势。但问题是，我们要问，这种优势的可持续性怎样。我们知道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做的不错，美国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做得很好，我们现在还在赤字底下挣扎。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哪个制度在往下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里可持续。从长远考虑我还是赞成美国制度多于赞成中国制度。当然待会儿张维为教授可能跟我要就此进行一些辩论。

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往下我们会看到中国政治制度有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缺乏对下负责缺乏。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话，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不能够了解整个社会当中发生的事情，最后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我想在这个官僚体系当中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腐败，难以进行良好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体制当中还是存在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来收集信息，我们有因特网，我们还有其他现代的技术，但是对于政府来说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回应人民的要求，回应人民的感觉，以及尊重人们怎样来治理的意见，这实际上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向下的负责制还要最终靠选举实现。因为领导人觉得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弄不好人们会不选他们，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做恰当的事情，长远来看是这样。

第二点我想在中国体制当中目前不存在，但也是需要关注的。那就是传统中国当中“坏皇帝”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你有能干和训练有素的官僚，也就是说技术专家，接受过良好教育，又有为公众利益献身的精神，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政府至少短期内可以比民主政府更好，因为民主政府往往依靠民族主义或者政党联盟等等。我想中国的这个体系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坏皇帝。中国过去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好皇帝还好，但问题是你并没有任何的制度保障坏皇帝不出现，或者出现坏皇帝但因为你没有问责制所以很难把他去掉。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你怎么来保证获得一个好皇帝，而且保证这样一个好皇帝总是一代一代的相承，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没有把握的。

我想还有一个经济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出口模式对于中国是好的，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小的经济体那没问题，而且出口导向是赶超工业化国家的很好途径。但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这样的出口导向制度是无法维持的。我们知道美国和欧洲这样靠信贷消费的模式也不可持续，我们知道现在整个金融危机已经表明这样的体系已经崩溃，往下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体系靠金融抑制，也就是说靠大家拼命的储蓄，而且这样的储蓄其实是失利的而不是得利的，而且也没有像市场运作那样达到比较高的效率。所以我想这样的经济模式长期来看一定要重新加以思考。

还有一点我想是道义方面的问题。这实际上跟什么相关呢？我想政府不单单要做出好的经济决策，即使一个政府可以提供长期的经济的增长，但是这本身也并不是政府最终的目的，即使有一个制度可以向公民提供物质方面的财富，但如果公民不能参与最后的分配过程，或者说不能获得足够的尊严的话，那就会出现问题。我想我们在中东北非的话看到这些威权政权就遭到严重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民要求获得尊严，最后政府受到巨大压力，甚至垮台。我想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在威权体制下能够加以解决。但是经过这样的事件，我要说的是我不认为两种不同模式必然一个好一个坏，我知道民主本身实际上也会变糟糕的。我要承认目前美国的民主制度也碰到很多问题，我们也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待会儿期待着大家的讨论，期待着跟大家进行交流，同时也谢谢大家。

****对话****

****张维为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您对新的理念、新的发现都比较开放，也努力去理解中国，包括它的文化、历史、文明和它今天的发展模式，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感谢您。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对话了。如您不介意的话，请允许我转用中文发言，谢谢。

我想刚才福山先生的讲座以及他这本新书，实际上提到了几个关键问题，就是对中国模式的质疑：一个是问责制，一个是法治，一个是坏皇帝，一个是可持续性。我想就福山先生的观点做一个回应。因为我自己觉得实际上中国做了很有意思的努力，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改革的实验室。刚才福山先生讲的这段话，使我想起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在德国和《时代周刊》主编的对谈，也是谈中国模式。这个主编刚刚访问过上海，他说他觉得上海现在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中国越来越学习和靠近美国模式？我就说：你这个问题问对了，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乡我比较了解这个城市，我说你恐怕观察的还不够仔细，如果你观察得仔细一点，您会发现实际上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上海的硬件全面超越纽约，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甚至许多商业设施。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比如说人均寿命，上海比纽约高4岁，婴儿死亡率，上海比纽约低，社会治安上海比纽约好，女孩子晚上12点可以在街上散步。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个德国学者，我说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呢，我们的眼光确实是超越了西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发达板块在这个方面在带头。下面我想针对福山先生对中国模式的几个质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是问责制，福山先生介绍的主要是一种西方议会民主多党执政的政治问责制，我自己在西方生活了20年，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一种问责制很难真正的问责，坦率的讲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仅是在政治范围内相互制约，解决不了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关键的关键是我觉得需要一种新的制约与平衡，我把它叫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而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模式下，刚才福山教授也提到了有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集团，他们的利益永远不会被侵犯。他们阻碍了美国进行很多必要的决策。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今天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这种问责制要广的多。我们有经济问责制，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比如说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的使命。如果你这个任务完成不好的话是不能晋升的。我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写的文章，他说美国在过去十年，经济增长为零，就业创造为零。我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走遍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有这样记录的地方，都比这个要好，而且好不少。这是经济问责制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也是这样的，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这是静安区，静安区是上海在各方面工作做的总体上比较好的一个区。严格的讲它的许多硬件指标、软件指标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但是去年一场大火烧了一栋楼之后，我们实行了问责制，二、三十个官员和公司人员受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处罚。我反过来想，美国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普通百姓的财产损失了平均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迄今为止三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而且更麻烦的是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还可以照样心安理得的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美国老百姓愤怒，奥巴马总统气愤，但他们是根据他们的合同应该拿到的。这使我想到了福山教授提到的法治的问题。中国在推动法治建设，法治建设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余地。但我们自己传统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好的。比如说我们传统中有一个“天”的概念。这个“天”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描述就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的核心的利益和良心，这个是不能违背的。我们可能99.9%的事情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但我们一定要保留那块小小的空间，有一些问题涉及到“天”，涉及到社会核心的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们保留在法治范围内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否则就是法条主义。法条主义可以害死人，所以中国在创新法律制度时，想取得这样一种平衡。

另外，坏皇帝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刚才的短片中也提到，我们退一万步讲，既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粗略算一下我们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当中经过多少的战争冲突，奴隶制度，两次世界大战等等，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这是我们一会儿还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想这个坏皇帝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创新。第一个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世袭的，是靠政绩靠自己干出来的。第二，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第三，现在是一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意味着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观点明显地偏离大家共识的话是要被拉回来的。第四个，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历史传承，就是选贤任能。现在中国最高的精英决策团队或者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资历基本上是两任省部级的履历，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四到五个欧洲国家，治理好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选出像小布什总统这样低能的领导，也不会选出像菅直人首相这样的低能领导人，所以这是一整套体制，我现在倒是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中国坏皇帝的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就是这个体制再这样发展下去，我真的担心美国下一届的选举，选出的可能还不如小布什。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其政策影响到全世界，所以这个问责制都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福山教授倒是可以解释一下怎样解决美国的小布什问题，八年在现代的社会是不得了的，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运直线下降，再来一个八年美国也赔不起。

可持续性的问题我是这样看，我自己在《中国震撼》这本新书中讲了一个概念叫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有一个自己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实际上有一个自己发展的周期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周期，有时也可以用"朝代"概念来描述，一个周期平均是两三百年，这是数千年历史的规律，从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大周期来看的话，我认为我们中国现在还在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所以我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我20多年来一直是这个观点。

我的乐观来源于中国人喜欢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势"，这个势一旦形成了很难阻挡。反过来讲一样，19世纪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一下子就转过去了，中国就转不过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惯性。我们的体制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头，这种大势很难阻挡，会有逆流，会有相反方向的浪花，但改变不了这个"势"，这是它文明大周期的大结构。这是很多西方学者，以及我们国内倾向西方的自由派学者往往没有搞清楚的一点。他们预测中国崩溃的论调持续了20年，现在海外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中国国内还有唱衰自己的人，但我相信这种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至于中国模式的持续性，刚才您提到中国过度依赖外贸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外贸依赖度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按照官方汇率来算的话，外贸占GDP比重很大，但是外贸是按照美元来算的，而其他GDP的内容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样就产生了误差。再往前看，中国内需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真正的快速城市化是从1998年刚刚开始，今后每年都有1500到2500万人变成城镇居民，这会创造巨大的内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内需加在一起也达不到这种内需。

还有最后提到尊重个人价值的问题，我想在尊重个人价值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我们有一种传统，叫作从整体出发的传统，西方则是从个体出发的传统。实际上我们在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权利方面，采用中国的这种整体介入的方法，效果实际上比采用个体介入的方法要好，打个比方我把中国的方法叫做邓小平的方法，把印度的方法叫做特雷莎修女的方法。邓小平的做法使得近4亿的中国人已经脱贫，4亿的个人实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价值。他可以上网，可以看彩色电视，可以开车在高速路上行走，可以在网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印度的特雷莎修女感动了无数个人，还拿到了诺贝尔奖，但印度总体的贫困状况没有什么改观，你在上海20年看到的贫穷加在一起少于你在孟买一小时看到的贫穷。没法比。

对于后面提到的决策过程中百姓的参与。实际上我希望福山教授有机会到中国做一些调研，我打个比方，我们的决策民主，中国现在以五年为周期的五年计划的决策的过程：上上下下成千上万次的咨询，这种决策民主的质量西方没法比，我们是研究生水平，西方可能是本科生、初中生的水平，这是真正的决策民主。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好像体现人们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去过4次。20年前跟上海的距离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叫中东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的冬天。严格讲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所以路漫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会看到的。我暂时就讲这些。

****福山教授：****非常感谢您刚才提了不少的问题，我现在一个一个来回答。首先当你在比较政治体制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区分：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体制。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某些集体领导人拿出一些具体的政策，还有另一方面是一整套的体制。毫无疑问，美国的决策者以往是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大错误，这个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外美国出了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从华尔街开始的，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放任自由的市场意识形态导致的结果，是过度的消费包括房地产方面的过度扩张导致的问题。我想任何的政权都有可能犯政策错误，所以我并不认为民主的政权必然就会比威权政权犯更多的错误。实际上威权政权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将维持很长时间，而且无法来终结这样的领导人，最后代价很大。比如说你说中国好像是不会选出小布什这样坏的领导人，但也许讲出来有点难，小布什只是当了八年的总统，你如果看坏皇帝问题的话，我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破坏多么严重，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最终破坏实际上比小布什带来的破坏大的多。你提到这样一些中国领导层制度上的特点，我要说，目前我当然认识到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他们是有很多优点，比如说中国有两期任制，如果说卡扎非或者穆巴拉克也这样做就好一些，可惜没有。还有就是讲到为了做出重大的决定需要有一个共识，之前是好的。为什么现在的政权能够采纳这样一些特点呢？因为有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国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最后共产党总结了教训，拿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或者说体制特点来避免以前的大问题。比如说限制领导人的任期。我当然充分认识到中国这方面做的好的地方，我想中国的制度虽然是一个威权制度，但确实也是高度制度化的，这点美国很多人确实没有认识到。确实中国也有很多制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长远的看——

目前中国共产党内的这样的体制构成，实际上主要是依赖人们的脑子当中的记忆。也就是说现在还有很多人是经历过文革的，他们还有这样的记忆，实际上他们在中国现在还不能完全诚实地来讨论这段历史。你们并不在教育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文革的教训。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是没有经历过文革，很容易忘却。但问题就是当将来中国新的领导人他们没有文革经历的时候，他们没有那样的心理创伤，跟曾经在没有限制的独裁主义下生活过的人没法比的时候，他们还会自愿遵守目前政权当中一定的制衡规则吗？

所以，我想我们长远需要的是可持续的明确的制度，比如说制衡制度。因为我们不能单纯依赖一代人的记忆。因为这种活人的记忆如果不体现在制度当中就会消失，如果下一代人没有这样的记忆可能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想法治和民主制就是一种用来维系我们现在一些好的现实条件，让它能够跨代传承。这是对于坏皇帝问题的继续讨论，就这点我想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

我在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就是我们实际上都有共同的人性。人性实际上倾向于让我们重视家庭，重视亲友、兄弟姐妹，尤其是重视孩子，以一种比较特殊主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朋友，给他们提供照顾，实际上这是人类社会当中的一种本性，但是在政治制度当中我们不能这样做。我想中国的政治一旦有这个成就，就是创立了这样的政治制度，是高度制度化的。也就是说超越了血缘、亲友和个人关系的层面。

这样才很早建立了官僚制度，然后通过科举考试制度选举官僚，所以当时已经摆脱了单纯的谁影响力大谁好的制度。所以我想公元前一世纪汉代前期的时候，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但到了西汉末期，东汉的时候就崩溃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当时的门阀制度，中国东晋出现的门阀制度，实际上三国时代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想汉代之后，因为原来的这样一套制度化的体制坠落了，所以后来大的望族接管了政权，所以原来一些相当超前的制度被破坏了，导致了中国的长期混乱。因此我对于美国目前的制度非常的担心。美国现在有很多的精英，他们可以很好的照顾他们的孩子而且让他们进入到很好的教育机构，然后来接手很高的社会地位。但这是这个制度当中比较坏的一个方面，当然中国还没到这个程度，但这也是中国制度当中的一个隐患。

你怎么可以来防止这样的精英垄断这个国家的政权，而不是靠选贤举能？如果靠亲友关系就非常可怕。在以往的十年当中，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做得很好。但整个制度也有很多的腐败，而且后门流行，掌权者使自己的亲朋好友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是我们看到的状况。所以我想很重要的状况就是要建立向下问责制，这样就可以保证个人的关系不进入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从而颠覆这个政治制度。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所以你说的坏皇帝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暂时看起来解决了，但长远来看我想没有解决，这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怎么来让这个制度能够按照它目前良好的状态延续下去。比如说再延续二、三十年，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这个还是要政治问责制解决的问题。我并不是要给美国辩护，我住在纽约我知道那里有很多的犯罪，有很多的问题。但至少在一个民主制度当中你犯了错误就有机会改正这样的错误，而且花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它改正过来。

另外我还有一个关于美国的观察，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像张教授说的谁也没有受惩罚这是很糟糕的，没有让那些带来金融危机的人被问责，为什么出了这样的问题呢？我想这个跟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193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场更大的经济危机，最后美国选上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并逐步建立了一个套监管体系和福利国家。他们采取了很多重大改革措施，因为群众非常愤怒了。他们改正了原来大的政策错误，这就是对过去的问责，并且是依赖自身的制度改正错误。我想在以往几年当中危机足够大，决策者也缓解了一些问题，这个反过来使得需要改革的势头受到了遏制，这也是矛盾的方面。但我想毕竟我们看到在民主体系当中有这样的内在机制，还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所以我们要看长远，好像目前中国还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张维为教授：****我还是想稍微回应一下，我觉得各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做得不好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都是一种悲剧，特别是文革我自己是经历过一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讲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过去有奴隶制度，有印第安人被杀光的历史，种族歧视制度还持续了很多年。福山教授认为美国是通过自身制度的努力改进的，实际上中国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也是通过自己的制度改正的。实际上如何避免坏皇帝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已经解决了，现在不会出现一个强人扭转这个体制，不可能的。因为权力交接的制度已经形成了，而且是一种“选拔”加上有限范围的“选举”的制度。我觉得从我们探索未来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可能会比光是靠选举制度要好。因为西方光是靠投票选举的制度，我用个词叫做“游戏民主”或者是“好莱坞民主”，谁上台无所谓，只要程序正确，你是个电影明星你是个演员你是个运动员，只要是知名人物，选上来就选上来了。而在国家治理上，中国人的观念很重要，就是选上来的必须是人才，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另外我觉得谈到毛泽东主席，我想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看到他确实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们也要发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到今天还是有这么多的中国的普通百姓，仍然很尊重毛泽东主席，我想一定是有一些事情上他做的是对的，甚至是非常对的。他的几个主要的贡献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一个是统一了整个的中国这么大的版图，第二个是解放妇女，第三个是土地改革，还有一些其他的贡献。所以我个人认为邓小平讲的三七开，我亲口听他讲过，我觉得还是比较公道的。我们也许跟西方的传统不太一样，西方是一种法律传统，我们是一种政治传统。另外中国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中层结构，我把中国分成上层、中层、底层结构。这个结构形成之后不会形成毛泽东时期大范围的极端主义。这个在埃及可能会出现，因为他们没有中层结构，什么是中层结构，就是和现在的市场机制配套的中产阶层结构。这个是中国以后体制不走极端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保证。

关于腐败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纵向的和横向的比，中国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来看，所有的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腐败增加的阶段，往往和现代化同时发生。您的老师亨廷顿先生就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的。美国我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在这个体制下，要看你怎么界定腐败。我自己在《中国震撼》这本书里面提了一个观念，叫做“第二代腐败”。比如说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叫监管套利，也就是信用评级机构给你打高分而得到大量的利益，实际上我觉得金融危机里面有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但美国的法律制度把这些问题叫做“道德风险”。我觉得美国如果把这一类问题作为腐败问题处理的话，恐怕效果会更好一些。你也可以横向的比较，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实际上不管中国现在怎样抱怨自己的腐败问题，但和我们可比的国家，也就是人口在五千万以上，发展阶段相对比较类似的国家，印度也好，乌克兰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巴西也好，埃及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的腐败都比中国严重。《透明国际》的评估也是这样的结果。我把中国看作百国之合，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这样的国家没法搞西方的制度。看中国同样要分板块。我们的发达板块腐败相对较少。我在意大利做过访问学者，我觉得上海的腐败一定比意大利少，也比希腊少，这是肯定的。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化了。我20多年前去希腊这个国家，就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现在就破产了，要靠中国援助。我跟希腊朋友坦率地讲：我20年前到你们国家的时候，你们总理叫帕潘德利欧，现在还是叫帕潘德利欧，都是家族政治。经济就是高福利永远下不来，最后破产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从上海或者重庆派一个团队帮你们治理国家。

所以我就想到民主制度的问题。我这个观点我自己还没有写出来，我正好和福山教授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这个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为什么这样说，往前推2500年左右，当时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后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两千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一人一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

这种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有几个大的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第一个就是它基本没有“人才”的观念，就是治国谁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承担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这样的损失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永远下不来。像中国这样进行银行改革、国企改革是不可能的。第三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过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整合，大家用票决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赢。但美国的社会现在也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投票输的一方不认输，继续为难你。第四个问题我叫作低智商的民粹主义（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今天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

所以我想起了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国来想要进行贸易，但我们当时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绝对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国家，不要向人家学习任何东西，是历史的终结。结果我们就一下子落后下来。我现在觉得西方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是从西方的角度考虑，他们真的可以到中国来好好看一看，观察一下中国怎样在三十多年里面如何不停地进行改革，有些改革虽然很小，但是不停地进行。西方觉得它的制度还是最好的，实际上这个制度问题越来越多，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已经破产了，英国的财政债务占GDP的90%，也接近破产了。所以今天我们总理正好访问英国，准备投资，英国人就非常高兴。关于美国，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数，“911”袭击损失了1万亿，两场不聪明的战争损失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了8万亿。美国现在的债务是10万亿到20万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元国际货币垄断地位的话——这个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国这个国家就已经破产了。我有个朋友是从上海出去的，不是说移民热嘛，就去了美国。我就给他算了一下，你看过去十年如果你待在上海，如果不是很麻木的话，你可能已经买了一套房子，你的财富可能增加了2到3倍，而美国赶上了金融危机，他换外汇损失了一大笔，金融危机又损失了四分之一的资产，这样下来想衣锦还乡都很困难了。中国崛起是一个大势，一个大国全面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规模绝对不是一个小国家可以比的。西方的制度总体上在走下坡路，今天一些中国人还是开口闭口美国怎么样，至少对我们这样经常去美国的或者在欧洲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来说有点贻笑大方。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西方，哪些地方比我们好，哪些地方不如我们，哪些需要学习，哪些需要警醒，这种心态我觉得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谢谢。

****福山教授：****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你必须要区分政策和体系。我们刚刚讲过短期的政策，确实有问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在过去的一代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借款、借贷。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我们所说的民主的特性和体制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德国实际上和中国蛮接近的，为什么呢？它非常执著，执著于我们所说的贸易的顺差，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而且就业在德国也是不错的，同时我们看到德国没有很多美国的那种房产泡沫，他们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只是他们做了一些跟美国不一样的选择。我想说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根本没有问题，每个国家都可以犯错误，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短期的经济架构。

我们知道中国在上一代取得的成就真的是非常辉煌和巨大，我并没有说我不尊重这点，但是我还是想说的一点是你不能基于非常短期的的表现来做一个长期的评价。我们看到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遭遇房产泡沫。当这个泡沫破碎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政策的错误，接下来就是日本20年的金融或者说经济的停滞不前，增长率非常低。我们知道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日本变的越来越强大，似乎可以取代美国，我们看到当时有一个说法：称日本是一个超现实的国家，或者是超出了美国的国家。如果我们从一个长期的角度看日本的增长，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对中国最大的挑战实际上对任何一个非成熟的体系都是一样的，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当中经济增长非常迅速，而且会有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我们看到了有城市化，进入到了工业化，欧洲这个阶段也是走的非常快，韩国、日本都是如此。可能差不多是25年前，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进程或者说流程，但是这样的转型的某一阶段，他会把很多人从农村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经济体，接下来就有挑战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就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经济阶段当中，我想这是一个全球的规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阶段还能维持两位数的增长，不可能的。在中国也不可能，现在中国的增长在下一段应该会有所下跌。所有国家，尤其是所有亚洲国家一定会碰到我们所说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出生率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而且老年化的问题，意味着人口的寿命非常长，而婴儿的死亡率非常低，不管是新加坡、台湾等等，不单单是我们所说的独生子女的政策造成的，更大的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我在上海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其中一位经济学家说到2040还是2050我们差不多有4亿人口超过60岁，这个挑战非常大，和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接近的或者说相似的。那我们所说的政治体系的柔性我们必须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看到了现在的挑战，不管是出生率下降，我们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还有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柔性的问题。这个情况下我并没有说民主的体系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刚张教授还讲到了高度民粹主义，我们所说的民主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美国的政治体系当中的很多东西，尤其是现在，对于一些很蠢的政治决定，有时候我真要摇头。但林肯，可以说我们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有这么一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尤其是我们所看到的国民的教育和收入正在增加和改善。我们看到民粹主义从某个角度来说已经改变了，我想这是真正的一个来测试民主的因素。确实短期当中我们有错误的选择、错误的决定，可能是历史的问题，可能是领导选错了等等。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对于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他们有自由的言论权、评论权。从长期角度来说，人们最终还是会做出正确的抉择。我相信美国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讲到很多不好的短期的决定或者问题，但是，人们确实知道他们长期的利益是什么，他们的兴趣所在是什么，最后做出正确的决定。

当然，刚刚还讲到了一个问题，丘吉尔我们也知道是非常伟大的英国首相。他说民主，说相对于其他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体系了，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有什么可选的呢？如果有其他可选的高品质，而且是具有决定权的政体的话，就像我们讲过我说中国确实有，应该说上一代当中就是有。这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体系，但现在的问题是你如何来确保这样的一个引导，引导整个社会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现在我再回到刚刚张教授提到的问题，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而且他讲这个情况已经去除了我们所说的投机和极端主义。

我的一位导师亨廷顿，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实际上我在斯坦福大学就是教这本书的。我们还讲过中东的问题。亨廷顿曾经讲过什么呢？他说革命并不是由穷人创造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革命是由中产阶级来创造的。他们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他们有上升机会，但是他们的机会被屏蔽了，主要是被政治体系或者经济体系所屏蔽了，那么他们的期望和他们的能力，或者是社会提供机会的能力与这些期望之间的差异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革命。我们看到的中产阶级的付出或者是增加。在最近突尼斯、埃及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多人，很多的大学生，他们使用互联网。他们和外部世界相连，他们知道政府有多坏，对他们有多不公平。现在我们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的挑战是什么呢？我相信农村贫穷的农民并不会造成政治斗争，我们知道一定是接受过很好教育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人才会如此。他们希望能够和外部世界相联系，但是政治体系不让他们能够和外部世界进行联系，而且没有给他们社会地位或者是尊严，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尊严。我们知道中国差不多每年都会产生600万到700万新的大学生，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并不是穷人，应该说更确切的是中产阶级，到底这个社会是否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值。

讲到腐败，我实际并不认为民主制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们看到有很多民主国家也有很高的腐败率。很多方面跟中国比的话，比中国更少。如果我们要遏制腐败或者跟腐败做斗争，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让媒体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也就是说让他们可以揭露腐败，而不用担心那些权位很高的人会来恐吓你，如果你有这样的自由媒体的话，那么我想毫无疑问是一个有效的遏制腐败的方式。我想在民主国家当中有时候并不总是这样，我们知道意大利总理拥有了大多数的媒体，这样就无法保证媒体自由表达了，尽管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反过来也证明如果这个媒体是高度自由的，在这样一个民主体制当中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你可以自由地批评任何政治高位的人士而不会害怕受报复，那我想可以充分地遏制腐败，我想这在自由民主制度当中是最容易做到的。谢谢。

****张维为教授：****谢谢福山先生。因为您刚才提到，要从长期的角度来评价短期的情况，实际上我1985年作为翻译陪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去访问，见到基辛格先生，中国领导人请他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你们太客气了，你们是来自有数千年历史文明国家，还是你们先谈吧。当然他讲的是客气话，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整体实力也好，制度也好，我们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上确实是领先的，直到启蒙运动，17、18世纪。我觉得福山先生这点很了不起，他和许多西方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比如看到中国创造了现代国家制度。

我们在过去二三百年中落后了，现在是真地赶上来了，特别是我们的发达板块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来了。我自己觉得西方恐怕有一点自满，他们还是没有真的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很多做法西方真是可以借鉴，奥巴马总统倒是看到了这一点，最近多次讲过美国应该建高铁，应该重视基础教育，应该减少财政赤字，多储蓄，应该发展制造业，应该推动出口，他反复说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他是感到中国崛起对他的压力。

我自己觉得民粹这个问题，当然福山教授很乐观，认为美国会吸取经验教训，不被民粹主义左右。但我自己觉得随着现代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似乎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垮起来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一个体制问题。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我始终觉得像中国这样文明型的国家，什么东西都有自己数千年的传统，我不是说这个传统好还是坏，我是说一旦你有数千年传统的话，你要跟它一刀两断是很困难的，它会影响今天我们所做一切。所以我常说，你不想要中国特色也会有中国特色，因为你的传统基因太强了，所以要做的应该是趋利避害。在文革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要跟传统一刀两断，结果是非常的困难。中国有很好的传统，我觉得就是这种选贤任能的传统——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加上一定程度的选举。这个中国人能做好，我们有数千年的传统，所以历史传承跟西方差别很大。刚才福山教授提到，世界上除了民主制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分歧，就是中国人并不想把自己的制度推销给其他的人民或者其他国家。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人类五分之一的事情办好，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我自己观察只要你做得好，人家就会来学习，今天中国所有的邻国或多或少都在学习中国模式，从俄罗斯到中亚到印度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等。关于中产阶级，这是亨廷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主流的观点，中产阶级会和政府形成一种对抗，我们国内一些喜欢西方观点的人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建立独立的公民社会等等。

但我还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跟西方的文化传承很大的差别就是西方有一个传统观点，那就是“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传承不一样，中国的传承是“政府是必要的善”。有这样的历史基因的话，我自己估计，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中国稳定的。这是第一。第二，它跟国家的关系可能不是一种高度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高度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会使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具有西方国家和社会远远没有的一种凝聚力。关于腐败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们亚洲当时有“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它们初步实现现代化以后，台湾和南朝鲜转向了西方民主制度，香港和新加坡基本保留了原来的制度，但从腐败情况来看的话，香港和新加坡比台湾和南朝鲜要好得多。国际上所有研究腐败的，认为亚洲腐败最少的就是香港和新加坡。特别是香港60年代腐败还非常严重，后来通过建立廉政公署等方法，也就是说相对比较独立的反腐体制解决的。所以说西方民主制度能够解决腐败问题这个说法我觉得不成立，至少在非西方国家是这样。我们可以看看国际上的腐败指数。绝大部分人口五千万以上的民主国家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台湾民主化以后更严重，否则就不会有陈水扁关在监狱了。韩国几个总统都有腐败的问题，但是没有采用一人一票的香港、新加坡，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把腐败降得比较低了。

最后就是前面您提到的丘吉尔讲过的一句名言，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我查了一下他讲这段话的历史背景，他是1947年在英国下院辩论时讲的，但他讲的语境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丘吉尔本身是反对在殖民地国家比如说印度推行民主制，他是坚定的反对印度独立的人，怎么会支持印度搞民主制度？我自己曾经套用这个比方，中国模式有很多的问题，但却是一个最不坏的模式。谢谢。

****福山教授：****就以这个问题开场吧，是否中国的中产阶级会不同于其他一些非华人社会的中产阶级，会不会真正出现这样的差异？我实际上跟我的老师做了很多的辩论。他在1990年代初写了《文明冲突论》，在这本书当中他说文化实际上决定了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看到了印度教、穆斯林、基督教，还有儒教这样不同的文明体系。虽然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变革，但实际上在这些社会当中，人民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制于他们的文明形态，尽管他们处在现代的经济社会。为什么我要学国际政治？因为我喜欢观察不同的人，跟我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其他地方的人完全跟旧金山或者斯坦福的人一样，我就没兴趣学了。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是否能够穿透很长的时间，是否能够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或者我们要问现代化是否最终能够导致人民在文化上也是趋同的？

我想我们来举个例子，你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妇女坐在听众席当中，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妇女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当中遗产主要是由男性继承，女性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我想在美国和欧洲早期发展阶段也是这样。但是你在这个发达世界、亚洲和欧洲可以看到到处是妇女，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妇女的地位提高了？为什么她们现在在写字楼工作，在工厂做工？为什么她们拥有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跟男人平等的权利？因为这是现代化的产物嘛。过去很多人认为女性不可能在工作场合跟男性平等，她们只能在家里生养孩子，操持家务，但是现在的经济社会当中没有妇女的话很难运作。

沙特为什么能做到？实际上他们是从南亚雇佣劳力，比如雇佣50万驾驶员为女性开车，所以他们可以不准女性开车，但如果没有石油财富他们怎么做到这一点？虽然穆斯林的文化对女性有特别的规定，但现在在中东女性也获得了更大的权利，政治组织也更好了，她们也在要求跟男性平等的权利。所以这样再回头看，就充分地说明，不同的文化经过现代化也会对于同一个问题拿出共同的解决方案，比如涉及到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就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因为现代化要求你虽然是文化背景不同，但要拿出共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想如果你不给妇女平等的工作权利或者其他权利，你就不能达到一个现代社会的层次。当然这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张教授说好像是中产阶级他们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财产，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肯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但在我的观察当中，从现代化的一些假定来看，中产阶级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他们在现代化上的行为还是类似的。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伊斯兰有不同的体系，但我们看到以往几年当中阿拉伯世界的妇女都走上了街头。也许文化可以决定某些行为，但我想在过去决定在现在可能不一定仍然有那么大的决定力，因为有了因特网，有了旅行，我想恐怕文化再这样那样垄断人们的行为是不大可能了，至少跟两千年前不一样了。因为人们确实需要获得外来的启示，现在新一代更容易做到这点。

最后我再讲一点就是我想我完全同意张教授的这个话，我认为确实有一个失败的地方，就是说在美国和欧洲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成就。不管是当代的横向的比较取得的成就，还是历史纵向比较取得的成就。我想我最新的这本书实际上六章几乎有三章都是有关中国，比印度等其他文明讲得多的多，实际上为了写这本书我学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历史。我想我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有它强大的影响力。我意识到历史的影响力，这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是重要的。我知道很多国家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民主理念并把它融汇到他们自己的文明当中，我想中国也是这样，在走向现代性当中也是这样做，实际我很喜欢这一点，总是从外国学习，这一点我想中国还会继续做下去。我想这里的挑战是我们需要重新恢复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但同时也要能够让他跟现代的制度能够相容，这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如果是单纯地对历史感到自豪，最后会走到民族沙文主义，或者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样的心态当中，这样当然不是很好的。我想日本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日本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跟美国、英国、法国完全不一样的，有具体独特的日本的文化特色，确实这个特色是相当浓的。我想现在中国的特色的话，也应该是相当明显的，他一定是有明显的华人社会的特色，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特色。我想重要的是我们要具体思考，什么方面的中国特色是我们要保留的，什么方面又是要融入世界潮流的，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与世界和平共处。

****张维为教授：****我再简单地做一个回应。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观点。但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国为例，比如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都在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前两年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这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歌，美国人不会唱的。中国人传统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国人为家庭会付出不知道比美国人大多少倍的牺牲。换句话说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特别像中国这样一种强势文化，怎么改变得了？一个是麦当劳文化，一个是八大菜系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办法收编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我是很欣赏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他的观点一贯是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来延伸而来。

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核心是文化底蕴的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起过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我们今天小学生的知识可能都超过了孔子超过了苏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没有增长多少。我想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但福山教授不会接受，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智慧”。比如说我观察美国，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越南战争是这样，阿富汗战争是这样，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恐怕要更多地强调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国讲课，一个德国经济学家跟我讲了一段故事，说最近默克尔总理问他，为什么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国的经济学家说：总理呀，你不要担心，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有一流的经济了。换句话说是经济学出了问题，出了很大的问题。在西方产生的社会科学中，我自己觉得经济学可能是相对而言更接近一点真理的科学，因为它最接近自然科学，什么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来表示。坦率地讲，我觉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跟经济学相比恐怕离真理更远，所以我们要大胆地探索话语的创新，这点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样的，他现在也在冲破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的范围，从他这本新书就可以看到，他是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等综合地来探讨。我觉得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当然我自己也好，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远一点，我们确实是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并不是要证明我们怎么好，西方怎么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证明他怎么好，我们怎么差。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人类社会的努力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消除贫困问题，到文明冲突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等等新的问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

http://www.digitalnpq.org/archive/2011\_fall/13\_fukuyamaweiwei.html

The China Model: A Dialogue between Francis Fukuyama and Zhang Weiwei  
  
Francis Fukuyama is a Olivier Nomellini Senior Fellow at 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dard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Zhang Weiwei is a professor at the Geneva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hunqiu Institute and a guest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China.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China Wave: 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

Francis Fukuyama | China is important in the world’s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tate. In the West, the typical accounts of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tend to be very Euro-centric, taking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countries as the norm. They fail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China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create a modern state 1,700 or 1,800 years earlier than in Europe.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The first institution is the state. The state is a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that concentrates and uses power to enforce rules in certain areas. The state is about the ability to coerce people. What is a modern state? I use the definition of Max Weber. The modern state is not based on friends and families. People should not be hired based on what relationship they have with the ruler. Rather they should be treated impersonally as citizens with a certain impersonal distance from the ruler as opposed to ancient states which were ruled on the basis of families or the kinship of rulers.

The second categ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is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is not just about having laws. Every country has its own laws, but laws must represent a moral consensus in the community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will of whoever runs the state. So in other words, if the emperor, the president, the king or the prime minister makes up laws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that is not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means even the highest authority in the country should abide by the laws.

The final se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s to do with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whereby the government feels a responsibility towards its people as opposed to ruling purely in its own interests.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ere rulers regard countries as a means to enrich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hat is not an accountable government. In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we associate accountability with democracy.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s broader than simply democratic elections.

The earliest form of accountability that emerged in Europe was in England in the 17th century. That was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monarch to a parliament that only represented about 1 percent of the English population. This would not be qualified as democracy in any modern sense. But in China, I believe everyone knows the fact that you have had moral accountability, mean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totally accountable through election, but feels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 public based o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emperors/rulers. This is, I believe, the dominant understanding of accountability in China—moral accountability.

So states concentrate power, then the rule of law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set the limits. No matter how powerful a government is, it should be constrained by the rule of law and be held accountable to its people.

As I said, the first state in the world was created by China. The motive was actually the same as it was in Europe—the pressure of military competition.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you have multiple Chinese political entities fighting over 700 years. And that military competition force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t required taxation, required recruiting officials to collect taxes and required promotion on merit. If you hired your family relatives and not the best military officers, you were not going to win the war.

Already at the time of the Qin Dynasty, the first dynasty that unified China, China already developed a state that looked remarkably modern. The civil servants examination was invented in due course. You had bureaucracy that was organized on rational lines and military forces in a large territory that were organized by unified rules. This creation of a modern state, created about 2,300 years ago in 221BC was a great historical achievement.

What China didn’t develop is the other tw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ule of law and formal institutions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The reason that China did not have the rule of law is that China did not have a dominant religion. I believe rule of law in most societies originated out of religion because religion usually serves as the source of moral rules that in many societies are administered by a separate legal hierarchy: judges, juries and priests. This was true in ancient Jewish Israel, in the Christian West, in Islam and in Hindu India. In all these societies you have legal constraints over the power of executives. However China did not have such independent religious support. That is not part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So formal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did not occur.

The West has developed quite differently. In the feudal time of Europe, it started with the rule of law. The Catholic Church devised the Code in the 11th century even before there was a modern European state. The European monarchs, like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 began to create 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powerful state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y. But they had to do so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ior existing legal constraints which limited their ability to concentrate power.

The origin of democracy in the West was the product of historical accidents. All feudal Medieval European countries had institutions called parliaments, diets or the sovereign court. These were the organizations that the King had to go to if he wanted to increase taxes. In England, the parliament was effectively strong and actually fought a civil war with the King. King James II was overthrown in 1688 and replaced with a monarch that was chosen by the Parliament. So the idea of accountability to an elected parliament really began with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In many respects,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cy in Europe was the result of this English development. That was, to some extent, remarkable. The rule of law and accountability turned out to be very powerful because they were the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Engl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owerful modern economy,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se are the bases of the governing institutions we see today in the West. Obviousl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oday China is ru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whose doctrine is Marxism, not Confucian ideology. But in many other respects,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China is very similar to the pattern established in the Qin Dynasty. High quality 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government is built on impersonal recruitment and formal rules. That i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Now let me talk about the China Model. How is it constituted? What are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hat kind of system is the Chinese system?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 is a 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t’s legacy comes from earlier Chinese history in which there was high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within the government and within a very complex bureaucracy ruling over an extremely large society. In today’s form of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goes upward primaril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Emperor. There is accountability in that system.

If you are an official and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punish you, they can hold you accountable. But there is no downward accountability to people who are being ruled. This contrasts with procedural accountability through democratic elections. That is modern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Chinese accountability has been moral rather than procedural. Moral accountability means rulers feel morally accountable to their people.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successful modern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y are all clustered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South Korea, Taiwan under the Kuomintang, Singapore under Lee Kuan Yew, Japan in its early stage when democracy was not existent, and of cours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ther words, this kind of accountability is more or less confined to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onfucian way,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moral accountability. There are man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where rulers believe politics is about stealing wealth from other people and giving it to their families or friends. That is not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 second element of the China Model is economic. Here I don’t think China is so much different from other fast-growing countries in East Asia. Like them, the China Model has been based on export orientation and relatively active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Korea and Japan. In the Chinese case, industrial policies are less clearly targeted, for example, on semi-conductors, steel or ship-building.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more focused on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financing, and a currency regime to make its exports more competitive rather than picking any particular winners in the economy. Nevertheless China has not been prone to rely on the market economy in its development.

The fourth element of the China Model is a relatively modest social safety net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in Continental Europe or Scandinavia. China has tried to create a high level of employment, but started at a low level. More should have been done to help the poor and narrow the wealth gap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na nominally remains a Marxist society. So one of the results is that Gini coefficient, which is used by economists to measure inequality, has been going up rapidly over the past few generations.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is is a problem. The gap of living standards between cities like Shanghai and the interior areas is wid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such as Denmark and Norway are largely welfare states and support low-income families while China up to this stage has done little.

Now let’s compare these two sets of institutions and look at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respectively. One the one hand, we have the China Model.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the liberal democratic model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ose democratic states including the UK, the US, France, Italy and of course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The China Model has some key advantages, one of which is i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this asp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s quite obvious. China is strong i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large airports, high-speed railways, bridges and dams because the centralized government structure makes it faster to implement these projects. India, a country in the tropical zone, has abundant precipitation. However its hydropower infrastructure is nowhere close to China. Why? Because India is a law-based democratic government.

When China was building the Three Gorges Dam, there was a lot of opposition and criticism. But the government built the dam by its own will. By contrast, years ago, Tata Auto wanted to build a vehicle company in west Bangalore. There were strikes, protests and even lawsuits by trade unions and peasant organizations. The idea finally yielded to strong political opposition.

So in certain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the authoritarian Chinese system has its advantages. In the case of the US, we have a law-based government and formal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The US is not as bad as India in terms of decision-making, but we have our own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for example, the long-term fiscal deficits. Every expert knows that this is not sustainable and has been made even worse by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but our political system is largely paralyzed in doing anything about it by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Our interest groups are very powerful and capable of blocking some decisions. Although these decisions may be rational in the long term perspective, they are not taken in the end simply because of the opposition from some interest groups. It is a tough issue to be addressed in the US. Whether we can change this state of affairs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is important in judging whether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the US can be successful in the long run.

China does have a lot of other advantages not particular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ompared with the last generation, the Chinese today are relatively free from ideology.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many innovations. If they work, it goes with them. If not, it drops them. Meanwhile the US government is actually rigid in making economic policies. Although the US is known for being pragmatic and willing to try new things, I actually don’t take that view.

So China does have many advantages. But the question is sustainabilit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China has done very well while the US doesn’t look good and is struggling with fiscal deficits. But which system is more sustainable in the next two to three decades? My preference is still for the American system rather than the Chinese system.

There are several issues that deserve our attention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Firstly, the lack of downwar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f you look at the dynastic history in China you often see that a highly 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system with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f the society results in ineffective governance. What bureaucracy brings is corruption and bad governance. To some extent, this problem can still be observed in China today.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we have the Internet and many other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owever it remains an issu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able to respond to popular requirements and feelings, and respect public opinion on governance. So, downwar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elections so that leaders always have the sense of threat. If they don’t do the right thing, they won’t be elected.

The second issue is no longer existent in the current Chinese system, yet deserves attention. That is the “bad emperor” issu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Undoubtedly, if you have competent and well-trained bureaucrats, or well-educated technical professionals who are dedicated to public interest, this kind of government is better than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the short term. Having a good emperor doesn’t guarantee no bad emperors will emerge. There is no accountability system to remove the bad emperor if there is one. How can you get a good emperor? How can you make sure good emperors will reproduce themselve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ere is no ready answer.

There is another problem of the economic model. The export-oriented model is good for China as long as China is a small economy. It is a great system to catch up with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ow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export-oriented model simply cannot continue.

We know that the economic model based on consumer debt in the US and Europe is also not sustainable. This has proven to be true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There are other problems down the road. The Chinese system is heavily reliant on “financial repression”—in other words, high savings. However this fails to maximize market efficiency. So I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is economic model in the long run.

The last point I want to make is morals. I think governments should do more than have the right economic policies. Even if a government can provid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this is by no means its ultimate goal. The government has a moral requirement. Even if one system can provide material wealth to the citizens, if citizens cannot participate in wealth allocation or cannot get sufficient respect, problems will emerge.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Spring, we have seen a series of uprisings agains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his, to a large extent, is because people demand dignity. In the end I don’t think success belongs to only one model or the other. I am probably the first person to recognize that the US democratic system actually has a lot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yet to solve.

ZHANG | In his presentation, Dr. Fukuyama raised four issues concerning the China Model, namely, accountability, rule of law, the “bad emperor” and sustainability. I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Dr. Fukuyama’s view. I think w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is very interesting. China is now perhaps the world’s largest laboratory of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legal reforms in the world. What Dr. Fukuyama said reminds me of my conversation with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German magazine Die Zeit last February. The topic was also the China Model. After a recent visit to Shanghai, he felt that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similarities between Shanghai and New York. In his eyes, China seems to follow the US model. “Does it mean there is no China Model but only the US model?” he asked. I counseled him to look at Shanghai more carefully and know the city well. A careful observer will find that Shanghai has overtaken New York in many respects.

Shanghai outperforms New York in terms of “hardware” such as high-speed trains, subways, airports, harbors and many commercial facilities, but also in terms of “software.” For instance, life expectancy in Shanghai is three to four years longer than New York, and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in Shanghai is lower than New York. Shanghai is a much safer place where girls can stroll the streets at midnight. My message to this German scholar is that we’ve learned a lot from the West; we’re still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uture, but it’s also true that we have indeed looked beyond the Western model or the US model. To a certain extent, we are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legal system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more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like Shanghai are taking the lead. Now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views on Prof. Fukuyama’s doubts over the China Model.

First, with regard to accountability, what Prof. Fukuyama has discussed is the multi-party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n the West. Having lived in the West for over two decades, I feel more than ever that this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s hardly effective. Frankly speaking,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is rooted in the pre-industrialization era, and the need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US is as strong as in China, if not more.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within the political domain alone can no longer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society today; it certainly failed to prevent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To my mind, a modern society may need new types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t needs a balance between political, social and capital powers beyond the political domain.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e US has its weakness. As Prof. Fukuyama said, many vested interest groups, such as the so-called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ill never have their interests encroached upon, thus blocking many reform initiativ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he US.

I think the accountability that the Chinese are exploring covers far wider areas than in the US. China’s experiment in this regard covers a whole range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legal accountabilities. For example, our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ve the mission of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An official cannot be promoted unless this mission is fulfilled. I read an article by Paul Krugman, the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n which he said that economic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were zero in the past decade in the US. There is no place in China, any province, city or count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has ever registered such a poor record. On the contrary, economic performance across China is impressive. This is attributable to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economic accountability. Of course, we have our own problems.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political and legal accountability. For example we are now having our dialogue here in the Jing’an District of Shanghai, which is one of the best districts in Shanghai. There was a fire accident last year that burned down a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this district. As a result, twenty or so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were punished for their negligence of duty or malpractice. Such is the reality of China’s political and legal accountability.

In contrast,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US has made American citizens lose one-fifth to one-quarter of their assets. Yet, three years have passed and nobody in the US has been held accountable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or legally. To make things worse, those financiers who are perhaps the culpri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re financially rewarded in tens or eve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However furious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President Obama are, the bonuses are still awarded to them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s they signed in the name of rule of law.

This reminds me of the second issue concerning rule of law in the China Model raised by Prof. Fukuyama. We are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ough there is indeed huge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I think some elements in our traditional philosophy remain valid and relevant. For example, there i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ian” or “heaven,” which means the core interest and conscienc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This can by no means be violated. Laws may be applied strictly to 99.9% cases in China, but we maintain a small space where political solu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ule of law, are applied when “tian” or the core interest and conscience of the society are violated. In other words, the above-mentioned Wall Street bonus issue would not happen in China. So we tr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rule of law and “tian,” and this is what China wants to do in its exploration of the legal regim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therwise it is very likely to fall prey to what’s called fatiaozhuyi or excessive legalism, which could be very costly for a huge and complex society like China.

As for the “bad emperor” issue, it has been solved. To say the least, my rough estimate is that even during the times of “good and bad emperors” in China’s long history, there were at least seven dynasties which were longer than 250 years, in other words, longer than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US. In fact, the entir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West is only about two to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this history has witnessed slavery, fascism, tons of conflicts and two World Wars.

In my view, China’s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has solved the issue of the “bad emperor.” First and foremost, China’s top leadership is selected on merits, not heredity. Second, the term of office is strict and top leaders serve a maximum of two terms. Third, collective leadership is practiced, which means no single leader can prevail if he deviates too much from the group consensu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meritocracy-based selection is a time-honored tradition in China, and top-level decision makers or the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e selected with a criteria that usually requires two terms as provincial governors or ministers.

As you know, it is by no means easy to govern a Chinese province, which is usually the size of four to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This system may have its weakness, but one can be certain that with this system of meritocracy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at China will elect a national leader as incompetent as George W. Bush or Naoto Kan of Japan. In fact, what concerns me now is not the “bad emperor” issue in China, rather it’s the “George W. Bush” issue in the US.

I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continues as it is today, I am really concerned that the next elected US president could be even less competent than George W. Bush. As a superpower, American policies have global implications. So the lack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or accountability in the US could cause serious problems. I would like to have Prof. Fukuyama’s view on the “George W. Bush” issue. Bush did not run his country well and the US declined sharply for eight years running. Even a country like the US cannot afford another eight years of further decline.

With regard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hina Model, in my new book The China Wave, I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hina as a unique civilizational state, which has its own logic and cycle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dea of “dynasties” is helpful here. A good dynasty in China tends to last two to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more, and this logic has been observed in the past four thousand years. From this perspective, China now is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 of its current upward cycle. This is one reason why I a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My optimism also comes from the Chinese concept of shi or overall trend, which is hard to reverse once taking hold.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ook a sharp turn in Japan thanks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hile China didn’t manage to do it due to China’s strong internal inertia, which is a negative way of saying shi. Now a new shi or overall trend has taken hold and gained a strong momentum after the three-decade-long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overall trend can hardly be revers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some waves may go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t is the shi that defines the general trend of China’s big cycles. Unfortunately many Western scholars fail to understand that, and their pessimistic predictions about China’s collapse have lasted for about two decades. Instead of China’s collapse, these predictions have “collapsed.” Some Chinese within China still hold this pessimistic view. But I think this view will also “collapse,” and that won’t take another twenty years.

Prof. Fukuyama mentioned the trade dependency of the China Model. China indeed depends a lot on foreign trade, but this dependency has been somewhat inflated. Foreign trade takes a large share of GDP if calculated on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 But foreign trade is calculated in US dollars, and the rest of the GDP is calculated in the undervalued RMB. As a resul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re is an exaggerated high trade dependency.

Looking ahead, China’s domestic demand may well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China’s urbanization didn’t gather pace until 1998. From now on, there will be 15-25 million new urban dwellers every year in China. This unprecedented scale of urbanization in human history will create immense domestic demand, which may be larger than the combined demands of all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In terms of respecting individual values,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end is the same, which is to respect and protect individual values and rights. But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means to achieve the end. China has a holistic tradition in contrast to the individualistic one in the West. The Chinese approach based on holistic tradition produces better results in promoting individual values and rights.

I describe the Chinese holistic approach as Deng Xiaoping’s approach and India’s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 as Mother Teresa’s approach. Deng Xiaoping’s approach has helped lift almost 400 million Chinese individuals out of poverty and fulfill their values and rights: they can watch color TVs, drive on highways and surf and blog on the Internet to comment on all kinds of issues. But in India, although Mother Teresa’s approach touched and moved countless individuals and she was even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overall picture of poverty in India remains largely unchanged.

I would also like to talk abou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ctually I do hope that Prof. Fukuyama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more field research in China. What is the Chinese way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Let me share one example. In China, we make a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every five years. This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rounds of discussions and consultations at all levels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In my opinion, this is the real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it ensures quality decision making. The gap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in this regard is, to be frank, huge. To my mind, China is perhaps “at the graduate level” and the West perhaps at the “undergraduate” or even “high school level,” if this analogy fits.

The recent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at the first glance, is about the pursuit of freedom. But one of the root causes, to my mind, lies in the economy. I have been to Cairo four times. Twenty years ago, this city was about five years behind Shanghai. But now the difference is four decades. Half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unemployed. Other than revolt, what else can they do?

My observ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have led me to conclude that, while many in the West cheer the Arab Spring, don’t be too optimistic. I hope the region will do well, but it will be difficult, and the Arab Spring today may well turn into Arab Winter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ith American interests undermined. The situation in this region is no better than that of China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long period of chaos. There remains a long journey to go in the Middle East. We shall wait and see what will happen.

Fukuyama | Let me respond one by one. First of all, when you are comparing political systems, I think you should distinguish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is to say, the specific policies taken by certain leaders and the system as a whole. It is clear that American policy-makers have made a lot of mistakes, for example, the Iraq war for which we paid a big pric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which originated from Wall Street is the result of free market ideology, excessive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expansion in the property market. But policy mistakes can be made by any regime at any time. I don’t think democratic regimes are more prone to policy mistakes than authoritarian ones. In fact, the latter have even bigger troubles. The mistakes could drag on as the decision-makers cannot be removed. So the pri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ill be very high.

You said that China will never select a national leader like George W. Bush. Well, it is a bit hard to say that. George W. Bush was the president only for eight years. If you go back to the “bad emperor” problem, the last bad emperor China had, quite frankly, was Mao Zedong. The dama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pon the Chinese society was far more severe than anything George W. Bush did to American society.

You also mentioned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 do recognize the positive sides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the term limits for leaders in China. If Gaddafi or Mubarak had term limits, Libya and Egypt would not be in so much trouble.

You also said that consensus should be reached within the leadership in order to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In my opinion, this practice is exactly a lesson learned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ast, whims of one individual wreaked havoc upon the whole society. So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to create new institutions, which include term limits.

I want to give credit to the Chinese system. Many Americans fail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although China is an authoritarian country, it is also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and has checks and balances in its system. However I think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long run.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set-u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based on the memory of those who lived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still not possible to talk about that part of the history fully in China. You are not teach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at happened. They have not experie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end to forget it. But the problem is what will happen if the new generation has no such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scars from living under that kind of unconstrained dictatorship. Are they going to be willing to live with the current checks on the use of power?

That is why I believe the formal rule of law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long run are viable because it is not just reliant on the memory of one generation. If the next generation doesn’t have the same memory, they might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are the means to maintain what is good at the moment and let it transcend generations.

In my new boo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argue is that we all have a common human nature. That human nature makes us favor our families, friends, brothers, sisters and children. Giving our personal preference to friends and family is a natural mode of human social interaction. But we cannot base political systems on friends and families. So on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politics is to create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beyond all friends and families, beyond kinship and personal relations.

So, in order to get into the civil service, you have to take exams. It is not just based on who is relatively influential. This system was fully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earlier Han Dynasty in the first century BC. But at the end of the late Han Dynasty in the third century, the political system was recaptured by elites, basically by families who had a lot of wealth and power. Then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was a very complicated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Basically rich families recaptured power and the modern institutions based on meritocracy deteriorated. I think this could happen to any political system.

This is something I am worried about in the American system because we have elites who are very wealthy.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well and send them to very good schools. Of course this is not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but can be a threat in the Chinese system.

How do you make sure that elites who run the country remain based on merit and talent, as opposed to families and friends? I would sa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as done a very good job. However there is corruption in the whole system. People want to take care of their relatives, friends and children. I think one of the problems in a system without downwar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s sometimes it is hard to prevent the re-entry of these personal connections into the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a problem I don’t think has been really solved. But in the long run, in order to let the system perpetuate for two or three decades, I believe you need downward accounta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At least in a democratic system, if we make mistakes we can recover from them. Sometimes it takes quite a number of years.

Let me quickly talk about one observation about the US.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Professor Zhang said, nobody has been punished. I think that is terrible because we have not held accountable peopl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Why it happened is complicated. But I don’t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our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fter all, in the 1930s we had an even bigger economic crisis and it led to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an entirely new welfare state and regulatory system. They took a lot of strong measures because people were angry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So the system can produce re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face of big policy mistakes.

In some sense, I even think the problem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n the US is that this crisis was not big enough. So policy-makers actually, in a way, mitigated the crisis. So the political momentum that favors reform has been undermined. That is why we didn’t get adequate regulatory reform. But I don’t think our democratic system caused the current crisis.

ZHANG | Each country has ugly events or mistakes in its history, including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Great Leap Forward are indeed tragedies. I have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at no country is an exception. The US has a history of slavery and Indian massacres, and institutionaliz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lasted for over a century. Prof. Fukuyama thinks that mistakes are corrected by the American system itself. Likewis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Great Leap Forward have also been corrected by the Chinese system itself. The “bad emperor” issue has been solved by the Chinese system. Now it is unlikely that any single leader can reverse the institutional set-up because what has taken shape in China is a system of power transfer that combines selection with some kind of election. I think this hybrid model is probably better than the pure election in the West,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loring the next generation’s political system. What the West is practicing is increasingly an election system which I sometimes call “showbiz democracy” or “Hollywood democracy.” It’s more about showmanship than leadership. As long as the procedure is right, it doesn’t matter who is elected, whether a movie star or a professional athlete. Wherea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t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idea: The country can only be run by people with talents and expertise selected on meritocracy. Thi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mind.

Prof. Fukuyama mentioned Chairman Mao. On the one hand, it’s true that he made serious mistakes.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 fact that he is still widely respected in China, and this fact shows Mao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It is not fair to deny his main achievements, which include, first, unifying a country as large as China; second,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ird, land reform. Deng Xiaoping once said Chairman Mao’s achievements outweighed his mistakes by 70% to 30%. I myself heard him making this comment, and I think it’s a fair assessment. Perhaps this different perception of Mao has to do with the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Chinese have a tradition of political dynamics while the West has legal dynamics.

Thanks to the three-decad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re has emerged a stable middle class. I divide the Chinese society into three layers of structur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This structure can prevent large-scale extremism of the Mao era. Such extremism is still possible in countries like Egyp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 middle layer. This is the structural reason why China is not likely to shift towards extremism.

With respect to corruption, I think we need to do what can be called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s. Corruption in China is serious and not all that easy to tackle. However reviewing world history, you will find that all major powers including the US experienced periods of rising corruption, which often coincided with the process of rapid modernization. As your teacher Samual Huntington observed, the fastest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fastest rising corruption.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gulatory and supervisory regimes simply can not catch up with the growth of wealth and capital in times of rapid modernization. Eventually corruption in China will be tackled and solv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better regulatory and supervisory institutions.

I have visited the US on many occasions and found that the definition of corruption matters a lot. In my new book, I put forward a concept of “corruption 2.0,” as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exposed many serious “corruption 2.0” issues. For instance, rating agencies gain profits through regulatory arbitrage by granting triple A’s to dubious financial products or institutions. I think this is corruption. But these issues are called “moral hazards” in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I think the financial crisis can be better tackled if these problems are treated as corruption.

We can also make horizontal comparisons. I have visit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untries. The reality is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Chinese complain about corruption at home, it is much worse in other nations of comparable size, say, those with a population of 50 million and above, and at similar stage of development such as India, Ukraine, Pakistan, Brazil, Egypt and Russia. The evaluation of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choes my view.

Furthermore, it’s necessary to look at such a large country as China in terms of regions. China’s developed regions are more immune to corruption. I once stayed in Italy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nd visited Greece several times, and I think Shanghai is definitely less corrupt than Italy and Greece. In Southern Italy, even the Mafia has been de facto legalized through the democratic system. I first went to Greece more than 20 years ago when its fiscal deficit was high. Now Greece is bankrupt and needs assistance. I said to my Greek friend very frankly: “Twenty years ago, your Prime Minister was Papandreou. Twenty years later, your Prime Minister is still a Papandreou. Your politics seems to be a few families’ business and the Greek economy goes bankrupt as a result of excessively high welfare system and poor governance.” I joked once that we could send a team from Shanghai or Chongqing to help Greece with good governance. Indeed, whatever political system, be it a one party system, a multi-party system, or a no party system, it must all boil down to good governance and what you can deliver to your people. Therefore, good governance matters most, rather than western-style democratization.

This brings me to Prof. Fukuyama’s “end of history” thesis. I have not published my point of view yet. But mine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to Prof. Fukuyama’s. I take the view that it is not the end of history, but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 might be only transitory in the long history of mankind. Why do I think so?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years ago, some Greek city states like Athens, practiced democracy among its male citizens and later were defeated by Sparta. From then on,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the word “democracy” basically carried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often equivalent to “mob politics.” The Western countries did not introduce one-person-one-vote system into their countries until their modernization process was completed.

But today, this kind of democratic system cannot solve the following big problems. First, there is no culture of “talent first.” Anyone who is elected can rule the country. This has become too costly and unaffordable even for a country like the US. Second, the welfare package can only go up, not down. Therefore it is impossible to launch such reforms as China did in its banking sector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rdly, it i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to build social consensus within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the past, the winning party with 51% of votes could unite the whole society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day American society is deeply divided and polarized. The losing party, instead of conceding defeat, continues to obstruct. Fourth, there is an issue of simple-minded populism which means that little consideration can be given to the long-term interest of a nation and society. Even countries like the US are running this risk.

In 1793, King George III of the UK sent his envoy to China to open bilateral trade. But Emperor Qianlong was so arrogant that he believed that China was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fore China did not need to learn anything from others. This is what defined the “end of history” then, and ever since China lagged behind. Now I observe a similar mindset in the West.

It is necessary to come to China and see with one’s own eyes how China has reformed itself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mall is each step, yet the journey is non-stop. The West still has strong faith in its own system, but it is the same system tha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blematic. Greece, the cradle of Western democracy, has gone bankrupt. The British fiscal debt is as high as 90% of its GDP.

What about the US? I did a simple calculation. The 9/11 attack cost the US about $1 trillion, the two not-so-smart wars cost US about $3 trillion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about $8 trillion. Now the fiscal debts of the US are somewhere between $10 to 20 trillion. In other words, if the US dollar was not the mai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this status may not last forever—the US would be bankrupt already.

The rise of China is what we call “shi” or an overall trend, the scale and speed of which is unprecedented in human history. My own feeling is that the Western system is trekking on a downward slope and in need of major repairs and reforms. Some Chinese always speak and think highly of the US model, but to someone who has lived in Europe and visited the US many times, this is a bit too simplistic and naive. One should be objective in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What are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hat are 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hat is worthy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or being mindful of? This is the right mindset.

Fukuyama | Again I want to say that you need to distinguish a political system from short-term policy.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US, in the past generation, has had excessive borrowing. But I actually don’t think this is the problem of our democratic system.

Germany is very close to China. It is a large economy that has a consistent trade surplus and a relatively booming job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Germany has not been obsessed with the excessive financial innovation that brought down the US economy and caused the property bubble. It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It has just made choices different from the US. So I don’t think it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this country is a democracy or not. Every country can make policy mistakes.

Again I want to put things into perspective. I really don’t want to belittle the great achievement that China has scored. However my point is that you cannot make long-term judgments according to short-term performance. Japan was unstoppable in the late 1980s before the burst of the Japanese property bubble. After the bubble burst and following policy mistakes, there has since been twenty years of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low growth. But people in the mid 1980s believed that Japan would grow larger and larger until it overtook the US. There was a belief of emerging Japanese supremacy. Now I think if you look at economic growth in a longer-term perspective, what is the bigger challenge for China is the same for any economy. There is at first a period of really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at mobilizes people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cities.

Europe grew rapidly at that stage, so did Korea and Japan. Perhaps 25 years ago, China entered this process. At a certain point, that transition got people out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n you face the next challenge of productivity in a more mature economy. And I think it is probably a universal truth that no country has ever maintained double-digit growth up to that point where you have become an industrialized economy. That will happen to China as well.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slow in the next generation. Al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Asian countries, will face the problem because the birth rate is coming down, which is going to be a huge burde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large because of greater longevity and low infant mortality, not the one-child policy. This is true in Taiwan, Singapore and mainland China.

I attended a recent meeting where one of the economists said that in the year 2040 or 2050, China is going to have 400 million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That is an enormous challenge that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face as well.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 resilience of a political system,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long term. Given the different upcoming challenges of falling birth rates and a much older population, how flexible can the system be? But I would not say democratic countries have all the answers. This is the challenge of everyone.

Professor Zhang also brought up the issue of populism, which means people do not always make right choices in democracies. I think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of this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se days. Sometimes I have to shake my head because of some stupid decisions made by politicians. But Abraham Lincoln, I think the greatest president of the US, had a famous saying: “You ca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Particularly with the rise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I think this kind of populism in some respects has changed. This is a test of real democracy. Yes people in the short run make bad decisions or choose the wrong leaders. But in a mature democracy there is genuin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genuine ability to debate issues. In the long run, people will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I th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we can point out many bad short-term decisions, but in the end people will come to understand their interests which will lead them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Winston Churchill, the great British Prime Minister, once said: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question is what you have as alternatives. The alternative is really 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which I admit that China has had in the last generation. That may be a better system.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to guarantee that institution will guide the society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Professor Zhang also mentione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He said that this rules out the possibility of populist extremism or insurgency.

One of my teachers was Samuel Huntington. He wrote a book in 1968 called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amuel Huntington said is that revolutions are never created by poor people. They are actually created by the middle-class. They are created by people who are educated to have opportunities. But these opportunities are blocked by the political or economic system. It is the gap between their expect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the system to accommodate their expectation that caus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So the growth of middle class, I think, is not a guarantee against insurgencies, but a cause of insurgencies.

What happened in Egypt and Tunisian was the growth of a fairly large middle class, a lot of college graduates and a lot of people who use the Internet. Connected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y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bad their governments were.

In terms of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 I actually don’t think the source of China’s instability will come from the poor peasants in the countryside. Political revolutions are introduced by the educated middle class because the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prevents them from being connected with the larger outside world and doesn’t grant them the kind of social status that they deserve.

I know there are 6-7 million new college graduates every single year in China.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for stability is not the poor people in China, but whether the society is capable of meeting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educated middle class.

In terms of corruption, I didn’t want to argue that democracies can better solve the question of corruption because obviously you have quite a few democracies with high levels of corruption. In many aspects, China may be less corrupt than many of these democratic countries. But I do think that one way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is freedom of press where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expose corruption without being concerned about possible coercion or threat. Granted,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that is not always the case. For example, in Italy, the Prime Minister owns the whole media. But I do think it is an advantage to have freedom of speech whereby you actually can criticize those powerful people in the political hierarchy and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rsonal retaliation. That is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a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

Zhang | Thank you, Prof. Fukuyama. You said that we should make evaluations in a longer timeframe. In 1985, I visited the US as an interpreter for a Chinese leader, and we met with Dr. Henry Kissinger. When he was asked to talk about Sino-US relations, he said he would rather listen to us first, because we came from a count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civilization. Of course this is a token of courtesy. However we should remember the fact that China was indeed a more advanced country than most in terms of national strength and its political system for most of the past 2000 years. I do want to give credit to Dr. Fukuyama, for what distinguishes him from many other Western scholars is that h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studying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ncient China as evidenced by his observation that China established the world’s first modern state.

China lagged behind the West in the past two to three hundred years. But China is catching up fast, particularly in the more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I am afraid that the West is a bit too arrogant and fails to look at China with an open mind. To my mind, the West can already learn something from China. President Obama may be right, as he urged the US to build high-speed railways, focus on basic education, reduce fiscal deficits, have more savings, develop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ramp up the export sector. He has emphasized that the US cannot become the world’s No. 2.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he feels the pressure from the rise of China.

Prof. Fukuyama sounds optimistic on the issue of populism. He has great faith in the US that it can learn from its own mistakes, rather than being led by populism. But I tend to take the view that populism seems to have become even more widespread in the world today thanks to the modern media. Now a country or society in fact may crash overnight because of excessive populism, and this is more than an issu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its thousands of years of traditions leave their marks on everything. I am not saying tradition is always good or bad. My point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or unrealistic to break away from one’s tradition as it always has an imprint on what we are doing today. Therefore I always say that like it or no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with us all the time becaus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nes are with us. What we can do is to leverage advantages of our traditions while avoiding whatever disadvantages of our traditions. What happen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ells us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break away from one’s tradition. China does have some very good traditions which include belief in meritocracy, so selection plus some form of election offers a promising future in China, and we can do well in this regard, given our thousands of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eritocracy-based selection.

Prof. Fukuyama talked about alternatives to democracy. This is exactly an area where our views differ. China does not have the intention to market its model as alternative for other peoples or countries. What we focus on is simply running our own country well, which means doing a good job for one-fifth of mankind, and nothing is better than achieving this goal.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if you do well, others will follow your example. Today virtually all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Russia to India, from Vietnam, Laos and Cambodia to the Central Asian nations are learning in one way or another from the China Model.

Professor Huntington’s view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state is shared by most Western and some Chinese scholars who advocate an independent civil society. But China has its own long cultural traditions, which may impact China’s middle class in a different way. Most Westerners view government as a “necessary evil,” but most Chinese view government as a “necessary virtue.” With this cultural legacy,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is more likely to become the staunchest supporter of China’s stability in the world. In addition, instead of being confrontation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Chinese state is most likely to be positively interactive,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al. This will generate a social cohesion in the Chinese society unmatched in any Western society.

Now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We all know Asia’s four Little Dragons: South Korea, Taiwa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fter their modernization process was largely completed,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dopted the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while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chose to stay more or less the same course. Look at the situation today: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re much less corrupt th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s acknowledged by all those who study corruption. Hong Kong used to be very corrupt in the 1960s, but this problem was successfully tackled by setting up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In other words, the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 is by no means the best solution to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at least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corruption indicators show that most non-Western “democrac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50 million and above are faced with more corruption at home than China. As a matter of fact, corruption has become even worse in Taiwan after it became a democracy. Otherwise Taiwan’s leader Chen Shui-bian would not end up in jail. South Korea’s five elected presidents were all implicated one after another in corruption scandals. In contrast,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ithout adopting the Western political model, have succeeded in sharply reducing corruption through rule of law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 for Churchill’s remark about democracy, some Chinese re-phrased his remark into “democracy is the least bad system,” and I checked the context of his remark and found that he made it in a Westminster debate in 1947. He was clearly referring to the Western democracy as practiced in the West. Winston Churchill himself was firmly opposed to India’s independence. How could he be expected to support India’s adoption of Western-style democracy? But I myself have borrowed Winston Churchill’s phrase and described the China Model as the “least bad model,” which means it has its weaknesses, but it has performed better than other models.

Fukuyama | Let me start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Is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different from the middle class of the non-Chinese societies? This is actually a question that I debated a lot with Professor Huntington. He wrote a book entitled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1990, in which he basically made the argument that culture determines behavior. Despite the changes brought by modernization, he argued, culture still determines people’s behavior even though they are more modern.

I believe culture is very important. The reason that I stud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that I like observing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myself. So cultural diversity is the reality and it is good that not everybody is the same. But one of the larger questions is whether culture really projects itself across time in a way that resists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whether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leads to cultural convergence.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Look around the room in which there are a lot of women sitting. Why are there a lot of women in the audience? In traditional times, the status of women was low in the societies where inheritance usually went to the male line an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were very limited. This was true in the US and Europe at their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But when you travel around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here in East Asia, you see women everywhere. Why is that the case? Why have women’s status been raised? Why are they working in offices and factories? Why do they enjoy equal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with men? The reason is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oday you cannot run a modern economy without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Saudi Arabia doesn’t allow women to drive. So they have to employ around half a million chauffeurs from South Asia simply to drive their women around. If they didn’t have oil,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insane economic system you could possibly imagine. Despite what Muslim culture says about the appropriate roles of women,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 are getting more powerful and more politically organized. They are demanding equal rights with men. This seems to me a case 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are coming up with similar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the status of women. It happens not because culture is determinant, but becaus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forces societies to come up with solutions.

I don’t think you can have a modern society without granting equal rights to women. Of course this is an open question. Professor Zhang said that middle-class people who are educated, relatively secure and have private property are going to be different from middle-class people elsewhere because they live in a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Maybe that is the case.

But from my observation, middle-class people in different cultures actually behave in a similar way. In the Arab world, people think the Arabian people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Islam. Yet through the past year the Arab people have been on the street to demonstrate against their governments. So I think that some of the assumptions about the role of culture may not be right. Maybe culture did dictate some behavior in the past. But under current conditions, it is different. With the Internet or travel, maybe people’s behavior is determined more by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 than the weighty traditions of the past.

Let me say just one final thing on which I agree with Professor Zhang. I do think that there is a failure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US and Europe to appreciate Chinese achievement, both the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chievement. My recent book has six chapters out of which three are on China. There are more chapters on China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 really spent a lot of time trying to teach myself as much Chinese history as I could. Recognizing the strength of that history is important for American and also for Chinese.

No civilization can live on borrowed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What I perceive is going on right now in China is an attempt to recover authentic Chinese roots. I think this is a good thing that China has to do. The challenge is to recover that pride in history and tradition and make it compatible with modern institutions. We should do it in a way that doesn’t lead to nationalism or narrow chauvinism.

What is a modern Japan like? It is not similar with the US, UK or France. It has rich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 I think a modern China needs to have ver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So it is going to be a very important task to figure out what are typic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hat is required of a modern society. That is also part of a larger international order.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live with others peacefully.

ZHANG | Many Western political scientists take the view that modernization leads to cultural convergence. But experience proves that it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Let’s take China as an example. The Chinese are known to be busy with modernization, creating wealth and making money. But a few years ago, a song became an instant national hit that encouraged people to visit their parents more often. This song is heart-warming to most Chinese and it struck the chord of public sentiment. In other words, despite the rapid pace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individualism, at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is still family, for which most Chinese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much more than most Westerners.

The very essence of a culture is unlikely to be changed and shall not be changed by modernization. Otherwise the world would become too boring. How can it be possible to change the essence of a culture as strong as China’s? One is the McDonald’s culture, and the other is China’s Eight-Schools-of-Cuisine culture, and they are immensely different. Indeed, the former has no power to conquer the latter. Rather, the latter may be able to assimilate the former. I appreciate the views of Edmund Burke, the British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19th century, who held that any change in a political system must be derived mainly from a nation’s own traditions.

Furthermore, I think, the main reason for respecting culture is our respect for the wisdom associated with culture. Wisdom and knowledge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We have far more knowledge today than anytime in the past. Our school kids today may have more knowledge than Confucius or Socrates. However human wisdom has hardly grown. Here I have a simple suggestion, which I’m not sure if Prof. Fukuyama will accept: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elements of a modern political institution he has mentioned, namely, state, accountability and rule of law, we could add one more element—wisdom. The US has won many wars tactically, but lost them strategically, as the wars in Vietnam, Afghanistan and Iraq, to name just a few, attest. This situation has to do with wisdom, and 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wisdom can hardly be overemphasized.

I was recently in Germany giving a lecture. One German economist told me a story.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sked a German economist why there are no first-class economists or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 in Germany. This economist replied, “Mme Chancellor, please don’t worry about this at all, because if there were first-class economists, there would be no first-class economy.” In other words, it’s economics that is in trouble. Among all social sciences invented in the West, I think economics is arguably the closest to the truth because it is more like natural sciences and supported by mathematical models. With this in mind, frankly speaking, political science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vented in the West may well be further away from the truth than economics. This is why we should be bolder in our thinking and more courageous in our efforts toward innovative discourse.

I share one commonality with Prof. Fukuyama. We are both trying to work out of the box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 new book tries to integrate anthropology, sociology, economics, archeology and more. His efforts merit our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though I don’t agree with him on everything. On our part,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indeed moving a bit further than Prof. Fukuyama and we are questioning the whole range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discourse. But our intention is not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or to prove how good China is or how bad the West is, or vice versa. Rather we try to find new ways to address such global challenges as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limate change and various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urbanization. Western wisdom is indeed insufficient. Chinese wisdom should make its contributions.